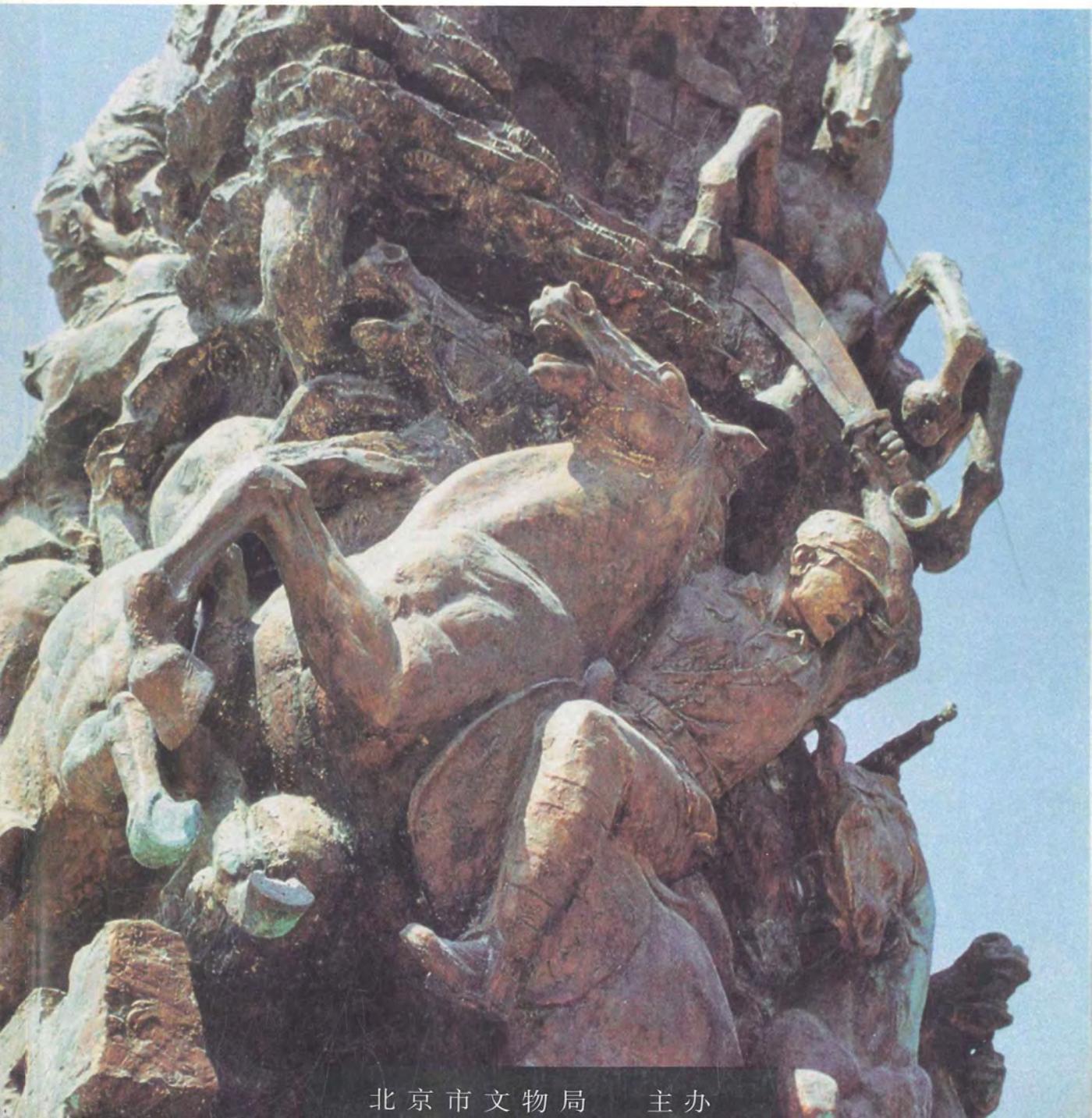


BEIJING WENBO

北京文博

20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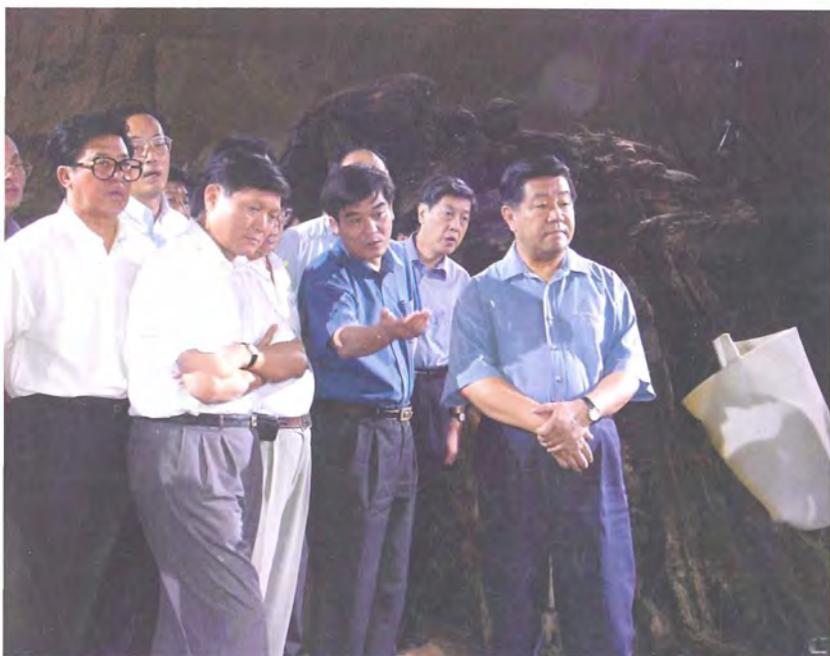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北京石景山区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简况



石景山区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陪同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等考察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现场



(封二)

潘其风教授在考古现场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器残片



(图片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老山汉墓考古队提供)

老山汉墓出土的漆器残片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图一



图二



图四

图五



图三

(彩二)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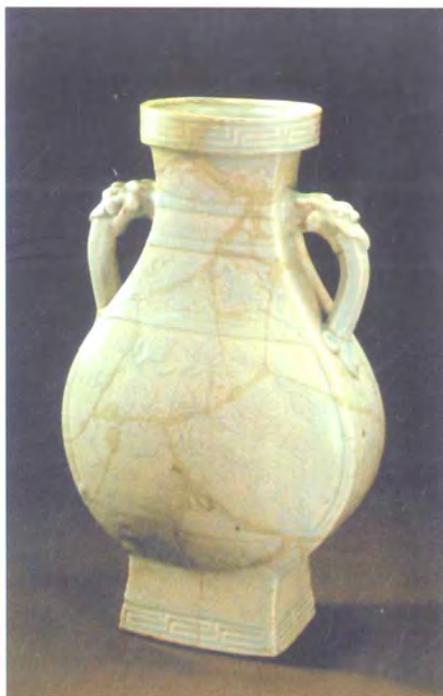


图六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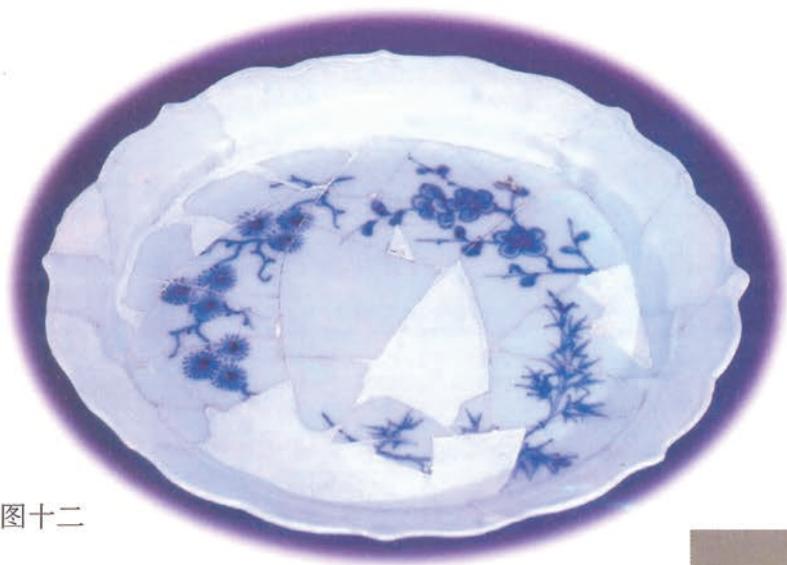
图九



图十



(彩三)



图十二



图十四

图十三



(彩四)



图十一

(图片：龙霄飞)

北京文博



目 录

(2000年第3期)(总第二十一期)

文物工作

- 刘敬民副市长在2000年全市区县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
管见近十年来北京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 成大生(7)
房山地区文物事业展望 郭志族(11)

考古与文物

- 关于老山汉墓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构想 孔繁峙(13)
北京湖广会馆建筑(附:会馆与戏场杂考) 王世仁(19)
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续) 张先得(47)
北京昌平白浮墓地分析 李维明(52)
大房山金陵考(续) 杨亦武(56)
简析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龙霄飞(63)
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亭遗址调查 宋 磊(67)
永定地区的古塔 齐鸿浩(74)
战国燕币综述 冯胜君(79)

对《五十年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文字石刻》一文的勘误 齐鸿浩(85)

文物修缮

房山石经山雷音洞的保护和修缮 胡一红(86)
居庸关长城的特点及其修复 李德仲(92)
天安门城楼修建始末 孙永林(96)

资料信息

北京市文物局 2000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唐瑞民(98)

封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雕塑

封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和雕塑群

封二、彩插一:北京石景山区老山汉墓考古发掘简况

彩插二、三、四: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封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5 周年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白

副 主 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成大生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荣大为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远 徐 伟 徐 明 舒小峰
韩 永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钺

主 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魏伯涛 张岩 李树丛

美术编辑:石建国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BEIJING WEN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3, 2000

Contents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 Deputy Mayor Liu Jingmin's Speech at the 2000 Forum on Antiquarian Work in th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Beijing (5)
- Some Opinion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Monuments in the Beijing Are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by* Cheng Dasheng (7)
- Prospects of the Antiquarian Cause in the Fangshan Area *by* Guo Zhizu (11)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 Some Ideas on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Study of the Han Tomb at Laoshan *by* Kong Fanzhi (13)
- Buildings of the HuGuang Guild in Beijing (Appendix: A Study of Guilds and Theaters) *by* Wang Shiren (19)
- City Walle and City Gates of Beij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tinuation) *by* Zhang Xiande (47)
- A Study of the Baifu Cemetery in Changping, Beijing *by* Li Weiming (52)
- A Study of the Jin Mausoleums on Mount Dafangshan(continuation) *by* Yang Yiwu (56)
- On the Yuan Porcelain from the Ruins of Yuan Dadu *by* Long Xiaofei (63)
- Survey of the Ruined Pavilion for the Shen Gong Sheng De Stele at the Ming Tombs *by* Song Lei (67)

- Ancient Towers in the Yongding Area
 by Qi Honghao (74)
- A Summary of Yan State Coin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y Feng ShengJun (79)
- Correction of Errors in the Article "Important Stone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in the Beijing Area in the Last 50 Years"
 by Qi Honghao (85)

REPAIRS OF CULTURAL MONUMENTS

- Preservation and Repairs of the Leiyin Cave on Mount Shijing
 by Hu Yihong (86)
- Features of the Great Wall at the Juyong Pass and Its Restora-
 tion by Li Dezhong (92)
-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wer above the Tian An
 Men Gate by Sun Yonglin (96)

DATA AND INFORMATION

- Chronicl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Event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2nd Season,
 2000) by Tang Ruimin (98)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u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 - chairmans: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Rong Dawei, Zhao Qicha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Shu Xiaofeng, Han
 Yo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Li Shucong

Art Editor: Shi Jianguo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
 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
 fairs.

URL: <http://www.bjmuse-umnet.org>

刘敬民副市长在 2000 年全市区县 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专门召开这个会议,部署文物修缮、抢险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重大,需要仔细、认真地研究落实。市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下大决心,三年安排 3 亿多元修缮北京市各城近、郊区的文物,建国以来还没有这么大的举动。这些钱能不能用好,能不能真正地推动北京市文化古都风貌的再现,能不能使北京整体文化品味提高,不只是文物修缮问题,要统筹考虑,动员调动各区的积极性,当成一项大工程来抓。不能简单搞成房屋修缮计划,如果当成一般的房屋修缮,只能对个别文物的安全起延缓作用。要把这项工作变成整个文物事业、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契机,变成各区文化、文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和发展的一个机遇,变成提高各区的城市品格、文化品味的一次机遇。无论是市文物局还是各区县政府,要很好研究、定位,3 亿元要启动一个什么样的行动,要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还要从整体上、宏观上和未来的发展上去定位,去深挖。要认真研究一个新的办法,要千方百计用 3.3 亿元来启动,去解决城区文化、文物历史品味的提高。

一、努力打开文物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新局面

我们不能把它仅当成一项业务工作,而要当成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工作。这几年抓城市品味,抓区域文化品味已成为各区的共识。

第一,关于城市的历史和品格。北京市之所以有价值,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不完全

在它目前现有存在的物质形态上,而且在于物质载体所承载的文物和历史。北京建城有 3045 年,这个城市是严格按照先人对于城市社会理想建立起来的,是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而且是按人对生活、对社会、对城市的理解,按一种理想集中建造的城市。有一句外国俗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这次到罗马去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是真理。罗马每栋建筑非常漂亮,整体规划杂乱不堪,整体规划上没办法与北京市相比较。巴黎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但真正的规划是在巴黎大区形成之后,它并没有在建的时候就整体规划城市的总体设想,而是一步一步的建成。北京市是世界上少有的城市,它的整个格局都体现在对社会的一个理想。中轴线突出至高无上的王权,两侧完全对称,非常严格的对称。所谓胡同棋盘格式的社区,又体现过去古代农业社会的一种理想哲学。在我们这个城市中,地下、地面所蕴含的文化非常宝贵,要吃透市情,吃透区情,在我们的思想中注入这个城市的灵魂,让这个城市古代的、现代的、整个文化的呼吸成为品格中的一部分。区长是什么?区长就是这个区的“人格化”,区的文化品格掌握不住,就很难当“人格化”的区长。一个文化古城、文化名城,有没有一个懂文化、有文化、干文化的区长去办实事,对这个城市命运至关重要。现在看,下一步发展也就是这十二年、二十年之间,将北京城市变一个样子,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很漂亮的小区,再过十年是不是行,要打个问号。有什么东西是永远行的,是永远能留下来的,就是文化历史这些积淀,时间越久,价值越高,是无价之宝。

第二,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集中力量

保护、保留一些文物,是北京地区今后发展道路和生机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后靠什么发展、形成各区的特色,有别于其他区的品格,只有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它是不能更改,不能被重复制作的,所以,请大家想远一点。

第三,这次修缮抢险是一次重大的良好机遇,我们文化文物界必须拼命抓住这次机遇。过去有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空有一腔宏图大志,一番英雄气概,而无法施展其抱负。现在有启动钱了,你怎么做,就看本事了,如果这钱还用不好,我们真是惭愧。所以,怎么定位这次机遇,不仅是一个修缮的机遇,也是一次发展文物、保护文物、利用文物,研究区域文化品味长期发展的机遇,是战略性的机遇。各位副区长,各位文化文物局局长,要拿出这种大有可为的精神状态,去规划、设计、去推动不同一般的设想,在世纪初的时候,借着这次东风,干出高水平、高档次的工作。这是市政府对大家的要求。

二、严格按照文物的有关规范,实施修缮抢险计划

第一,要把钱用好用足,要达到最佳的目标。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保护、利用结合起来,把一些文物抠出来。这点儿钱可能不够,各区县你们再想办法。这个文物可能是民居,可能是一些机关占用,可能是一些小学校,可能是其他一些用处,要想办法把它抠出来,变成公众的财产。有些机关是区属、市属单位,要进行动员,中央所属的要做工作,推动它的开放,要千方百计地搞出几条线。谁抠出来算谁的,我们帮你抠,这钱还给你。还要按照文物法规规矩干。请文物局包括财政局,你们研究一下,对把它抠出来,政策上要给予重点倾斜。对于原样的修缮也必须搞,但是不能搞高标准,就是抢险性的修缮,不要把大量钱去修机关。谁用这个房子,谁有义务修缮,这是文物法规定的。这里有个政策导向问题,希望你们再

想细一点。

第二,严格按文物法进行修缮和抢险。一是防止修完后文物面目全非,绝不能在文物里弄个卡拉OK,开个洗浴中心。二是不能搞恶俗的东西,防止出现描龙绣凤,极为繁复,极为粗俗这样一套东西。三是要按规则办事。该拆的违章建筑要拆除,该拆的临时建筑要拆除,该拆的隔离区要拆出来,要有保护范围,要按法规办事。四是要千方百计地带动一些连带工程。大家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一定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这就是连带工程。

第三,要集中重点,启动连带工程。要下力量搬迁一些居民,搬迁一些单位,千方百计把文物抠出来,变成公众项目。大家要借这个机遇,多干一点是一点,多抠一个是一个,这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贡献。

三、多方筹资,扩大财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一,文物修缮,文物文化工作,如果把它当成一项历史文化事业,当成一个产业来看待的话,既是城市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城市经济文化命脉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区都有责任,各区也都有这个意识,借这个事,干几件大事出来。

第二,资金实行“三三制”。市政府给一个钱,你必须配一个钱,社会上再找一个钱(运用旅游开发、各项赞助和单位积极性),3亿元要带出10亿元的效益。3亿元是启动资金,不够各区要掏。项目一定要考虑好,要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出综合效益,要做出一篇文章,抓住一条线索,做出一台戏,这才有效益,这才叫高水平的工作。

第三,适当的市场运作,要把市场运作起来,把旅游文化组织起来,但是要适当。要有益于整个保护,要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第四,要动员社会赞助捐赠。市政府拿一个钱给各区,各区掏一个钱去配套,通过市场运作和赞助捐款再拿一个钱,这样就成

管见近十年来

北京地区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

成大生

文物建筑系古代建筑与优秀近代建筑的统称。文物建筑的保护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该建筑本身的保护,另一方面是整体环境的保护,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近十年来北京市本着“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在对文物建筑“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方面,即“保存”与“用”的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及实践。各级政府与管理使用单位加大了文物法的宣传和保护力度,增加了投资,使一批文物建筑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并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实践中也培养提高了管理、设计、施工以及质量监督队伍的能力与水平。但是,由于新问题不断地出现,改革步伐逐步地加快,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设计、施工、管理及审批方面就存在着一些不足。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进行反思,为明天北京市乃至全国文物建筑能保护得更好,这便是本文的原意。

一、北京地区文物建筑的基本状况

北京历史悠久,亦是元、明、清三朝建都之地,构筑了无数的建筑,宫殿、衙署、园林、寺观、陵寝、府第、民居、街道及城池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时至

了10亿元,请大家回去认真地研究。

总而言之,这项工作要组织好,一定要干出不同于一般的事业,千万不能淹没在日常的经费当中。市政府在财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下决心做这项工作,这是非常难

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帝都,又为我们留下了大批中西结合的优秀近代建筑。据全市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市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有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有222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17处;区级暂保单位246处;登记在册文物(不可移动)2523处;共计3550处。在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中,文物建筑(不含石窟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文物建筑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占38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占200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占477处,登记在册文物中占1835处,占到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50%以上。从地域分布情况看,城区中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门头沟区和房山区数量最多。从建筑类型上看,皇家宫殿建筑多集中在东西两城区,皇家园囿多在海淀区,会馆多集中在宣武区,早期建筑多在门头沟区,近代建筑多集中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

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木结构古建筑最早追溯到元代。元代建筑特征比较明显的有门头沟灵严寺大殿、灵岳寺大殿、双林寺伽蓝殿、孔庙大门、东岳庙东配殿等。

在北京地区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以明清皇家宫廷、园囿、陵寝为全国之最。保存

得的。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0年7月20日

的清代王府为全国独有。又如历代帝王庙、五坛八庙在全国都是极少见到的。另外,依附于这些古建筑中的彩塑、壁画及碑碣石刻等,许多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地位,如法海寺明代壁画,雍和宫大佛,孔庙进士题名碑等等。目前这些文物建筑除少部分(约1/3)对外开放外,其余多被机关、学校等单位占用,极少数为工厂所占用。

二、近十年来北京地区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基本状况

近十年来共计保护修缮文物建筑600余项(以开工许可证统计),其中包括保养、修缮、抢险、迁复建等方面的内容,有效地保护了北京地区的文物建筑。尤其是一些抢险项目的实施,确实保证了文物建筑的安全。近十年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严格文物建筑修缮原则。

文物建筑修缮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所谓“原状”,就是文物建筑修缮前的形状,即本来面目。这个原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其成为历史文物的关键所在。文物建筑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诸方面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文物建筑本身的“原状”——形制、结构和材料质地,较上述社会因素更为直接,更为具体。认识文物建筑的原状,是保护、修缮好文物建筑的必要前题。文物建筑又是一件庞大的艺术作品。它不同时代的总体设置、单位造型,都反映着不同时代我国建筑业方面的艺术成就和风格。另外,文物建筑周边地形地貌及其内外环境,也是文物建筑原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保护修缮(也包括迁建)时,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地区明清官式建筑居多,主体结构修缮时原则比较好掌握,油饰彩画部分掌握比较困难。油饰部分采用传统材料和

工艺,自1997年以来在全市大型建筑修缮时也广泛采用,效果较好。彩画的大面积脱落、局部脱落,以及褪色离骨现象经常出现。确定是铲掉重做,还是修补,还是内外檐有别的保护方法,则是根据其本身的价值和实际需要来确定。如历代帝王庙山门,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内外檐全部保留除尘加固,外檐按传统方法重做,效果较好。又如快雪堂院部分建筑外檐彩画采用修补办法,这对于文物价值较高的彩画比较适用。再如东岳庙后罩楼的色彩问题,原有遗存(极少量)应为银朱色,但一般人习惯为铁红色,在此次修缮时采用传统银朱色,虽一时人们不易接受,但随时间变化,现已被人们接受并喜欢。

2. 文物建筑的保护包括建筑本身的保护和环境风貌的保护。在建筑本身保护的同时,应强调环境风貌的保护。

文物建筑本身的保护主要指日常养护和修缮,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原则进行。在实施过程中强调采用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的方案,必要时亦可使用一些现代的材料和工艺,如基础加固、化学保护等方法。文物建筑本身保护按工程性质分为五大类,即:(1)经常性保养维护工程(日常养护)。如除草、勾抿、油饰等。(2)抢险加固工程。指某建筑因年久失修,遇外界干扰造成的破坏而采取的抢救性工程。如采用支顶、落架、局部加固等。(3)重点修缮工程。是指建筑出现危险,有计划地进行的大型修缮。(4)局部复原工程。是建筑的某一部分经后人改动,与原结构年代形制不符,局部需进行复原的修缮工程。(5)保护性建筑物与构筑物工程。是指为保护某文物而进行的附属工程。

近十年来虽进行了600余项的保护修缮工程项目,但其中很少见到日常养护工程的项目。文物建筑屋面的清陇、除草、勾抿、下架油饰是文物建筑防漏延年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春秋两季进行,花费少,见效大,古来有之,但现在人们往往忽视,这是应该强调的。

局部复原工程要求有可靠依据,门头沟清水镇齐家庄灵严寺大殿的出际恢复就是成功实例。修缮设计时已考虑到出际问题,但出际依据不足,经实地拆除发现出际被后人修缮时锯掉的痕迹,依照法式及当地建筑模数予以恢复。另外有一部分建筑的“局部复原”工程画蛇添足的味道很浓。还有一些复建工程项目,因前期勘察工作不细不认真,具体实施时出现了很多笑话,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

文物建筑的环境保护主要是指环境风貌的保护。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规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一般是以围墙内外若干距离为界。建设控制地带可分为几类,限定建设高度、体量及形式,以协调文物建筑风貌和视野。环境风貌的保护和对文物建筑本身的保护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

3. 文物建筑修缮保护工作好与坏的前提是勘察设计工作。

文物建筑的勘察设计工作根据《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管理办法》与《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进行。完成的设计文件包括:现状勘察报告;现状实测图(残破现状图)和修缮设计图;现状照片;修缮方案说明书及设计概算等。具体要求在两个办法中均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需要强调的是勘察设计工作是修缮保护工程的关键,它涉及到工程的范围、规模、工期、修缮方法和基本投资额诸方面。为慎重起见,除具有独立承担工程专业设计资质能力的人员主持外,还应征求古建筑专家和有关方面的意见,以求尽善尽美。也是平时所说把问题尽可能地消灭在图纸、文字中。勘察设计中的实地测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场测量不细,制图时用《则例》套模数,图纸与实际不符,不能指导实际操作,造成施工困难。还有些图纸画的很细致,施工时无用,仿佛是在作画,这些均是这些年设计中的通病。至于严格掌握文物建筑修缮原则进行修缮设计就更加至关重要了。目前,北京有进行文物修缮

设计资格的设计单位上百家,经常性从事文物建筑修缮设计的也有十余家。某些单位文物意识不强,片面认为古建筑本身设计不合理,改进或大量增加不必要的加固构件,在文物建筑原材料上打眼钻孔,而造成材料的整体性能的破坏。如某一碑亭大修时增加不必要的铁活竟达数百公斤之多。所以,目前严格审批,加强勘察设计单位的文物意识的教育工作已迫在眉睫。勘察不细出图不全也是目前文物修缮的通病之一。以油饰彩画为例,“油饰彩画按传统作法做”一句话了事。近十年来虽反复强调勘察设计工作的重要性,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要做好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勘察设计工作必须抓紧抓好,使实施过程中有据可依,施工有依据,质量监督有规矩,验收有蓝本。

4. 文物建筑修缮施工质量是保护工作的关键与目的。

文物建筑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為了用。其作用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它做为历史上的实物例证,也就是经常说的史证价值。因为若没有史证价值,它在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新建的借鉴,以及作为旅游资源等各方面作用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所以在文物建筑保护修缮过程中,应千方百计地确保它的史证价值不受损伤,而保证不受损失的关键就是施工质量。近十年的文物修缮施工过程中,除强调施工设计,质量监督及竣工验收各环节,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按科学规律办事。必须尊重科学的规律性,方能确保施工质量。如拆装的方法,窰瓦的时间,油饰彩画的季节等等。以油饰彩画为例,有些为了赶任务,在大木构件(新构件)未干燥前就做了油饰,油饰后木料内水份不能蒸发,造成构件内部腐烂,这种实例很多。所以为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就得依靠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向领导和群众做好解释工作,讲清道理,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2)施工中尽量保持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尽可能地使用原构件。在古建筑油饰这个行业中,自

50年代末期,油漆的大量使用,传统的挫光油技法逐渐停止使用。油饰中使用油漆的优点是工程进度快,缺点是色泽不庄重,不延年,缺乏古建筑的韵味,弊大于利。1997年在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倡导下,发挥老匠人的积极性,恢复了挫光的传统材料和工艺,并在端门等十几处重要文物的油饰中取得了成功,使这一古老的技艺不致失传。另外,原构件的使用是保存文物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构件只要符合使用规范或加固后符合规范的就应当使用。有些设计和施工单位为了省事或加大工程造价,尽量使用新材料,造成文物价值大大降低的现象,近几年由于各管理部门严格把关,这些问题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三、近十年北京地区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基本评价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

近十年来由于《文物法》的宣传普及,公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由于政府投资等力度的加大,同时社会团体、集体、群众投资修缮文物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所有这些对于保护修缮文物建筑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重要建筑三分之二以上的险情得到了排除。通过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每年都有2—3处新的景点或新的内容对群众开放,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相应的保护工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应引起重视。笔者管见如下:

1. 加强基础工作的调查研究,搞清文物建筑家底,列出重点。重点保护带动全面保护。每个区县都应明确在辖区内的重点项目。

2. 加强文物法制意识的宣传工作。使文物保护法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在宣传过程中不但要向群众宣传,也要向各级领导宣传。

3. 加强文物建筑勘察设计队伍的素质

建设。素质建设包括文物保护原则素质和设计技术素质。尊重历史尊重现存实物,勘察要细,设计要精,突出精品意识。设计成果要实事求是,不要自以为是,避免出现缺柱少梁之类硬伤以及各种不负责任的现象。

4. 加强施工单位队伍建设。目前实行的项目备案制,项目经理及农民工培训持证上岗等各项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应坚持下去。同时,应完善对其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其在施工过程中有据可依。在队伍建设中要加强对工人文物意识的教育,因为他们是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实践的第一人。也不要为追求速度,追求效益,出现不按规律办事的“自然伸缩缝”现象。(为赶工期,基础未做好,因此造成不均沉降,墙体出现裂纹。)

5. 进一步加强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质量监督工作是政府行为。是代表政府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的一种直接方式。近十年中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取得的成绩,与质量监督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加强。凡是没有执行质量监督程序的工程应依法对设计、施工及管理使用单位进行查处。

6. 严把审核审批质量关,是文物保护修缮成功或失败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审批过程中要严格文物保护修缮的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合理利用的方面。在改建、迁建、复建时特别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以交学费为由而失去审批的科学性和原则性,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交不起学费的地步了。

7. 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不要以各种借口回避。在新材料和新工艺的使用上根据实际情况,也不能排除,但一定要稳妥,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要盲从。尤其是化学保护方面,它虽然有先进的一面,但终究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以上是笔者近十年来经过实践对北京地区文物建筑保护工作摸索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正处级调研员)

房山地区文物事业展望

郭志族

房山,地处北京西南,属燕都旧地,古老深奥,钟灵毓秀,素有“幽燕奥室”之称。在全区 2019 平方公里土地上处处留有历史进程的印迹,展现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北京远郊区文物最多的区。

时间已进入新的世纪,文物这个极其宝贵的、不能再生的特殊资源,如何妥善地加以保护,如何为经济建设这个大中心服务,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如何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它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为此,就房山新世纪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提出如下构想。

一、文物事业发展的方针和思路

在新的世纪,房山文物事业的发展将继续贯彻“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以发挥优势、转变职能、改善投资环境,坚持开发利用带动保护的指导思想。

房山区文物资源丰富。全区现有文物 302 项,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3 项,市级重点文物埋藏区 2 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52 项,一般文物 234 项。这些文物古迹,汇集成一部宏大精深的博物馆,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科书。我们要珍惜爱护,让它为全区“两个文明”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所谓转变职能,即指文物行政管理工作要从单一执法型向执法服务型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注重依法管理。而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物行政管理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而且必须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的职能既要依法管理,同时又要为文物开发利用做好服务,二者兼顾,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事业

发展的需要。

改善投资环境,主要是提高服务质量和对文物开发利用所制订的优惠经济政策。目前,我区的文物投资环境还不十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够宽松。例如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在个别部门仍然严重存在“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的衙门作风,还存在办事效率低,审批时间过长。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严重影响投资者的积极性,甚至失去信心和决心。改善投资环境,职能部门就要把投资者视为“上帝”,满腔热忱地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对于投资文物开发者要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投资者大部分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看重了文物旅游发展的广阔前景和丰厚的回报。没有优惠政策,就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到我区来投资。因此,我们要真正落实“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二、当 21 世纪来临之际,我区文物事业的着眼点应放在三个方面

一是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也就是文物基础研究工作。文物保护,文物的开发利用,研究是基础。我区是文物大区,就目前而言,文物研究工作与“大区”地位不相称,在文物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局的《房山历史文物研究》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已作为学术专著出版并受到有关专家的充分肯定。“十五”期间,我局要全方位开展房山历史文物的研究工作,我们要完成《房山文物志》的研究和撰写及出版工作,目前我局正着手进行市社科规划办及市文物局的立项工作。以文物研究推动文物保护和文物开发利用,进而为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是实行文物开发带动文物保护的新思路。在新世纪提出“以开发利用带动文物保护”口号,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例如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拨款抢救了大量文物,是功不可没的。如云居寺、万佛堂塔、昊天塔等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区目前还有相当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文物建筑亟待抢救维修,甚至有的区级文物(磨碑寺)因无钱维修而倒塌后消失于世上。所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变,文物保护单靠政府是不行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寻找文物事业发展之路。文物事业的出路必须到市场中找答案,运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我区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文物残破不全或破烂不堪,抢救的任务相当繁重,不修复就难以保护和利用。因此,吸引社会各界投资文物,发展旅游,就能够解决文物修复资金不足,达到有效保护的日的。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是实现了文物修复,达到了保护的日的就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文物开发是文物保护的重要途径,文物得以开发利用了,有人管理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文物保护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政府行为起着主导作用,在文物保护中,政府投资的主渠道作用是不可动摇的,一些重大项目,一些抢救性工程,一向是由政府投资的,它对社会力量投资开发文物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三是加强文物景区建设。文物既是一种文化存在,又是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充分利用文物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是新世纪文物工作的重要内客。已往我们在文物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云居寺的旅游开发、上方山的旅游开发、周口店猿人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的旅游开放等。但是就房山文物的总体开发利用而言,还需要做更大的文章。针对房山区文物点多面广的特点,我们将确立文物景区建设的观念,重点加强文物景区建设,以点带面,打文物开发利用的总体仗。比如我们正在策划云居寺旅游景区建设,以云居寺带动周边

的张坊、南尚乐、长沟地区的文物旅游。我们要根据房山文物资源状况和文物分布的具体情况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房山的文物旅游景区建设。面向新世纪的旅游景区建设,不仅会促进房山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更将把房山的文物保护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我们将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文物事业的发展

1. 加强文物法规宣传,增强人民群众文物保护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及文物资源和文物价值。使全民充分认识到文物不仅是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宝贵财富,而且是丰富的旅游资源。文物不但在我们这一代要保护好,还要完好地传给子孙,教育他们保护好文物。只有当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保护文物的历史责任时,才能将保护变成自觉行动。

2.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为文物投资创造宽松环境。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涉及到文物、规划、旅游、土地、民政、工商、公安、消防、林业等许多部门。文物部门要与其它职能部门积极协作,从房山经济的大局出发,树立服务意识,千方百计地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做好文物旅游开发的文章,推进开发利用的速度,为全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 加强队伍建设和研究工作。经过多种形式的培训,要培养出一批在房山史、考古鉴定、博物馆学、古代建筑等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研究人员。

4. 充分发挥房山区文物保护协会、房山石经研究会的作用。

5. 积极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物事业投入机制。形成政府投资为主体,自筹资金、社会投资并行的新格局。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需要的资金数额是巨大的,需要各级政府必要的资金投入,同时要积极鼓励企业、集体、个人及海外人士投资文物公益事业及文物的开发利用。

(作者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局长)

关于 老山汉墓 考古发掘与研究 的构想

孔繁峙

老山汉墓的发现,受到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界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地进入到墓室夯土的清理阶段。老山汉墓的发现与发掘,再次唤起人们对北京地区汉代历史及文化的关心与重视,从而,也促使文物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北京地区汉代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工作的。

西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重要时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处在变革、发展的重要阶段,“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民族间的融和都有了新的提高,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西汉时期,北京地区是汉王朝分封的燕国所在地,也是我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的重镇,对汉代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研究,是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历史环节。长期以来,由于时代久远以及历代以来人们的生活、建设,使得目前北京地区保存的汉代遗物极少,除部分文献记载外,对汉代历史文化的考古工作,也是局限于小型墓葬、生活遗址、生产工具、陶井、陶器等零散实物资料,因此,没能取得从整体上对北京地区西

汉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1974年,大葆台西汉陵墓的发现与发掘,曾一度使北京地区西汉历史考古工作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是,由于大葆台西汉墓曾早期被盗掘,墓室受到严重破坏,部分残存的随葬品也很难对当时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研究和整体认识,在此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市汉代历史考古与研究工作的再次处于停顿不前的状态。所以老山汉墓的发现与发掘,再次引起全市民众的兴奋心情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视。随着墓葬发掘工作的进展和大量随葬品的出土,将会极大的丰富北京地区西汉时代的历史考古资料,这对于推进北京地区汉代历史文化的考古研究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掘的基本思路

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研究制定了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方案,其工作步骤为:

1. 现已完成墓口上部封土的发掘工作。目前,墓口以下至墓室顶板还有3米左右的夯土层,按考古发掘要求,开10米×10米的探方4个,约挖掘清理夯土1200立方米。

2. 清理提取夯土与墓室之间的青膏泥和木炭。根据钻探得知,在墓室夯土层以下

有 10 公分至 30 公分的一层青膏泥；在青膏泥与墓室顶板及周围有一层 5 公分至 10 公分的木炭（部分呈粉状），将对其一一揭取，全部保存。

3. 进行墓室轮廓和墓室顶板的清理。据对夯土层的初步分析，墓室局部可能出现坍塌，需要认真清除墓室上部因坍塌所造成的夯土、青膏泥、木炭的混合物，露出墓室的整体轮廓。

4. 对墓室进行整体测绘和全景拍照，留存墓室的整体数据和全景资料。

5. 搭建遮阳防雨大棚。为保证发掘工作在今后数月内正常进行，特别是在雨季之前，将用最快速度搭建发掘现场的整体罩棚，最大限度地满足和保证墓室清理工作的需要。

6. 揭取墓室顶板。根据墓室保存完残状况的两种可能，制定了两项方案：一是在墓室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其顶板原样保留，着重清理墓室南侧墓道与墓门结合部位，清理墓门；二是在墓室坍塌的情况下，清理和揭取墓室顶板。

7. 进行墓室内部随葬品的清理工作。此项工作是整个发掘工作的关键阶段，清理工作将按以下程序依次进行：

(1) 清理与墓道相连接的墓室外侧墓门，进入外回廊，并清理外回廊南侧的随葬品；

(2) 清理墓室第二道墓门，即墓室前厅大门，进入前厅，进行前厅陈列的随葬品的清理工作；

(3) 清理后室大门，进入后室，即“梓宫”，为更好地对“梓宫”进行清理工作，计划将棺槨整体运至“水关博物馆”库房，层层开棺清理棺内的随葬品；

(4) 清理内回廊（便房）中的随葬品和内回廊内壁及构件；

(5) 清理外回廊中的随葬品；

(6) 发掘墓室内侧的主墓道，据钻探主墓道长度达 40 余米，清理墓道内随葬的车马葬具；

(7) 发掘墓室东南角、东北角处的两条

墓道，清理其墓道内的随葬品和埋藏物。

随后进行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工作和开展墓室复原工作。

二、对各类出土文物的保护措施

对地下出土文物进行妥善保护，是当今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地下埋藏两千余年西汉墓葬中出土文物的保护，是这次考古发掘工作中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在研究制定汉墓发掘方案的同时，研究制定了出土文物多学科参与的保护方案：

1. 对揭取的全部青膏泥和木炭，立即入袋封存，待日后进行年代测定、成份分析、墓室复原和开展相关学科研究使用。

2. 对墓室的顶板、棺槨和题凑木等全部木质材料采取化学保护措施。市文物研究所与聘请的林科院木材研究所联合成立了“木质材料保护小组”，研究制定了保护方案，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对揭露出的墓室顶板及清理当中的题凑木，立即喷洒化学药液，可使棺木在高温潮湿的夏季不出现腐蚀霉变；然后，随着墓葬的清理工作的进展而对提取的墓室顶板、题凑木等，进行药液浸泡，以达到彻底保护的目的。同时，委托林科院木材研究所对墓室的顶板、题凑木、梓宫、便房（内回廊）等各部位木质取样鉴定，以确定其各部位所用材质。

3. 对极有可能出土的漆器、木器、竹（木）简的保护。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专题保护小组，研究制定了保护措施，对有可能出土的漆器、木器、竹（木）简等首先采取防脱水处理，然后分别采取不同的化学药液进行防腐处理。

4. 对可能出土的帛书和各种丝（织）品的保护。聘请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担负帛书、丝纺织品出土后的清理、保护和复原工作；聘请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对极有可能出土西汉帝王追求的“长生不老”养生处方及古医方等帛书文字材料的整理工作。

5. 对于可能出土的铜器、铁器、陶器等

器物的保护。由市文物研究所和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专题小组,负责对出土的各类质地的器物采取防腐、防风化、防锈蚀的保护措施。

6. 对可能出土的人体骨骼的保护,拟请医科院协助市文物研究所,对出土的人体骨骼采取消毒、防腐措施并妥善保存。

三、考古研究课题的初步设置

1.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多门类、多学科研究,争取综合性科研成果。

(1) 利用空中遥感技术,对汉墓周围地下埋藏情况进行遥测。遥感技术可以从空中借助照像得到在地面调查不易发现的现象,利用遥感设备通过物体辐射取得目标的信息,采用微波、红外线、紫外线、X 光线在遥感设备中产生的反应,以分辨老山周围区域的土壤、地形的细微差别,不同季节植物生长状态的对比等等,经过分析对比各种现

象的差别,就能探明老山汉墓周围的区域埋藏、地下遗址、遗物和地面的封土情况,从而确定和掌握老山周围的整体地形环境和埋藏状况。

(2) 对出土的木炭进行 C^{14} 年代的测定。这是考古界对遗址和墓葬普遍采用的年代测定方法,老山汉墓将有大量木炭出土,通过采用 C^{14} 的年代测定方法,确定木炭中的 C^{14} 的衰减程度,来推算出墓室的下葬年代,为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依据。

(3) 开展“树木年轮断代”工作。汉墓发掘中将出土大量的同一时代原木,利用墓中同一气候区域的“考古木头样品”的年轮谱,建立起公元前 2 世纪以来的主要树木年轮序列,可与大葆台出土的“黄肠题凑”等原木,共同形成这一时期的有北京地区特征的年轮谱,再结合今后的发现,逐渐形成北京地区年代连续比较长远的主年轮序列,做为北京地区测定汉代遗址及文物年代的一项重要手段。



老山远景

此外,还可以采用“热释光”断代方法,对墓中出土的陶制品进行受光现象的测定,以确定陶器的烧制年代,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依据,等等。

(4)开展古代植物孢子花粉分析方法。在汉墓发掘的整个过程中,已分别从夯土的不同层位提取了大量土样,按照考古植物学的方法,通过对夯层中所留各种植物的孢子花粉进行分析,能够确定当时的植物种类,根据不同植物的自身生长环境及特性的分析,揭示出西汉时期北京地区的气候情况和地理变化,从而复原西汉时期北京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植物生成及农作物发展状况,这对北京地区现代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采取分子学技术,破译墓主人的人体“基因”。对墓葬中可能出土的人体骨骼,利用现代科学方法——DNA测定,以取出骨骼中少量的“基因”分子,可以用现代技术复制其整体。同时,还可以把老山汉墓墓主人的“基因”分子,同大葆台、满城汉墓等刘氏王侯的骨骼“基因”分子的序列相比较,可以确定并分辨其血缘关系的远近或是否有血缘关系等,更能够破解二千年前刘氏各王侯真实身份问题之谜。

2. 对墓主人确认问题的研究。

根据目前的勘探发掘和墓葬规模,众多专家一致认定老山汉墓是西汉时期的一座王陵,这种观点已被社会认同。但西汉时期在北京地区受封为王的共有12位,墓主人究竟是哪一位?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也是考古工作所要研究和最终搞清的突出问题。

目前,各界专家和学者纷纷依据历史文献和墓葬的地理位置对墓主人的认定进行了推测,目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4种观点:

(1)认为应当从西汉时期在北京所有受封王位的范围推测墓主人是哪一位。有关西汉燕国诸王的陵墓历史文献记载不多,更何况二千年来地区沿革和地域名称均有巨大变化,北京目前的河流、山川、地

域名称及其位置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差异,同时,历史流传至今的文献材料只是考据的一个方面,真正可信的是考古出土的实物证明,截止目前,北京地区分封的12个燕王的陵墓(在都修过陵墓的前题下),能够确认的只发现大葆台一座,因此,老山汉墓的墓主人应是剩余的11个燕王中的一位。

(2)主要是依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有关部分燕王王位的变更情况,认为老山汉墓墓主人的范围可以缩小一些;按史料记载,在曾受封的12位燕王中,燕王臧荼于公元前206年受封,其在位只4年,因谋反被刘邦率军征讨并俘获;并另立卢绾为燕王,公元前196年,卢绾亦有谋反之举而被汉军击败,最终客死匈奴;燕王吕通是吕后的侄子,封燕王不久吕后就病死,吕通与吕后的其他亲族一起被消灭,这三位未能善终的燕王不可能在其身后所建如此规模的陵墓。因此,老山汉墓的主人可能是燕灵王刘建、燕敬王刘泽、燕康王刘嘉、燕王刘定国、燕刺王刘旦、广阳穆王刘舜、广阳思王刘瓚、广阳王刘嘉等8位燕王中的一位。

(3)认为根据《史记》、《汉书》、《金史》等有关记述,墓主人的范围还可以压缩的再小些;除文献资料记载的未能在王位保持善终的臧荼、卢绾、吕通三位燕王外,因兽行自杀的燕王刘定国和西汉末期被王莽废为庶人的广阳王刘嘉,其二人身后同样不会修建陵墓,也应当排除在外;同时,《金史》中记载的在扩建金中都城工程中、于东城(今西琉璃厂南侧)发现的燕灵王刘建、燕康王刘嘉的陵墓,并于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迁葬于今顺义县的文字记载是可信的!这样老山汉墓墓主人范围,应当是燕敬王刘泽、燕刺王刘旦、广阳穆王刘舜、广阳思王刘瓚这四位中的某一位。

(4)认为老山汉墓墓主人极有可能是燕刺王刘旦,其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按有关文献记载,燕王刘旦自杀身亡后,仍保留了诸侯王的身份,特别是天子还

特赐刘旦死后的谥号为“刺王”，再加之刘旦本身又是当时天子之兄，依此特殊身份，其身后定会享受生前王侯待遇，同时，刘旦在燕国王位长达 38 年，从时间推算，其陵墓已基本营造完毕，其按王陵埋葬的可能性极大；二是，据史料记载，刘旦死后不但有陵墓，而且还有同其谥号相近的陵墓名称——“戾陵”，在汉以后历代的文献材料都有涉及“戾陵”的记述：如曹魏时期，驻守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为治水患，“寓兵于农”，于嘉平二年（公元 250 年）“道高粱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入灌田，岁二千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载：“泲水（永定河）又东南，高粱河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注，经燕王陵北，又东经蓟城北……”等等，历代的记述不但确认了戾陵的存在，而且自汉以后已将戾陵所在位置做为一个地域方位的名称，因此断定老山汉墓应是燕王刘旦的陵墓。

以上意见，反映了社会各界在对老山汉墓主人确认问题的讨论中的不同观点与看法，也是在此问题的研究中所做的积极探索，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对该墓主人的确认问题，若能“开棺有结论”，此探索将告结束；若“开棺无结论”，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将会结合新的出土资料而进一步向深入展开。

3. 对“黄肠题凑”结构的研究。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老山汉墓已被确定为西汉时期的燕王陵墓，当前的发掘工作尚未发现早期被盗的迹象，近期的盗掘者也未进入墓椁，专家们初步认定，到目前为止，老山汉墓是在全国发现的非常罕见而完整的汉代王陵。据最近一次的墓室钻探，得知该墓的墓室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墓顶全部为柏木枋，其墓室结构很有可能会出现像大葆台汉墓那样的“黄肠题凑”木椁或葬制，这将为我们全面研究和认识“黄肠题凑”的墓室结构提供更为准确的实物资料。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发掘的西汉时期“黄肠题凑”型制的陵墓数量有限，而发掘的这些陵墓，其墓室或由于早期被盜

而遭破坏，或由于年代之远而腐蚀严重，均不能按原貌而全面复原，使我们对“黄肠题凑”墓葬形制及结构的整体认识存有很多缺环。这次老山汉墓的发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完善以往实物资料的不足之处：

(1) 通过发掘掌握和认识墓室的前厅、后室及“便房”之间的结构。由于大葆台汉墓早期损坏严重，致使此处结构至今无法确定。通过老山汉墓发掘的实物，将研究和复原墓室内前厅与后室之间的隔墙结构和进入前厅、后室之间门扇的做法以及“便房”与前厅的进出通道及“便房”门的做法、结构等等。

(2) 对“梓宫”材料的研究。文献记载：“梓宫”为梓桐木制成，梓桐为落叶乔木，在古代为“美材”，其木质轻软而耐朽，《齐民要术》中称“以做棺材，胜于松柏”。从阴阳家的观点看，梓桐属阴性，生长的地点常在背阴之处，史书曾有“南山之阴见梓”、“北山有梓”的记述，帝王下葬选用梓木为棺，这里也有阴阳观念的因素。以往因为资料所限，我们对梓木的研究认识还很不够。通过对老山汉墓出土“梓宫”材料的分析、研究，以确认“梓宫”是否由梓桐木制成？梓桐木是何类树种？此类树木现在世上是否继续存在？目前北京地区有无此树木生长？等等。

(3) 对墓室“外回廊”形制的研究。西汉大型墓的“外回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主椁外侧的木“库”演变而来，称为“外藏椁”，做成回廊形式。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其做法不尽相同，如文景时期的长沙王墓，“外回廊”在内椁与外廊之间，并做成 12 间单室成为 12 个“外藏椁”，而大葆台汉墓的“外回廊”由板壁做成，为贯通的回廊式，这一形制上的做法及变化，应结合老山汉墓的发现，深一步进行研究。在“外回廊”的使用上，大葆台汉墓使用了双层“外回廊”，而老山汉墓的钻探结果初步确认只使用一层“外回廊”，王室墓中使用双层与单层“外回廊”的区别，是否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等级

上的差异?还是受封王位尊贵程度上的差别?这也是老山汉墓的发掘工作中需要研究的问题。

(4)研究内、外回廊的不同用途及各自功能。从目前各地发现的同等类型的墓葬情况看,墓室中内回廊(便房)和外回廊陈列的都是墓主人的随葬物品,按古代阴阳家的观念,墓葬中各种随葬品的陈列是墓主人地上生活的再现,帝王在生前居住的宫殿、占有的财富和富贵的生活都会反映在营造的墓葬之中,这内、外回廊的使用功能很有可能参照地上的生活而有不同的分工和用途,大葆台汉墓因早期被盗严重,内回廊只残存部分陶器;外回廊存有陶俑、马匹和动物骨架。目前还无法准确认定其内、外回廊的陈设、使用功能,若老山汉墓未被盗掘,随葬品又十分完好,即可按清理发现的随葬物品的种类及摆放位置,研究和认定内回廊(便房)和外回廊的各自使用功能。

(5)研究复原“黄肠题凑”墓室顶部的梁架结构和做法。各地发现的同类墓葬和大葆台汉墓都因墓室坍塌腐朽严重,致使顶部的梁架结构及工艺做法已成悬念。大葆台汉墓墓室顶部复原时,根据部分残存的构件和文献的记述,按推测的三梁四柱结构进行的顶部梁架复原,墓室其它部位的复原仍有很多缺环。按目前老山汉墓发掘情况推测,其墓室的总体结构可能保存较为完整,若今后的发掘果真如此,那将会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可以使我们获得对“黄肠题凑”墓室顶部梁架结构的准确认识,同时,也为大葆台汉墓等同类墓葬的墓室顶部“恢复原状”提供了准确而可信的依据。

4. 开展对西汉时期北京城址——蓟城位置的研究。

据文献记载和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燕国即废弃在今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的旧城而以“蓟城”为都城。我市历年来在对琉璃河商周城址的数次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晚于春

秋战国的大面积的城市遗址和文化堆积,而在北京城区西部却经常发现春秋战国至汉代以来的文化堆积和遗物。1965年在北京城西会城门村东经白云观、象来街,东至和平门一线发现151座春秋战国和汉代的陶井,其中属春秋战国时期的为36座,汉代的为115座,其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在今北京宣武门与和平门一线,其中有的地方6平方米内就有4处陶井遗址^①;1965年以来,在宣武门外西侧,广安门内外等处又发现65座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陶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仍在广安门、和平门一带,约为50余座^②;1997年以来在和平门外一带的危改工程中又先后发现十余处汉代的陶井遗址;1972年在和平门外韩家潭又发现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独有的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战国时期燕明刀货币和细纹陶片^③。如此集中的生活遗址,是只有城市才会出现的现象,由此,考古界推测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北京城——蓟城遗址应在今宣武门、和平门一线往南这一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缺少证明蓟城准确位置的史料。老山汉墓的发现与发掘,极有可能在随葬品中发现的帛书、竹(木)简等文字资料会记述蓟城的位置、建设状况及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为我们最终确定西汉时期的北京城——蓟城的准确位置,提供最为翔实而可信的文字材料。

随着老山汉墓清理工作的深入进行,一座保存完好的西汉陵墓和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即将被发现,在这一重大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对西汉时期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工作,将会进一步引向深入并取得新的成果。

^①苏天钧:《北京西郊的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②北京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③北京文管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第2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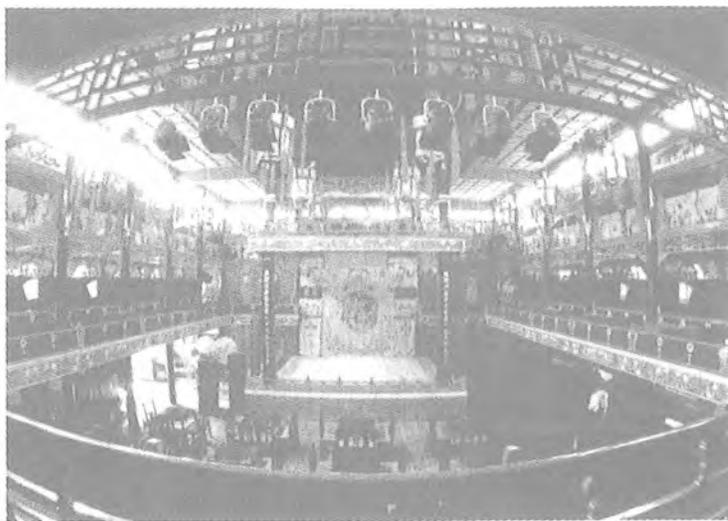


图13
会馆戏楼内部
(赵德春摄)

北京湖广会馆建筑

附：会馆与戏场杂考

王世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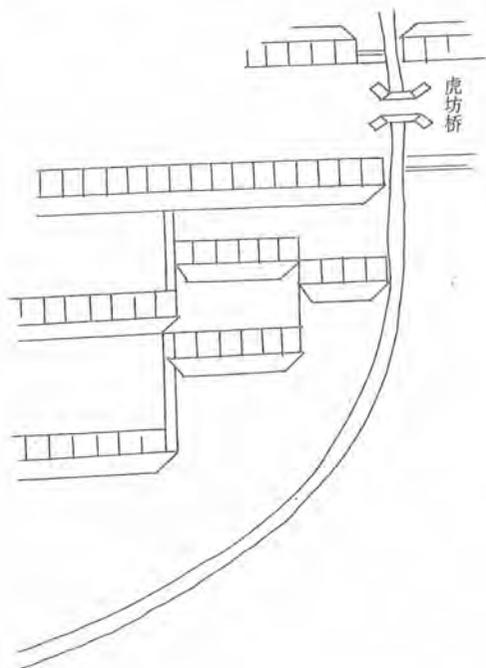
一、湖广会馆修建历史

北京湖广会馆位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与虎坊路交角处，清代属外城之北城。会馆建筑沿革，详记于1947年北平湖广会馆董事会编印之《北平湖广会馆志略》，石荣璋编纂；1994年燕山出版社出版，王灿炽点校本，名《北京湖广会馆志稿》。简言之，会馆在乾隆时为张惟寅宅，后又为王杰、刘权之、叶继雯宅；道光十年（1830年）大修，增建戏楼罩棚；道光二十九年又重修，布置庭园；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892—1896年）又大修。现据建筑遗存，再作补充考订。

传留至今的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是非常可靠的北京历史地图。图中虎坊桥西南今会馆位置已有东侧河沟，但沟西建筑是三排平房，间数较多，似是一处作坊或货栈，而

不是住宅。张惟寅在乾隆元年中进士，十五年之内尚未在此建住宅。他最高官职做到盐运使，是从三品，按《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三品至五品官职，（宅第）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五架。”这个规格的宅院与后来会馆的中部，即戏楼至文昌阁、宝善堂间的尺度大体相符，似可以推定会馆这部分基地即是张宅，建成时间至少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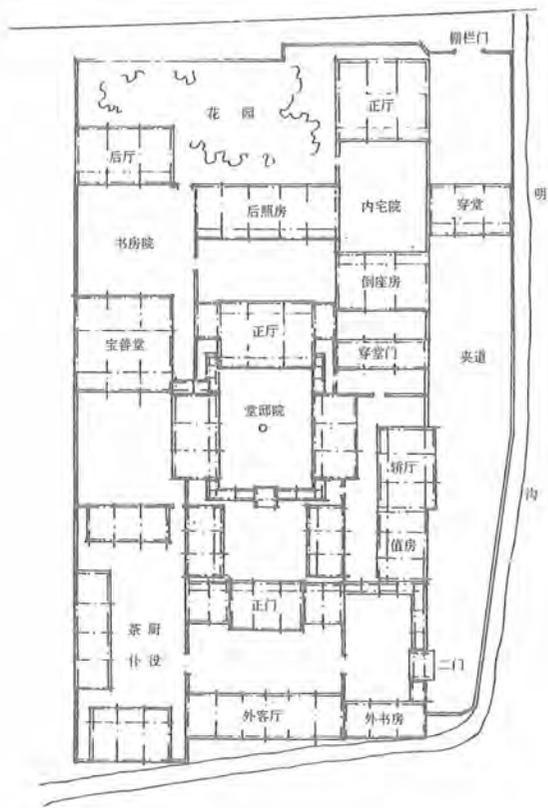
继居者王杰，最高官至东阁大学士，是正一品，按《清律例》，厅堂可至七间。但清初汉官皆住外城，房屋普遍较内城八旗官员狭窄。如同为一品官的梁诗正宅（在杨梅竹斜街）、纪晓岚宅（在虎坊桥东大街，今晋阳饭庄），厅堂都只不过是五间，只是尺度较一般民居的五间正房宽敞。所以王杰继居张宅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再拆改增大。清代北京的达官贵族住宅，其主院纵深最多可至四进



乾隆 15 年 (1750) 以前 (摹自乾隆京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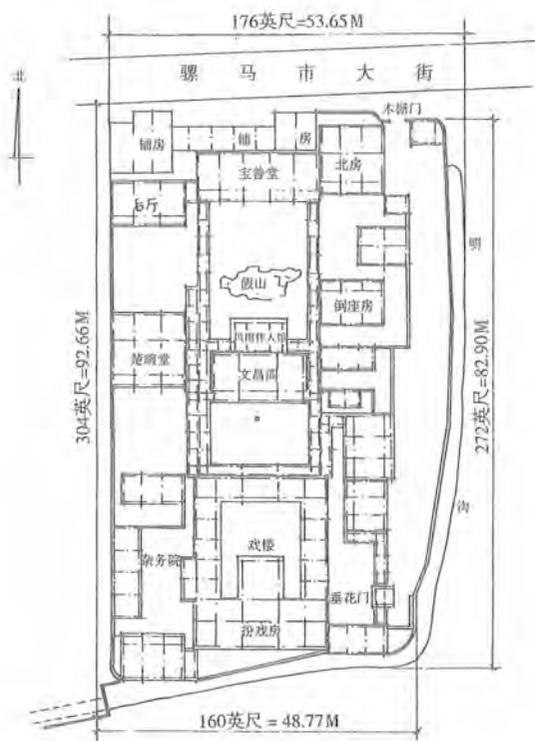
(图 1-1)

(图 1-2)



嘉庆 12 年 (1807) 以前王杰、刘权之府邸(笔者推测)

图 1 湖广会馆总平面变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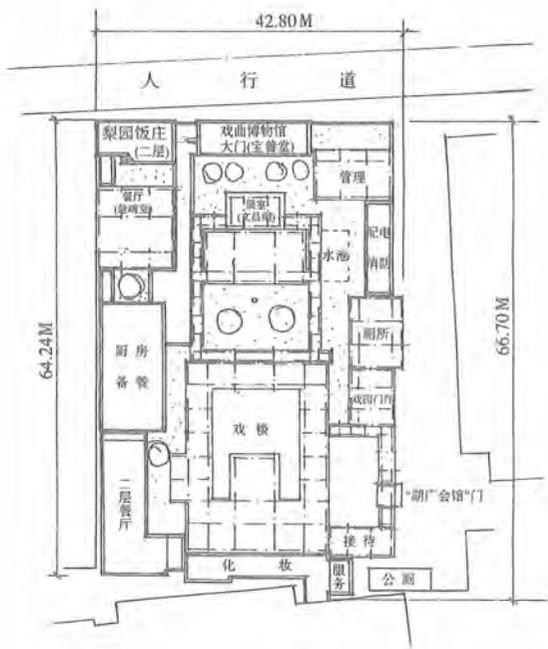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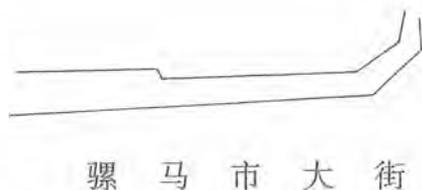


光绪22年(1896)至1927年湖广会馆(据1927年测绘图)

0 5 10 20 30M

(图 1-3)

(图 1-4)



1996年湖广会馆——北京戏曲博物馆

0 5 10 20 30M

院落,主体是厅堂,主要院内一般不住内眷,是祭祀、庆祝、议事、待客的堂邸部分。主院之旁常有两组与之平行的偏院,一为内眷住所,一为花园书房。三院之后有一排照房,是储藏、供役用房。偏院前部还有马厩、轿厅、厨房等附属部分。这种一主二偏,三院并列的格局与后来会馆的总平面很相似,有可能中间的主院是原张惟寅宅,也是后来王杰、刘权之宅的堂邸部分,东西两偏院为内眷住宅(东院)和书房花园(西院),是后来扩展出来的。

王杰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同年刘权之任礼部尚书,是从一品,正好有资格继居此府。至于叶继雯,于嘉庆五年迁入此宅时,不过是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直到十二年住宅改为会馆时,才升到正六品的宗人府主事,无资格继承一品大官的邸宅,只可能借住王杰府中的偏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嘉庆五年已成叶宅,而十二年反由刘权之出面改为会馆,原因就是此宅在嘉庆十年以后就属刘所有,叶仍继续借住偏院。至于道光三十年叶继雯之孙叶名沅写诗仍称会馆是“余宅”,不过是借遗迹以事增饰的陋习,不足为凭。要之,此宅在改为会馆以前为张惟寅新造府第;后为王杰之宅,扩大了规模,时间约在乾隆后期;嘉庆十年叶继雯借住偏院;嘉庆十年刘权之迁入,两年后改为会馆。

嘉庆十二年改为会馆时,估计仍是原来府第格局。道光十年大修,原状改变颇大,现存《重修湖广会馆碑记》记载的主要工程有:“升其殿宇,以妥神灵”,即建造文昌阁以供奉文昌帝君;“正建戏楼盖棚”,戏楼指舞台,盖棚指剧场,现在通称戏楼;“其旧料拆盖于西偏宝善堂之前,以为余屋”,旧料指的是主院建造戏楼、文昌阁,必然要拆去原来建筑的木料。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西院的主要建筑是宝善堂而不是楚畹堂。碑文未提东偏院,应是无大改动。以上工程共耗银五千余两,按当时的建筑造价,工料都不可能很考究,尤其是戏楼罩棚,用料普遍偏小。

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大修,历时四载,耗银18994两余,工程很大,最终形成了1927年测绘的总平面的格局。从用银数估计,除戏楼和文昌阁外,其它建筑都可能是这次新建或改建的。如:宝善堂迁建(实际是新建)到中路北面;西偏院新建(也可能是改建)楚畹堂,堂北又建三间厅;东西偏院的建筑也有部分重修改建。值得注意的是文昌阁后的风雨怀人馆,两侧有斜廊,前面有假山,颇具庭园趣味。据载,会馆假山为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九年会礼部侍郎时,“亲往布置”。但据《(曾)文正公家书》,这次工程“拟于八月兴工,十月可毕役”,两三个月建造的馆舍、亭榭、假山,质量必不会高,可能在光绪年间大修时重建了风雨怀人馆,拆去亭榭,留下假山,围起游廊,以宝善堂为正厅成为会馆的议事场所。(图1)

二、总体布局

湖广会馆现存最早的形象资料是1927年实测的总平面图。(图2)其中主要建筑的位置和形制基本是光绪二十二年(1890年)以后的状况,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至道光间官员府第的痕迹。

会馆东、南二面临河沟,西邻为别姓地基,只北面临街,所以在作官宅时大门也在北面,是为“倒座门”。按北京的街巷布局,绝大多数的四合院大门非南即北。南向大门与厅堂同一方向,布局简单规范。北向大门受地段尺度限制,有多种布局形式,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门虽向北,量尺度、形制与南向大门完全一致,只是进门后为一条南北巷道,到南端后又转向北,再进二门。另一种是北向大门只作标志处理,常用二柱一楼木栅门,也有的是三间穿堂门,进门后也是经过南北巷道转而向北,但在南面按宅主身份另建正门,无论是前者的二门或是后者的正门,在其外面的都属外院,通常多是轿马役夫及其它服务用房所在。1927年湖广会馆总平面图北面东部墙

湖广会馆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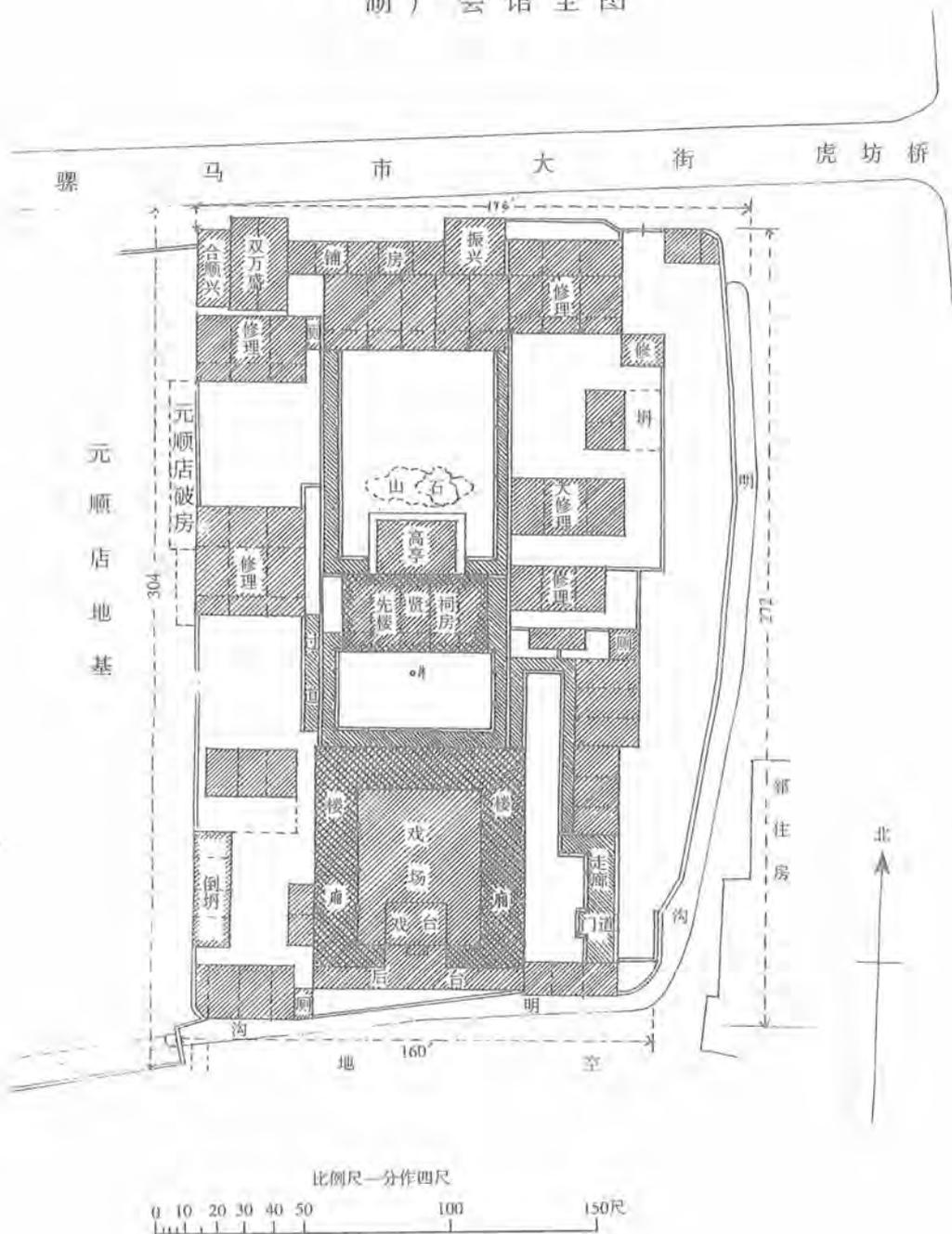


图2 1927年北京湖广会馆总平面(据《湖广会馆董事会文件一斑》摹绘)

上为栅栏门,即是原府第大门,进门后可能还有一座小三间穿堂门。门内为巷道,西为轿厅值房。巷道南端向东之垂花门即是二门。进入二门(垂花门)后转向北,即会馆的中路,也是张、王、刘府的堂邸部分,虽经过道光、光绪两次改建,但其尺度正好符合四进院官宅的规模。第一院,北为三间穿堂大门,两侧平房各二间,南为倒座厅(客厅)五间;第二院,正面垂花门,两侧厢房各三小间;第三院为主院,正厅三间,两山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以抄手游廊连通;最后一院正面为后照房一排。再往后如有空地则是花园或仆役房。

西偏院正厅原为宝善堂,后改为楚晚堂,堂后又有后厅三间。其南部为府宅内部服务供应部分。东偏院南部为主院的外院,北院正厅三间,勾连搭,对面南倒座厅三间,其前又有穿堂三小间,应是书房院。总的看来,道光、光绪两次大修、改建,既没有完全脱离原来府第三轴并列、北面开门的基本格局,又要满足大型会馆祭祀、集会、议事等功能要求,最终形成了一个主体宏大,偏院曲折,戏楼为主,厅堂隐蔽的奇特布局,在北京的省级会馆中,这种布局可说是唯一的。

1942年翻修马路,会馆木栅栏大门向南退让,仍照原状重建,西偏院接建了一些平顶廊子,原来临街铺面房退后重建。50年代以后,东巷道大部分被临建挤占,院内驻进了工厂车间、机关和居民,拆了一些游廊,搭建了许多临建,直到1979年,基本范围和建筑仍未改变。后因展览骡马市大街,拆除了宝善堂和游廊,西偏院的北厅,东偏院的北厅和东厢房,总体上变动较大。按照1927年的测绘图,会馆总占地南北304—202英尺,东西176—160英尺,共4305平方米,会馆内建筑约2400平方米。1979年以后,总占地约2740平方米,减少约三分之一,原有建筑尚存约1570平方米。

三、主要建筑

会馆现存的建筑中,中部戏楼、文昌阁、风雨怀人馆,西院楚晚堂,东院北房(原倒座厅)、东厢房、垂花门、小南房,以及中院、东院游廊皆为原状,西院南部和一部分平顶游廊为后来陆续添建。主要建筑有:

戏楼:建于道光十年,位置为原府第的前院和中院。一层面积568平方米,二层楼座328平方米,合计896平方米。舞台坐南向北,柱间面阔5.68米,台宽7.08米,柱间进深5.68米,台深6.38米,共约45平方米。楼下大厅面阔五间,进深七间,北面明间辟隔扇门三间;东面辟板门一间,后代又辟一门;西面突出二小间,原为场面(乐队)位置。楼上包厢正面五间,两侧每面六间,北面二间为附属用房。楼梯窄陡,设于南面二隅。后台扮戏房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戏楼北面五间房,另加同样尺寸的五间披檐房,向南开三间隔扇门,正对后巷,向东开一侧门通向东院。

从外观看,戏楼为二卷重檐悬山式二层楼阁建筑,这是由戏楼特有的功能才出现的特殊形式。二卷屋顶中的高跨为十檩卷棚式,是大厅堂部分(即池座);低跨为六檩卷棚式,是舞台部分;四周下檐是包厢和后台。功能明确,结构形式也很明确。在结构上,三间大厅堂需要要有两条跨越四间的十架大梁,跨度11.36米,这样大跨度的木梁在民间建筑中是非常罕见的,官式建筑中也不多见,大梁断面 0.65×0.53 米,随梁枋 0.39×0.23 米,尺度显然不足。厅堂柱高8.04米,实际上是三层楼的高度。这座戏楼体量虽大,但在等级上不过是一座“盖棚”,所以制度不高,如屋面用仰合板瓦而不用筒瓦,上檐无飞椽(小式做法),柱用绿色(与游廊等附属建筑相同),外檐无彩画等。

戏楼中还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如楼上槛窗扇无棂格,为玻璃平开窗,包厢前有两层栏杆,东边另加一门外连游廊,都是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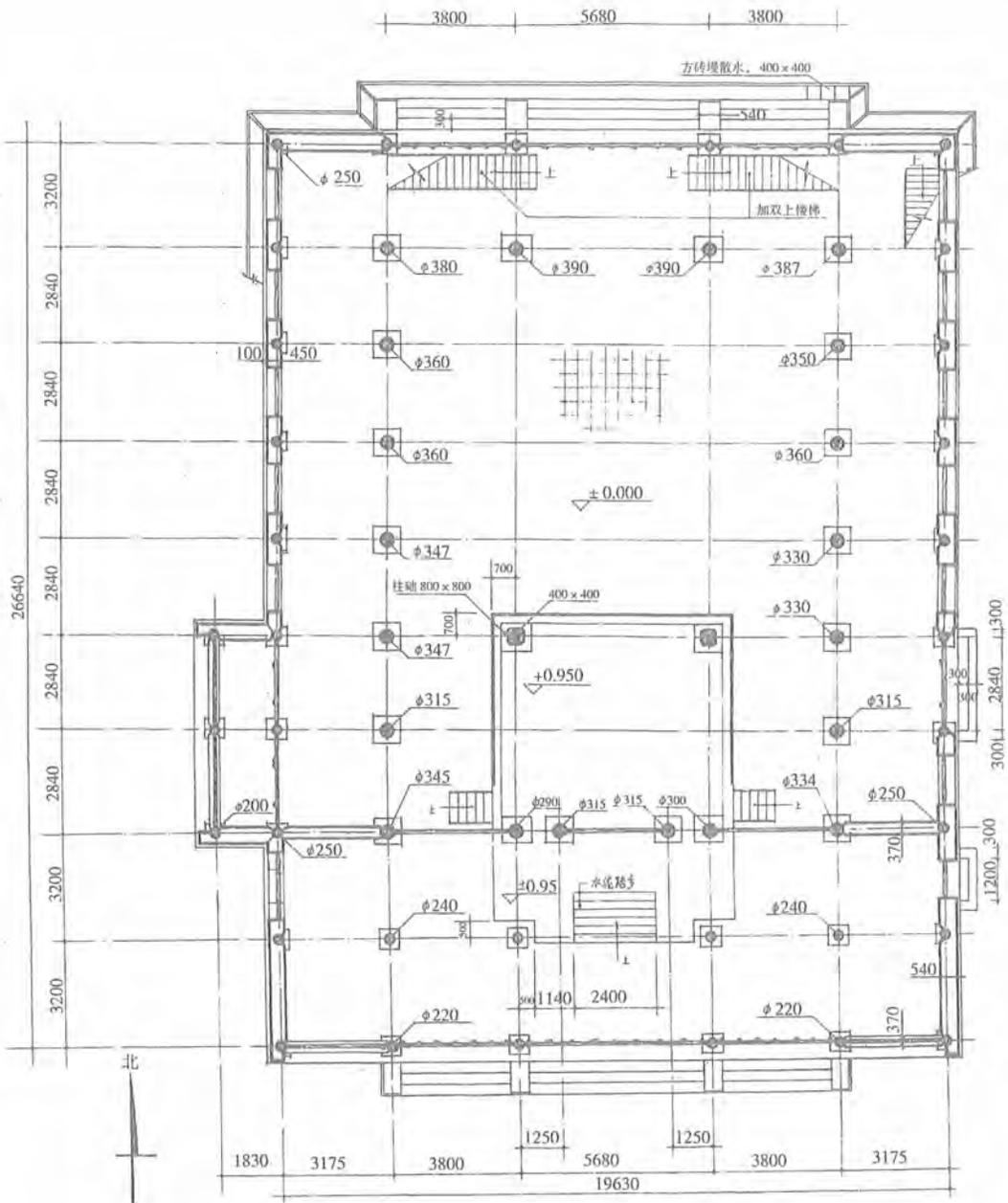


图3 湖广会馆戏楼一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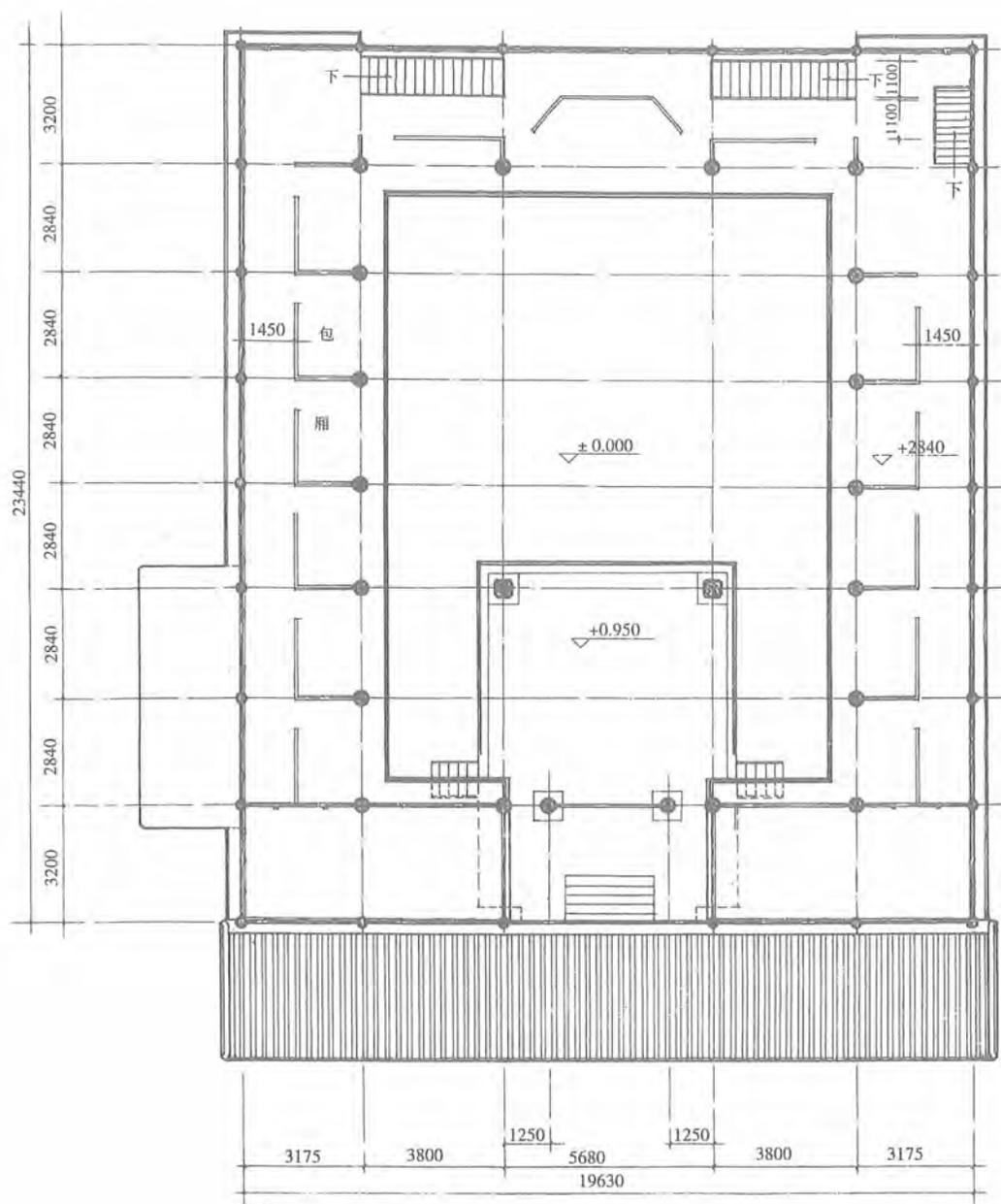


图4 湖广会馆戏楼二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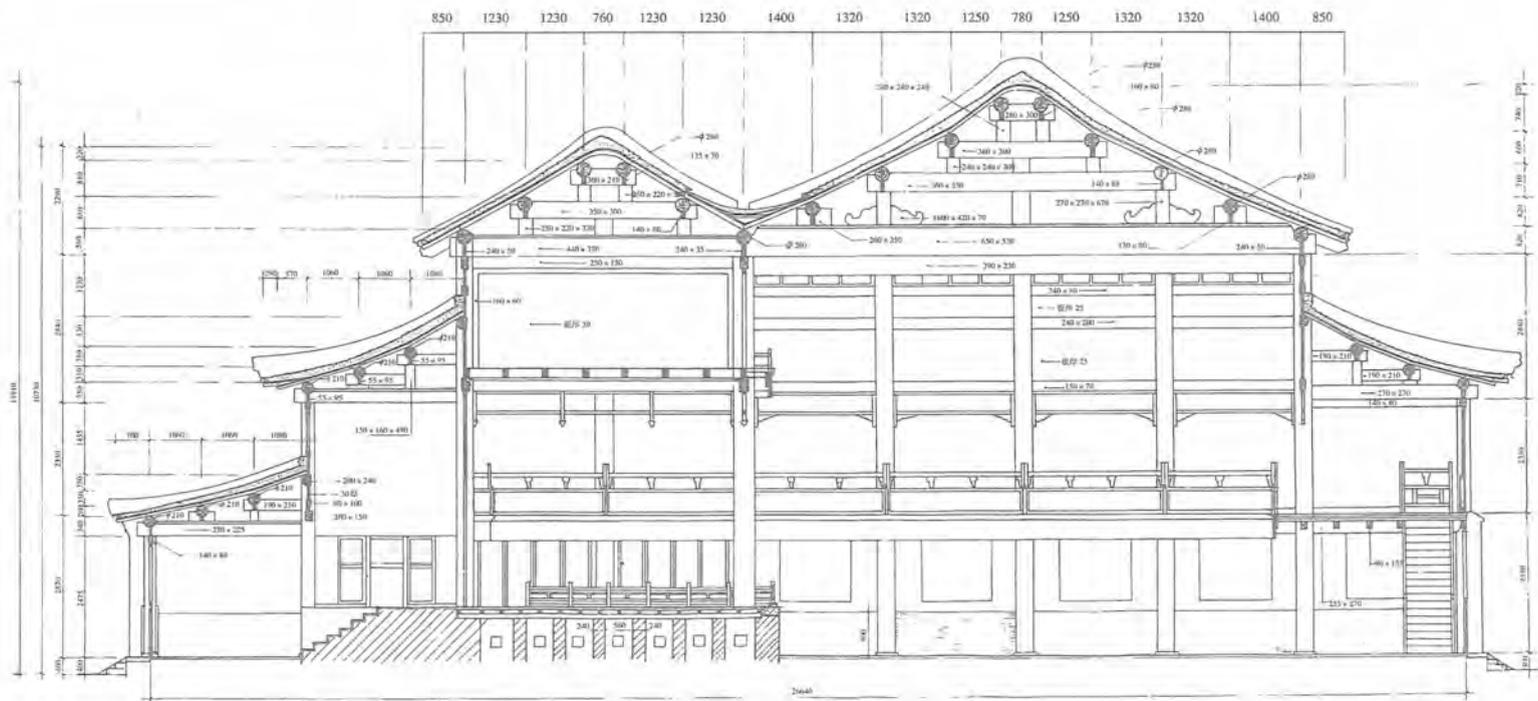


图5 湖广会馆戏楼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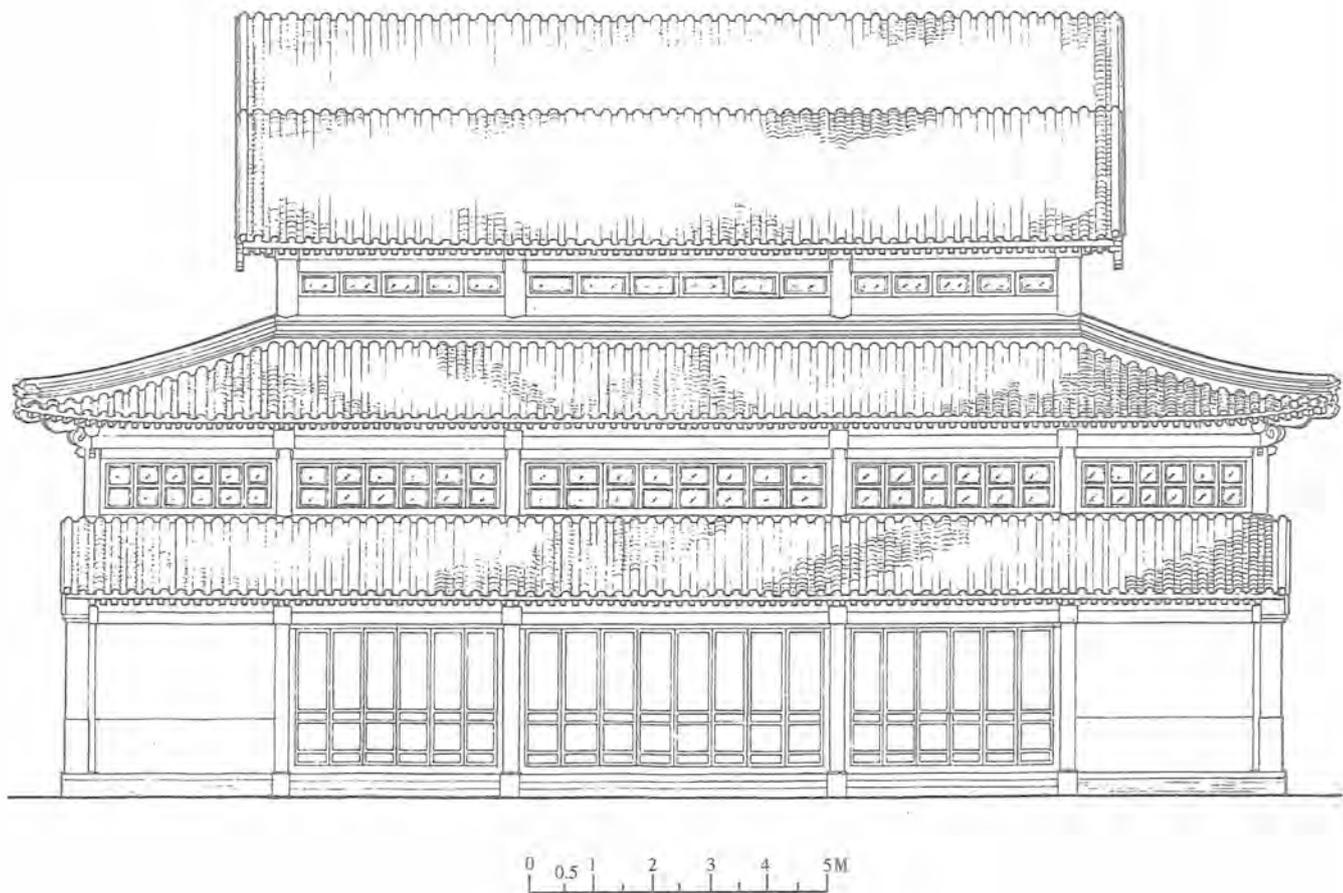


图6 湖广会馆戏楼南立面图



图7 湖广会馆戏楼东立面图

改造,但改造的年代不明。舞台(戏楼)上部包封的形式,舞台上部的结构都因原状已毁,无法考证,只能参考其它类似的舞台(如正乙祠)加以修复。

戏楼内部无天花板,大柁、随梁枋、脊檩有彩画,题材为水波流云,走马板绘博古,挂檐绘花卉卷草。外观无彩画,绿柱红枋。下层砖墙丝缝做法。(图3、4、5、6、7)

文昌阁(先贤祠):面阔三间,进深五檩加前廊一步共六檩,通进深7.12米,硬山顶。开间宏大,通面阔14.28米,当心间达5.7米,在民间建筑中极为罕见,有可能是在原来五间的基础上改为三间。此楼结构坚实,木地板上铺方砖。山墙用丝缝做法,二层设圆光窗,工艺水平很高。

风雨怀人馆:紧贴文昌阁后。通面阔6.95米,隔为三间。进深四檩卷棚前加一步为五檩,计3.32米。悬山顶,下为砖台,高2.52米,东西连以斜廊,与戏楼、文昌阁间游廊相接。文昌阁内无楼梯,登楼须经过此馆内部台阶,但台阶尺度陡促,馆、阁结构毫无关系,明显是两个时期的建筑。

楚皖堂:在西偏院,面阔三间,进深三卷勾连搭。前跨为四檩卷棚宽廊,中后二跨均为五檩卷棚式,但中跨大于后跨。此堂当初装修雅洁,四壁镶嵌名人手迹石刻,堂前竹木荫浓,为两湖在京名流宴会酬唱场所。

东偏院建筑:现状北房原为东院南房,三间五檩后出廊,是倒座厅的形式。东厢房两座共六间。又南面小三间倒座房,向东垂花门一座,以游廊相连。垂花门为一殿一卷式,结构严谨,挂落、华板雕刻精美,仍是乾隆时期的遗物。

游廊:戏楼后部游廊为平台式。风雨怀人馆与文昌阁间,以及东偏院游廊为四檩卷棚式。东院游廊仍是乾隆时遗物,平台游廊可能晚至光绪时期。

四、1993—1996年修复工程要点

1993年初,湖广会馆开始全面修复,

1996年竣工。

保护、修缮文物建筑,首先,要正确评估其文物价值,分清主次,比较利弊,从而决定保护的方式和修缮的程度。其次,要明确未来的使用功能,力争保护的力度与功能的完善得到统一。第三,要充分考虑使用中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力争保护投入与功能产出平衡。湖广会馆的修复工程就是在以上方针的指导下进行规划的。

湖广会馆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主要价值之一就是有一座一百六十多年的戏楼。戏楼是会馆中文物价值最高的部分,对它的修复必须严格遵守文物法规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这里所谓的原状,主要是指戏楼原有的功能布局、结构体系和外观式样。其次是文昌阁和风雨怀人馆,再其次是东院入口部分和西院楚皖堂,其它建筑的文物价值相对较低。西院南部三座平房几经翻建,已没有什么价值。

会馆的功能定位为戏曲博物馆,对外演出,开放展陈。依据上述方针和文物价值,确定保护规划的原则是:保护中路,完善东路,开发西路,敞开北面。在开发利用的力度上,中路严格控制,东路服从功能,西路适度开发,北部全面更新。具体布局为,中路的戏楼仍为剧场,文昌阁和风雨怀人馆为博物馆主要展室,按原状修复原有建筑,只在扮戏房后(南)利用原有空地接建一排平房,以扩大化装间。东路为剧场入口和管理服务部分,不改变建筑外形,但改变使用功能,室内全部改造;增加配电室和消防水池。西路的功能为饭庄,只保留修复楚皖堂,改为餐厅,其南部平房拆除,改建为厨房和二层雅座餐厅。北面中路临街,正对风雨怀人馆建五间大门,是戏曲博物馆主要入口,对内悬匾名为“宝善堂”,保留了会馆的历史信息。西路饭庄临街建二层快餐厅,尺度不大,既是饭庄的入口,也保留一点当年会馆临街建有二层铺房的信息。饭庄既是戏曲博物馆经济效益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戏楼功能的延伸,还留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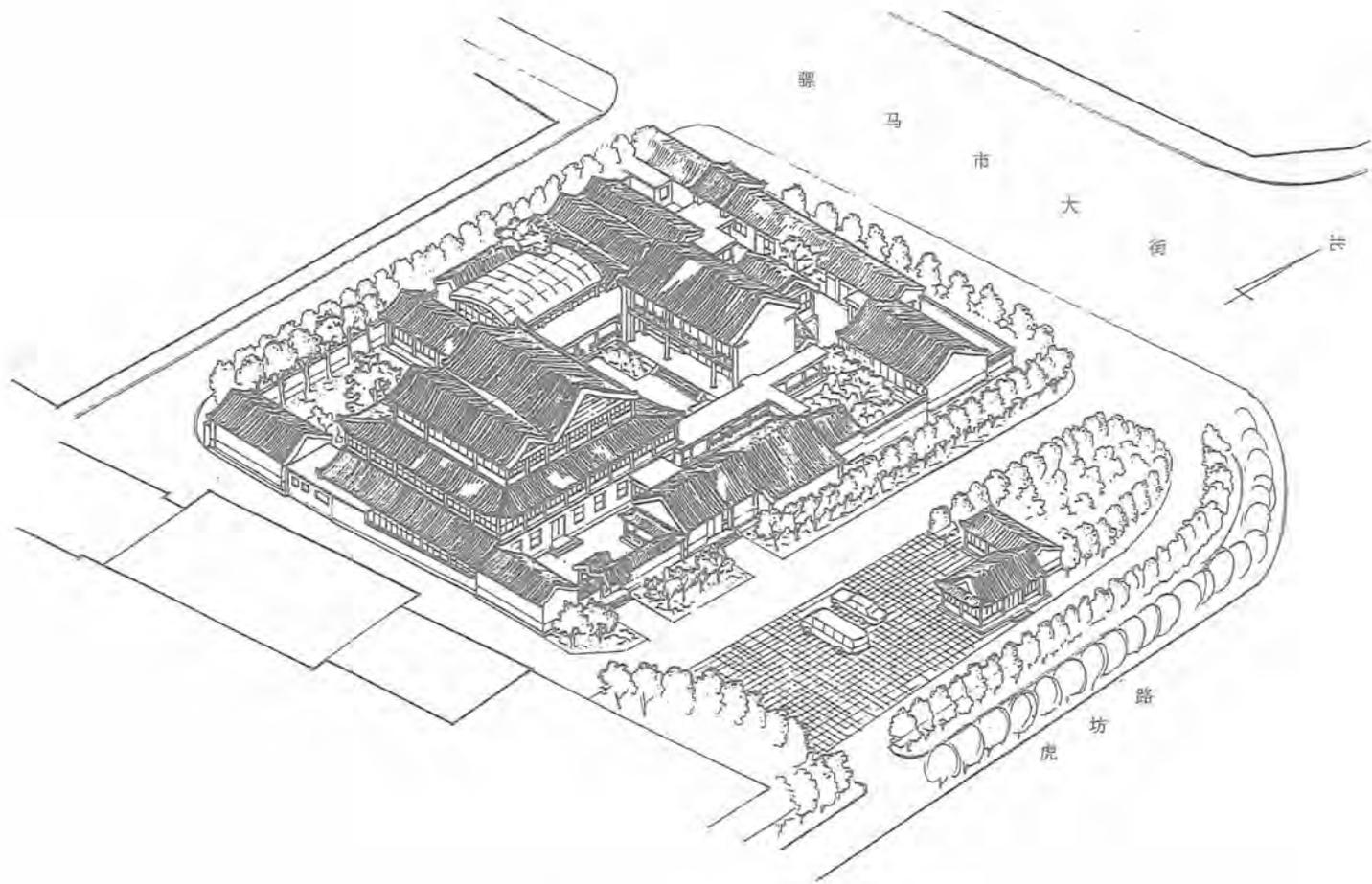


图 8 1998 年修复方案图 (1996 年略改变)

当年两湖名士在楚畹堂酬唱宴饮的信息。(图8)

修缮工程的重点也是戏楼。工程分为两部分,一是对戏楼本身的加固、维修和局部复原;二是按现代演出要求,完善剧场功能。加固维修方面,戏楼建于清代后期,造价较低,结构质量比较差,主要构件用料偏小,力学参数不足,再加上160多年间只有人为损伤,从未大修加固,到70年代时已是险情四伏,相当危险。主要问题是许多柱子根部糟朽;两条跨长11.36米大梁弯垂,随梁枋劈裂,下用木柱临时支顶;楼梁、屋檩断面过小,普遍弯垂,有些已出现劈裂;油饰大部脱落,站板开裂。本次修缮的重点是更换劈裂的随梁枋,从根本上解决大柁弯垂的问题。设计认为,如按原状更换随梁枋,断面仍然不足,而且没有落架场地,施工难度大。因此决定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构件,即用千斤顶顶起大柁,在柱头楔入钢板兜绊,从侧面推入空腹钢梁以取代木随梁枋,钢梁与弯垂大柁之空隙用木楔从侧面楔紧,钢梁外包木板,画彩画呈木随梁形状,结果相当满意。糟朽的木柱,采用剔补、墩接与不饱和树脂灌注结合,加固效果很好。楼梁和檩子,使用型钢帮固,螺栓串拉等方法以加强整体承载能力,同时卸去楼层方砖地面,只存木地板,以减轻荷载。油饰彩画按原状重做,只保留一块原有走马板的壁画,以显示其原状。

在完善剧场功能方面,主要是安装烟雾报警、喷淋灭火系统。引入暖气,增加集中空调。舞台音响灯光按现代剧场配置。扩大后台,增加化妆、休息、盥洗房间。为配合剧场设备,在剧场内增加了天花板。为便利上楼,新增加了宽缓的楼梯(原窄陡楼梯仍保留)。上述这些改造,只是完善了使用功能,没有损害文物的主要价值,仍然符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其它文物建筑,都是使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其中文昌阁和风雨怀人馆,由于六、七十年代挖掘地下防空道,基础受到损伤,墙、柱出现歪闪,不得不落

架重修。另外,经过一百多年的侵蚀,大部分砖墙出现酥碱,需要更换,但现在手工青砖的质量、价格和按传统做法砍磨的耗损及工期,都不允许再使用传统材料和做法,故改用水泥砂浆砌机砖,外贴仿古面砖,外观效果与磨砖做法一致。这是此次修缮中在行政干预下最不得已的改动。

经过此次修缮,湖广会馆——北京戏曲博物馆总共保护、修复了原有古建筑1658平方米,新添建筑947平方米,共计2650平方米,基本上满足了演出、展览、管理、服务等功能。(图9、10、11、12、13)

附:会馆与戏场杂考

一、会馆

会馆是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民间建筑,“会馆”这一名称也始见于明代文献。《帝京景物略》卷四〈稽山会馆唐大士像〉谓:“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又《万历野获篇·畿辅·会馆》谓:“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今人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引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资料,当时北京有33所明代会馆,最早的是永乐时的江西南昌会馆。再据清光绪时《京师坊巷志稿》卷二载,内城朝阳门内北小街旧有云南会馆,东安门外小甜水井有镇海、慈溪会馆。清初北京内城全为八旗军民所住,有清一代无会馆,这三处会馆应是明代所建,至清迁废。但北京城内民间建筑几度翻建,尤其是康熙18年(1679年)大地震后,绝大多数质量不高的民间建筑都经过重建,所谓明代会馆,多指明代始创,至多说明是明代旧址,而不可能是明代原物。

关于会馆名称的由来,有两个说法尚须商榷。其一,程树德在1943年印的《闾中会馆志·序》中谓:“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是指会馆之“会”为举人每三年在京师贡院会试之“会”。其二,瞿兑之在1945年印的《湖广会馆志·后记》中谓:“京师之有会馆,昉于汉郡邸”,是指民



图9 会馆东面

间的会馆来源于汉代官办的馆舍郡邸。第一说是基于北京的会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地方会馆，而地方会馆中的绝大多数是供来京试子居住这一基本事实。但是，会馆最早还是来源于商业，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北京以外各地的会馆，几乎全是外省商人的聚会场所。古时民间组织有邑、社、会、行、团等名称，唐宋以后，社、会通用。这类组织有经济型、政治型、文化型、军事型、宗教型、民俗型等等，唯独没有教育型，而且影响最大，最有实力的是工商会社，“会”也包涵了工商荟萃之义。三国左

思《蜀都赋》谓：“市廛广会，万商之渊”；《魏都赋》谓：“济有无之常偏，距日中而毕会”；唐王勃《九成宫颂序》谓：“名都广会，闾阎摩室”。元曲中称殷富大户为“会首”。可见会馆之“会”乃是民间组织会社之“会”。第二说是将后代民间的“馆”与古代官方之“馆”并为一义。汉代的郡（或国）邸，是地方政府设在京师的联络接待机构。周秦时称“馆”，如《周礼》诸《官》中，怀方氏、环人、委人、遗人、野庐氏都有管理官方馆的职能。春秋战国时管理馆的官员名馆人。古时民间客居之所只能称逆旅、客舍，绝不能



图10 · 会馆东小院

称邸、馆。这种官办的馆，历代相传，到元代以后，在京师的通称为会同馆。明代北京会同馆有南北二馆，南馆在御河桥西，有房 387 间；北馆在王府井，有房 376 间（据《日下旧闻考》卷六十三〈官署〉），规模远远超过民间会馆。清代会同馆沿用明代南馆，又分置若干官房，规模不等。不过明清二代会同馆都是接待外邦使者，外省官员至京大多住在本省的会馆中。

北宋汴梁、南宋临安、金中都、元大都等都是中古时期很繁华的都城，工商娱乐行业齐全，酒楼、瓦子（市场）、戏场、店铺、旅舍、塌房（货栈）俱全，会、社林立，但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老人繁盛录》及金元戏曲的记述来看，各类市井形态描绘得很仔细，唯独不见有会馆记载，可见前引会馆始于明代之说是可信的。

北京的明清会馆习惯上分为地方的和行业的两大类，但在建筑形制上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祠庙型，即以祀神为主，其中有些是行业会馆，如精忠庙是梨园行，哪叱庙是缘行，正乙祠是钱业；也有的是地方会馆，如谢（枋得）公祠为江右会馆，二忠祠为吉安会馆，畿辅先哲祠为直隶会馆，越中先贤祠为浙江会馆等。这类会馆的主体必有一座体量较大，规格较高的殿堂，殿内供奉本行主神或本乡先贤，又兼议事场所。



图 11 风雨怀人馆



图 12 文昌阁

（图 9-12 为何力摄影）

东西厢房为办事用房。倒座常为过厅,如节日酬神演戏,则在院中搭台,倒座房成为扮戏房。

第二类是礼仪型,其功能是以议事、拜祭乡贤为主,兼供本乡高官名人居住。这类会馆基本是省级,多数是本省作了大官的人捐出的大宅,沿用北京大宅三轴并列的格局。所谓三轴,既中部的堂廊轴,原是大宅的礼仪厅堂部分,改为会馆后即成为拜祭乡贤、官绅议事之处。其次是与其并列的宅院轴,原为官员内眷的住宅,一般是两三进规整的四合院,改为会馆后可成为有身份人员较长期的住所。第三轴是又一并列的斋馆轴,原为主人退居休息,接待私友的书房斋馆,布局灵活,房屋精巧,兼有园林,改为会馆后专供客居京师的高官居住,或本乡官绅诗酒宴集的场所。这三部分以外,原有的厨、库、厩、役等附属用房用地,改为会馆后仍保留服务的功能,或翻建成居住房舍。总之这类大型会馆一般不接待没有身份地位的府县举子居住。

第三类是居住型,也就是一个或几个四合院,都是府县级会馆或省级的别馆,专供同乡试子或低级官员临时居住。有的较大,也设有供奉乡贤议事的厅堂和斋馆别院,如广东南海、香山、顺德,江西南昌,山西平(遥)介(休)会馆等,但大多是比较简单的平房,并没有特殊的规制。唯有标志性的建筑是会馆大门,都是广亮式或金柱式大门,还可以置于院子中轴线上,门上悬一个会馆名称的大木匾。但格于体制,尽管内部庭院重重,大门尺度可以很大,但只能是一间。

二、戏楼与戏场

会馆中最有特色的建筑是戏楼与戏场。据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湖广会馆碑记》载:“正建戏楼盖棚,为公宴所”,可知舞台名戏楼,观众厅名盖棚,其功能是公宴,即一边吃喝一边看戏。

中国的旧式室内剧场,俗称戏园,是由“茶园”演变而来,有些剧场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沿用茶园的名称,如北京珠市口大

街的文明茶园即是一例。这种旧式戏园,也由戏楼和盖棚两部分组成,市井中的剧场和会馆中的戏楼孰先孰后,至今尚难有确切结论,但剧场的建筑形制与戏曲演出的形式有关则是肯定的。

中国的戏曲表演,起源于战国秦汉的歌舞、百戏、俳優。演出的形式,据有关文献和四川汉像砖(石)所示,小型演出是在室内地面,观众不多,坐在旁边。(图14)较大型的演出的是在庭院中间,观众则坐在四周室内。如四川郫县出土石棺的“宴饮乐舞”石刻,描绘的是在一所大宅院或大驿馆内的庭院中进行表演的场面。(图15)文字描述如三国时王粲《七释》赋:“七盘(一种杂技式舞蹈)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南北朝鲍照《数名》诗:“七盘起长轴,庭下列歌钟”。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的长秋寺、禅虚寺前广场有吞刀、吐火、角觥、掷戟等演出,四周“观者如堵”,“帝亦观戏在楼”,但这时演出尚未见有舞台、戏楼的记载。

唐代开始有了比较丰富的并有一定戏剧因素的表演,既有成套的歌舞,还有一定剧情的戏弄。当时有三种演出场所:第一种是露天的“场”,有“歌场”、“变场”、“道场”等名目,其中歌场是临时聚合的歌舞场地,变场、道场与佛道寺观关系密切,是用说唱形式宣传宗教的场地。这种“场”都没有什么建筑设施,和后世“撂地摊”相似。

第二种是由这种“场”发展出的相对固定的场所,即有了建筑设施的露天和半露天戏场。其中也演唱宗教经义,但更多是表演歌舞戏曲。戏场多设在人流集中的寺庙附近,钱易《南部新书·戊》谓:“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保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人道,尽在咸宜。”戏场中最重要的建筑是戏台。唐时称“乐棚”,既名为棚,当属比较简陋的或是临时搭建的舞台。“乐棚”之名一直沿用至宋,《东京梦华录》尚有记载。当庙会戏场演出频繁,场地固定后,自然就建造出永久性舞台,一般是下



图 14 四川东汉画像石中之室内演出场面



图 15 四川郫县石棺“宴饮乐舞”图

为砖台,上有木结构屋顶。现知最早的形象是山西等地金代砖墓中的舞台雕刻,实物则有山西一些元代戏台,明清祠庙中舞台建筑更多,式样也更为丰富。乐棚(戏台)前的广场唐代名“看场”,没有坐位,观众随意立观。唐天宝间常非月有《谈容娘》诗描述当时看戏的场面,“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即很形象。戏场中也常有官宦贵族及其眷属光临,自然不能与常人混站在一起,因此专门搭建一些临时的席位供他们看戏,称为“看棚”,也称“场屋”,高架者称为“看楼”、“棚阁”、“缙楼”、“幔阁”。《唐会要》卷二十三〈散乐〉载:“(隋炀帝)每岁正月于(东都)建国门内廊八里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观,昏以继晓,十五日而罢。”这种形式的戏场,其形象可参看明清时北京的广和查楼。据乾隆时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九〈外城一〉载:“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年)毁于火,今重建,书广和查楼。”又据清嘉庆七年(1802年)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绘之《唐土名胜图绘》卷之四〈外城·查楼〉所绘,戏场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砖台重檐歇山式舞台,后接平顶扮戏房,露天戏场内站立观众,周边有一些酒肆茶馆,入口处有一木牌坊。(图16)可知从唐至清,戏场形式变化不大。原来简易的乐棚变为永久性的舞台(戏楼),看棚也逐渐演变成永久或半永久性的看楼、棚阁,讲究的挂些帐幔,便是缙楼、幔阁。除此之外,贵族富豪又往往自建舞台戏楼。《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卷上记唐睿宗在藩时,于安国寺内建“舞榭”,名为“红楼”,宪宗时特许广宣上人住安国寺红楼院,说明这里是一所格局完整,带有戏楼(舞榭)的庭院建筑群,大约和清代北京宫殿中的漱芳斋相似。

第三种是府邸衙署中的“设厅”。隋唐时期官衙府邸常有“宴设”活动,宴即酒席,设即歌舞伴优演出。前述唐睿宗在藩时建的红楼院即是宴设的场所。至中唐,衙署中出现了专门举行宴设的厅堂,如穆宗长庆元年,沈亚之守华州,鉴于公堂与设厅共

用一座大堂很不方便,又不合礼仪,于是新建设厅一所,有《华州新葺设厅记》以志其事。设厅沿用至宋,现存宋平江府图碑中,平江军府衙正厅为五开间带挟屋大厅,题名为“设厅”,厅前院内有亭四座,当是乐队演奏的乐亭。设厅中有的建戏台,称为舞台、舞阁;有的没有舞台,或仅有矮台,称为舞筵、锦筵。(图17、18)

唐代的戏场和设厅,有舞台,有看楼,已具备了向大跨度带楼座有顶盖剧场发展的条件,但至宋代,市井中似还没有大型室内剧场。宋代的戏场称“勾栏”,又名“构栏”、“构肆”。宋《营造法式》中有“钩阑”,即栏干,“勾栏”、“构栏”皆为同义;“肆”的本义是房屋围合的交易市场,构栏是周边用栏干围合,构肆则是用房屋围合,从字义上分析,就是四面有房屋围成的戏场。《东京梦华录》载汴梁东南角街巷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象棚可容数千人。戏场取名某某棚,可见仍是沿用唐代乐棚、看棚形式,但一所戏场可容数千人,不可能是室内戏场,再从“夜叉”、“象”为戏场乐棚之名推测,应是表演怪异马戏一类露天的或临时搭设的帐篷式戏场。当时的观众坐席有“神楼”、“腰棚”等名称,大约神楼位在戏台对面,是祭祀节日供奉神祇的楼座,平日也可以坐人看戏;腰棚位在两侧腰部,设有楼座包厢,四周围合,中间还是空场,供一般人簇立看戏。既然四边都有了楼房,只要天井(戏场)尺度合适,建筑结构允许,上面增加一个罩棚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只是元明均无实物遗存,也无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知道有明确记载,并对照实物可以确定的是重建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北京正乙祠,也是浙江钱业会馆。这是一座尺度较小的戏场,正面有戏楼,其余三面为二层厢座,因为尺度不大,所以整个戏场包括楼只用一个大悬山屋顶覆盖,乾隆以后的戏场,尺度增大,屋顶都改为双卷勾连搭。要言之,中国的戏场发展到清代,一直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戏楼和周围房屋围合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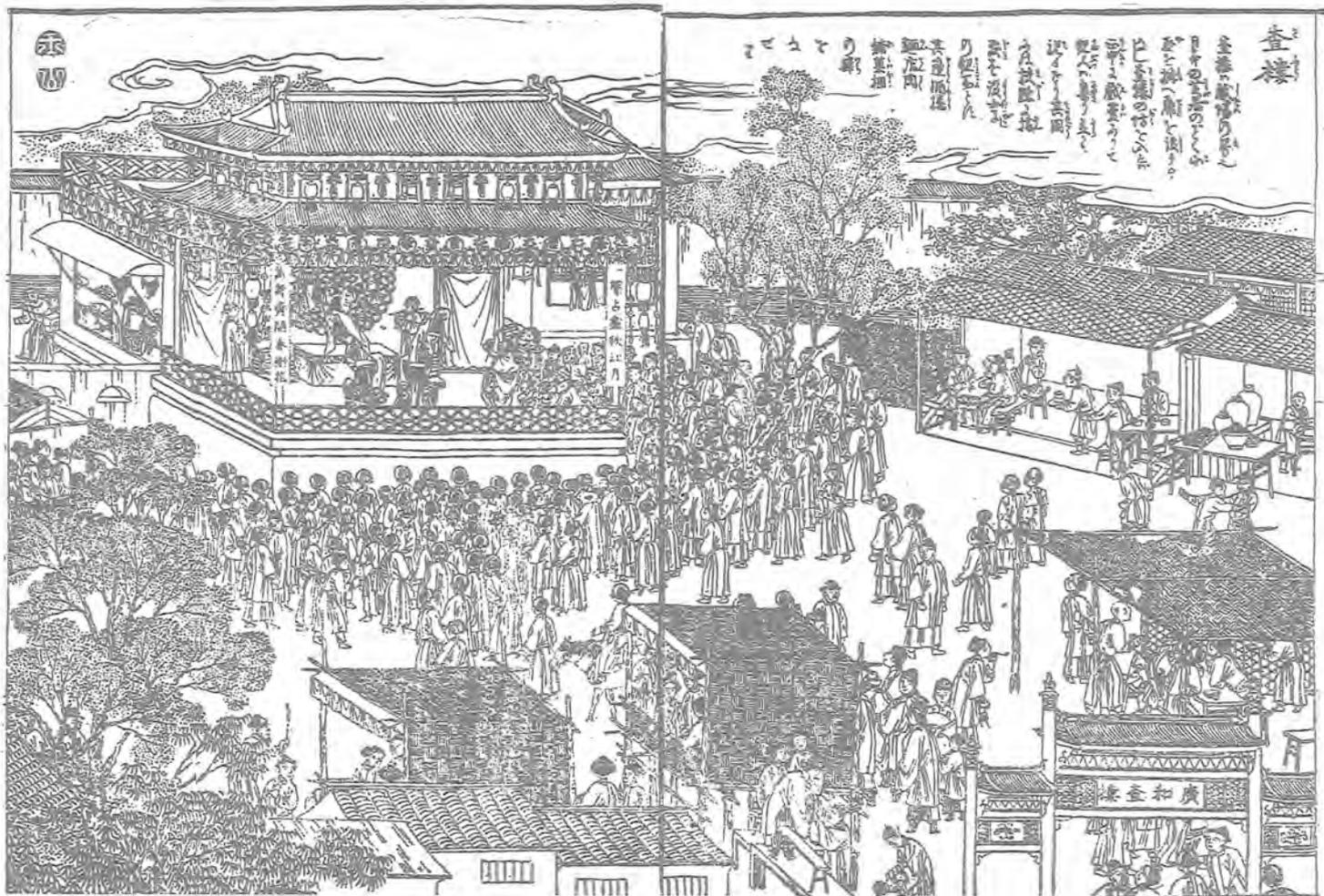


图16 清代北京广和查楼戏场（《唐土名胜图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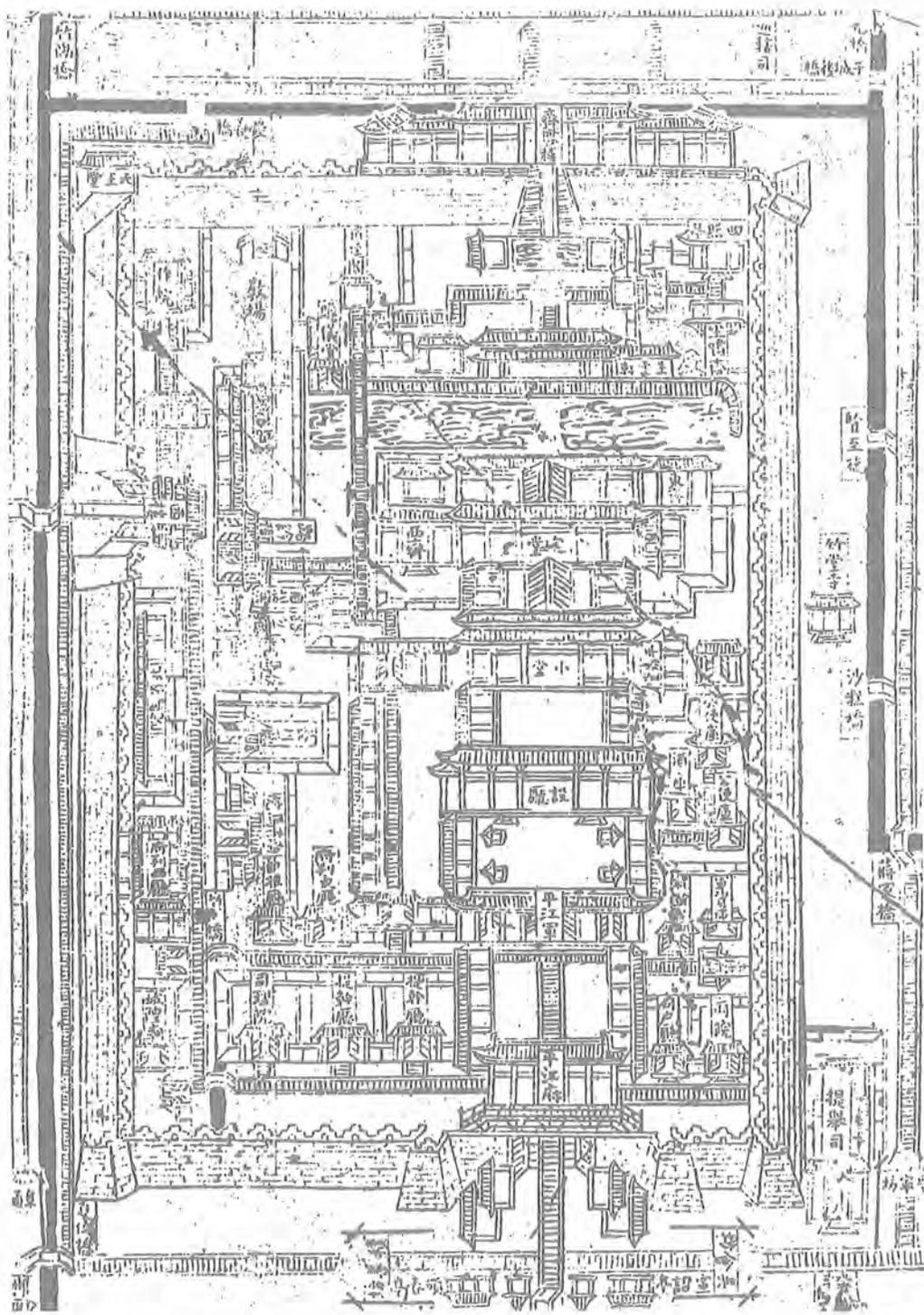


图 17 宋平江府图碑中“子城”(中部为“设厅”、乐亭)



图 18 清末河南某官员行馆室内戏台(《点石斋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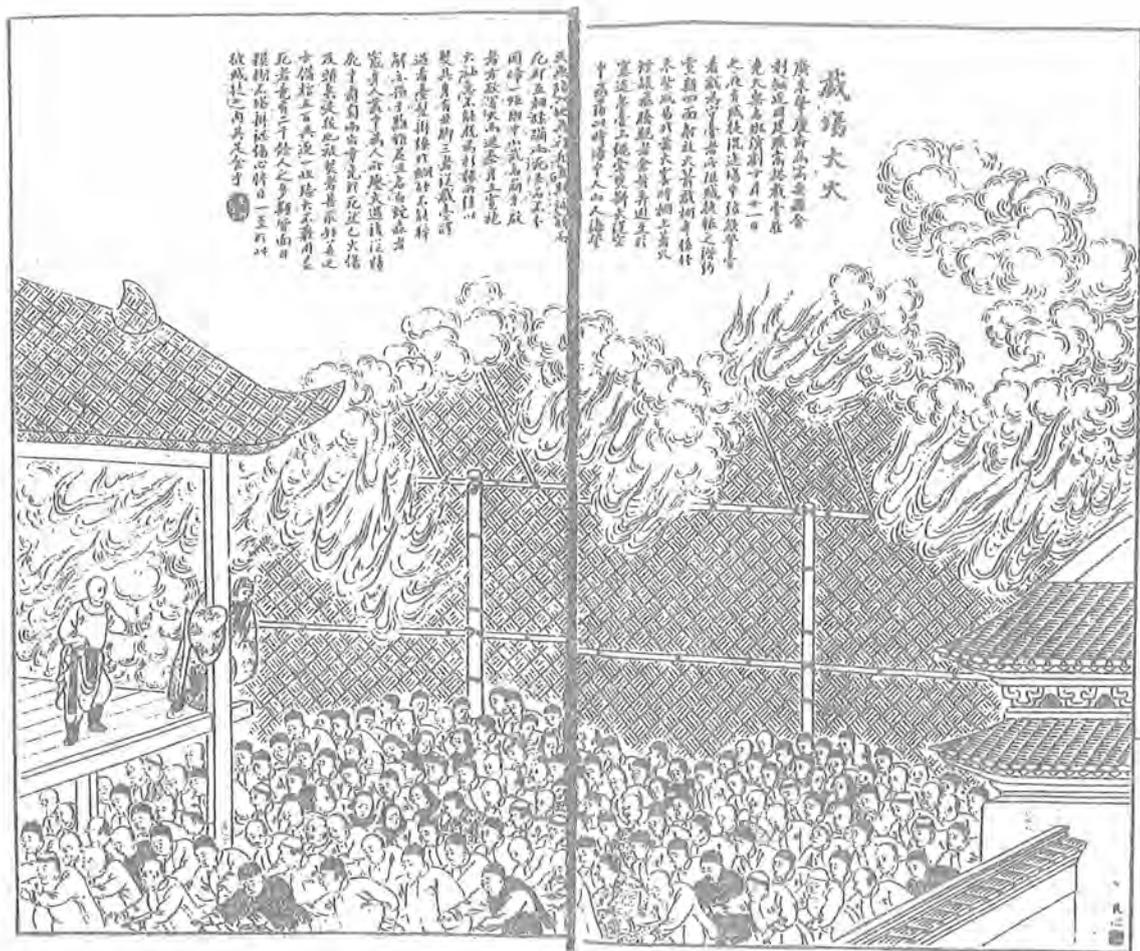


图 19 清末广东高要县金利墟农村戏场(《点石斋画报》)



图 20 清末宁波财神庙内戏场(《点石斋画报》)



图 21 清末上海品玉樓書場(《点石齋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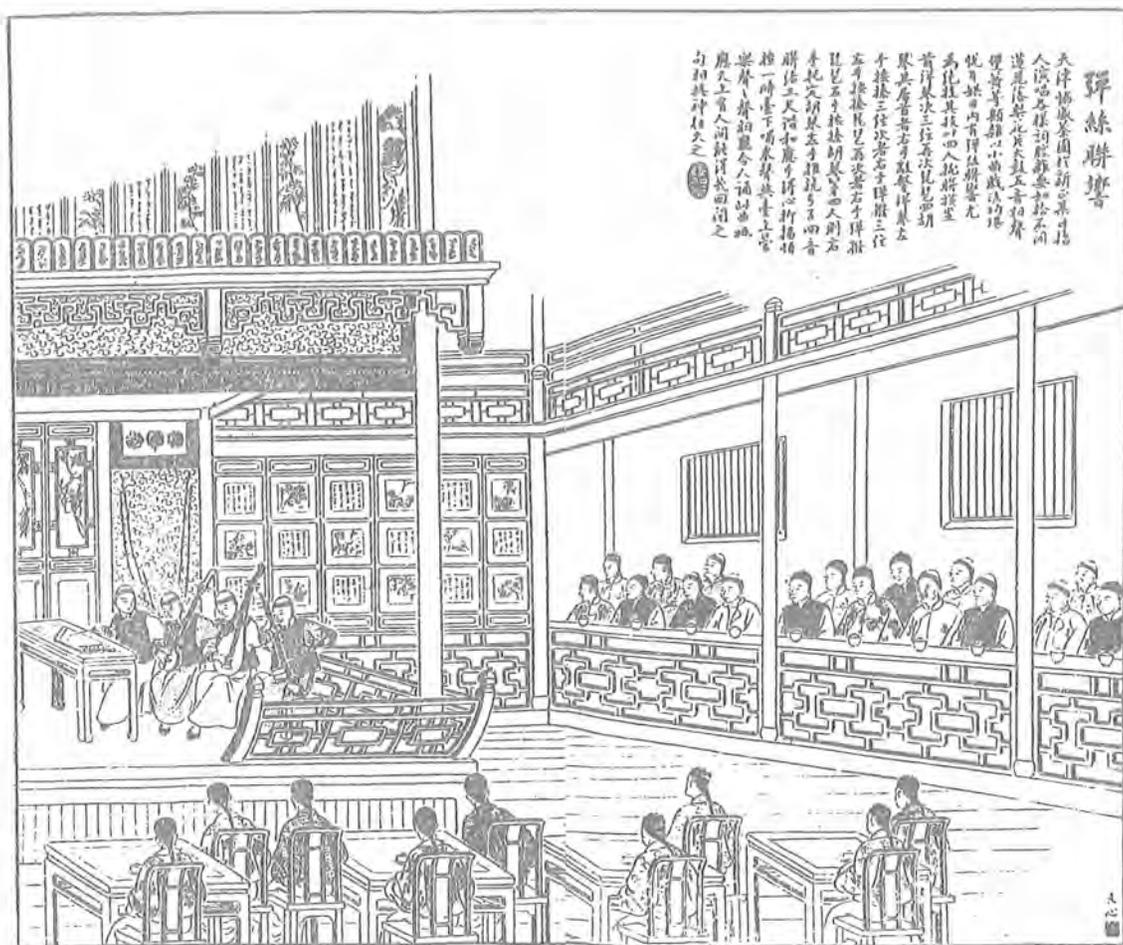


图 22 清末天津协盛茶园(《点石斋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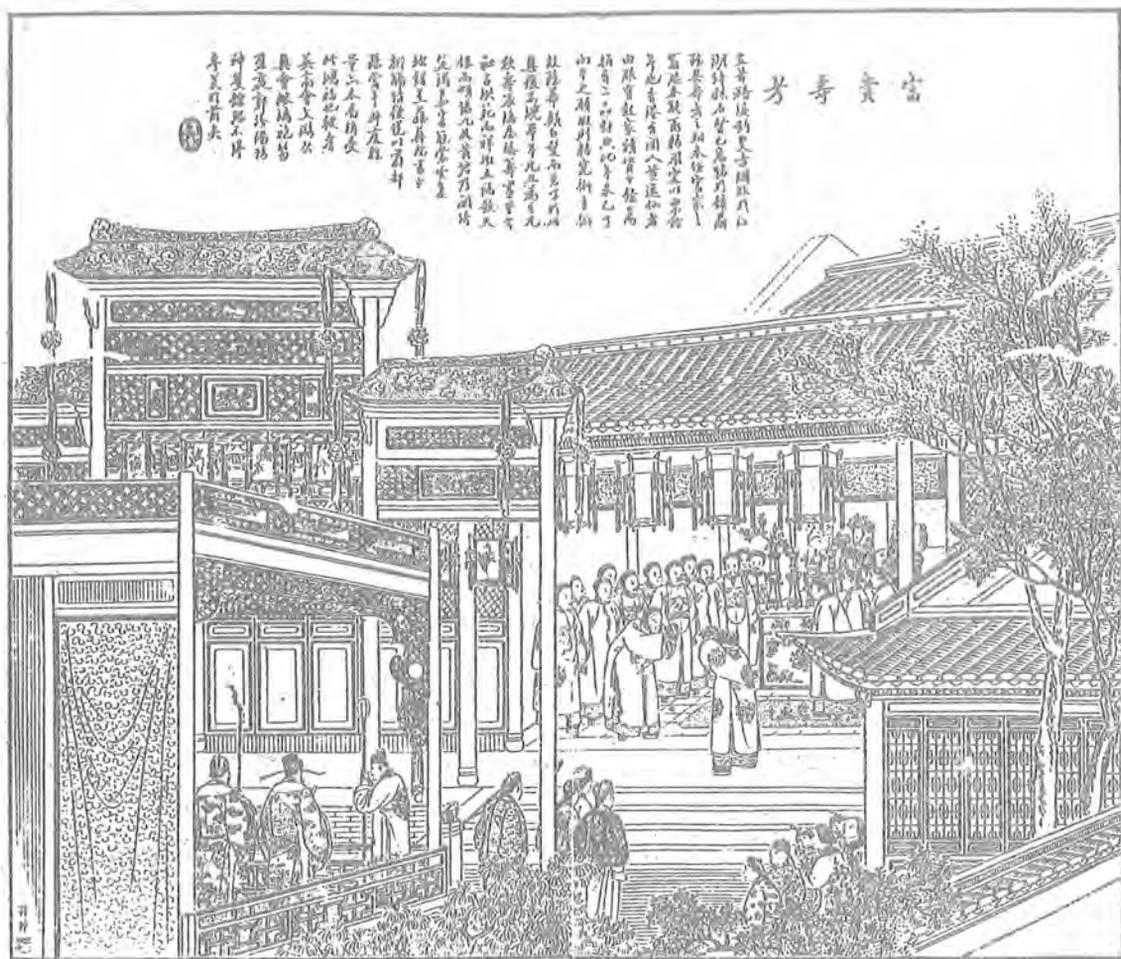


图 23 清末香港富商宅院戏台(《点石斋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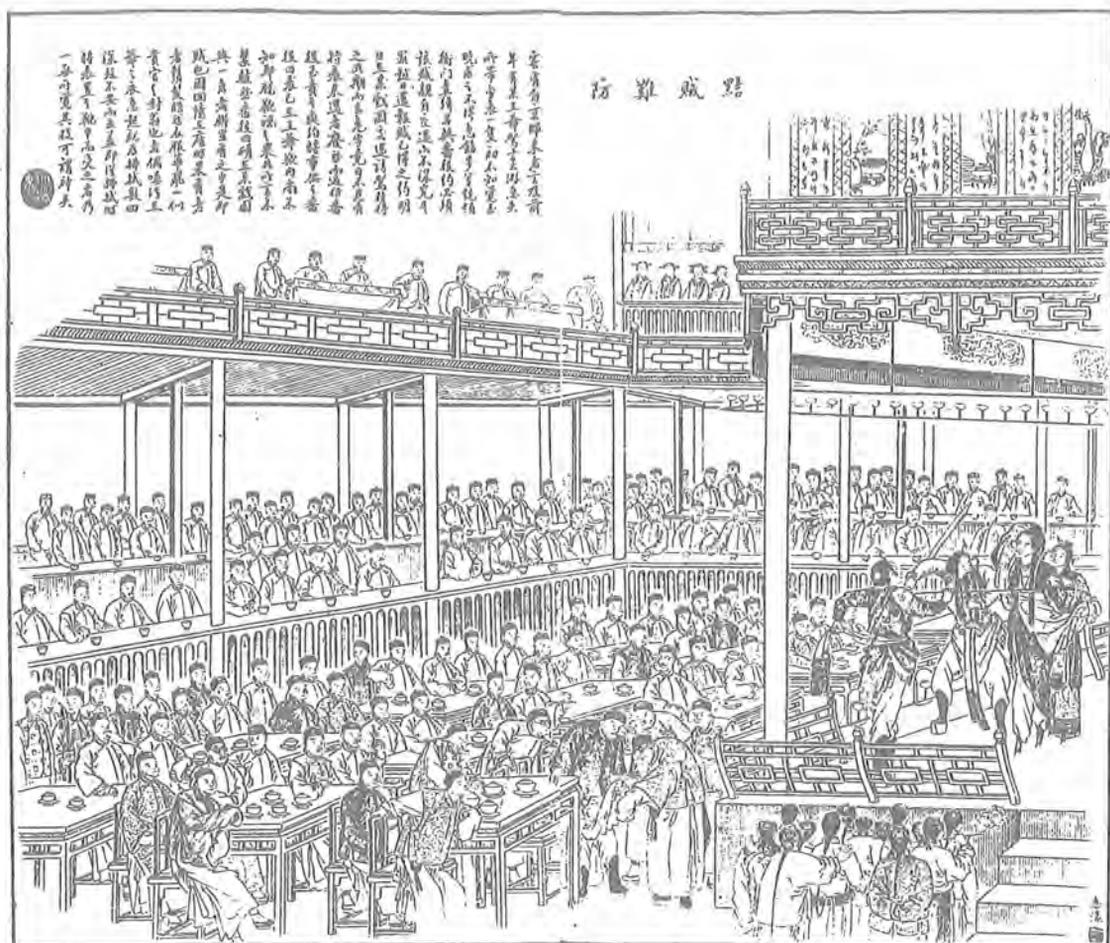


图 24 清末上海某戏园(《点石斋画报》)

最尊至皇家戏场,如故宫畅音阁、颐和园德和园;下至市井茶园,如广和查楼;中间至富户、会馆、祠堂,都有实物遗存。第二种是室内戏场。其中有些是王府(如恭王府)、豪宅(如那桐宅)中改造四合院,在天井上加罩棚的小型戏场,其特点是不设楼座;还有一些是大饭庄的大餐厅中加建戏台的饭庄戏场,有的四周有楼,有的没有。除此以外大量的都是由戏楼和三面二层

包厢围合的戏场,有的设在会馆中,如北京现存的安徽、湖广、钱业、平阳四座会馆戏楼;也有的是公开演出的戏园、茶园,旧北京、旧上海和其它商业发达的省城,都有这类戏园,但保存至今的已为数不多了。(图 19、20、21、22、23、24)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级注册建筑师)

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续)

张先得

外城(重城)

北京外城是与内城南面相接的重城,明代北京南郊已四方辐凑、人口渐繁,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大举犯塞,入犯京师,原计划在内城四周五里建外郭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开工,但兴工不久因人力、物力匮乏,改将外城转抱内城东南、西南二角,仅包南郊居民、商业稠密地区,于当年十月竣工,外城南垣辟三门,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垣开广渠门,西垣开广宁门,北垣东肩开东便门,北垣西肩开西便门,外城四隅设角箭楼,内外城衔接处建碉楼,外垣内侧共筑双向马道10对,单向马道6条,水窦三处,均为三孔券洞式。外城城垣内为夯土芯,外包砖石,砖有大小两种,小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多用于城垣内侧。其它明砖多为嘉靖、万历时砖,长48厘米、宽24厘米、厚13厘米,清代城砖多为乾隆、嘉庆时砖,长48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外侧砌砖厚1米,内侧砌砖厚70厘米,城墙基均垫条石,城墙顶部海墁一层大城砖。外城周长近27里,其南城垣稍内凹,东城垣稍外凸,西垣略直,形似内城之帽(俗称“帽子城”)。外城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七门之瓮城(未建箭楼),外城建成后,北京城垣平面已定型呈“凸”字形,外城七门之箭楼当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之后所建,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之《乾隆京城全图》外城只标有瓮城无箭楼。

外城南垣长7854.20米,城垣外侧高6.18米,内侧高5.62米,基厚11.80米,顶

宽9.90米,外侧雉堞高1.72米,内侧女墙高1米,南垣辟三门,中“永定门”,东“左安门”,西“右安门”,南垣内侧筑登城马道3对,外侧筑墩台30座,水窦1。

外城东垣长2800米,外侧高7.15米,内侧高5.8米,基厚13.3米,顶宽10.40米,雉堞、女墙同南垣,东垣辟“广渠门”,东垣内侧筑登城马道1对,外侧筑墩台14座。

外城西垣长2750米,规制与东垣略同,外侧高7.68米,内侧高6.4米,基厚7.8米,顶宽4.48米,西垣设“广宁门”(广安门),城垣内侧筑马道1对,外侧筑墩台13座。

外城北垣东侧长510米,外侧高7.15米,内侧高5.8米,基厚13.3米,顶宽10.40米,辟“东便门”,内侧筑登城马道1条,外侧筑墩台3座,水窦2,西端与内城东南角衔接处,建碉楼1,与内外城垣相通,为内、外城垣之防御及交通。

外城北垣西侧长495米,外侧墙高7.15米,内侧高6米,基厚15米,顶宽11米,辟“西便门”,内侧有登城马道1条,外侧筑墩台3座,水窦1。东端与内城西南角衔接处建碉楼1,形制与北垣东侧之碉楼同,东、西两座碉楼,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不见载,但在清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外城……城闾七,角楼六”,应是將碉楼记在角箭楼类内。

外城各垣城楼、瓮城、箭楼。

永定门,为外城南垣正中门,即外城之正门,位于今永定门东、西街之交汇处,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同年十月竣工。初建时为重檐歇山式顶,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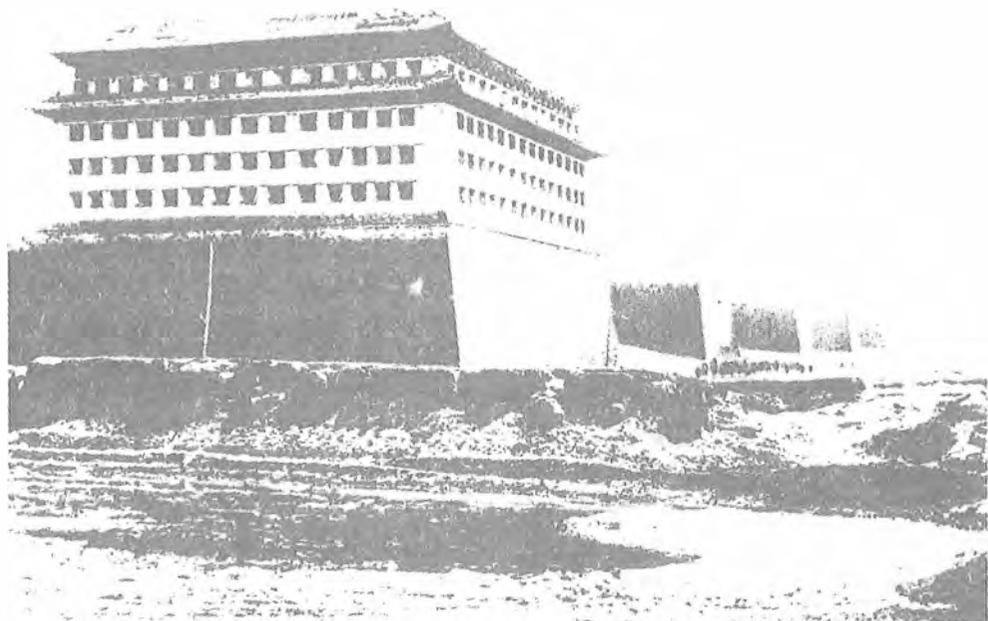
年)始增筑瓮城,未建箭楼。清沿明旧制,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完成的《康熙南巡图》第一卷,绘有永定门全景。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之《乾隆京城全图》,永定门仍为重檐歇山顶,有瓮城,无箭楼,故箭楼应在乾隆十五年后增建,并重建瓮城。所增建之箭楼,形制与外城其它各门相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建重修永定门城楼,提高永定门城楼的规制,箭楼未改。故永定门城、箭楼比例差距较大。永定门城楼台基宽28.30米,深13.70米,高8.30米,门洞高5.70米,宽5.10米。城台内侧筑马道1对,城楼为重檐歇山三滴水之楼阁式建筑,顶铺灰筒瓦,绿色琉璃瓦剪边,饰绿色琉璃脊兽,红色梁柱,施旋子彩画。一层,走廊内为红垩砖墙,明间前后及东西两侧壁各开过木方门。二层有回廊,三明间前后各装菱花格扇门14扇,东西次间为红垩砖墙,东西两侧开方门,城楼连廊面阔五间宽24米,进深三间连廊深10.50米,城楼连城台通高26.30米。清代历朝均有修葺。1950年在

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城垣各开一豁口,1957年,城楼与瓮城、箭楼同时拆除。

瓮城,明嘉靖四十三年初建,瓮城为圆弧形在对城门处辟券门,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瓮城、呈方形,北端接外城南垣为二直角,南端二角抹圆,东西宽42米,南北长36米,瓮城墙顶宽6米。

箭楼,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始增建。单檐歇山式屋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箭楼台基突出瓮城前缘3.2米,城台底宽19.5米,台深9.7米,顶宽17.6米,台高7.85米,正中辟券门高6.20米,宽5.20米,箭楼面阔三间宽12.80米,进深6.50米,高8米,连城台通高15.85米,正面辟箭窗二排,每排7孔,东、西两侧各辟箭窗二排每排3孔,共辟箭窗26孔,楼背后辟过木方门。永定门箭楼较城楼规制小,或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仅重修城楼,箭楼未作改变。

永定门是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的重要建筑标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路线,即



北平永定门一线带有马面的城墙及西南角楼

由永定门入城,经永定门内大街、天桥、正阳门外大街,至正阳门箭楼前接受检阅。

左安门(俗称“江擦门”)为北京外城南垣东侧门,位于今左安门内大街南口正中。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同年十月竣工,万历三十三年(1603年)重修,崇祯七年(1634年)修缮。清沿明旧制,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三十一年均修葺。城楼为单层,单檐歇山式屋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城台宽22米,高8.5米,下辟券门,高6.5米,宽5.8米,城台内侧筑马道一对。城楼梁柱为红色,红垩砖墙,明间及两侧各开过木方门,城楼面阔三间连廊通宽16米,进深1间连廊9米,城楼通高约15米。左安门距外城东南角箭楼很近。

瓮城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建,瓮城为圆弧形,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瓮城,瓮城北端接外城南城垣为两直角,南端呈圆弧形,东、西宽39米,南北长23米。

箭楼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增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修,为单檐歇山小式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箭楼台基突出瓮城前缘约3米,台基面宽25米,高9.5米,城台辟券门,券顶微尖,券门高6.5米,宽5.8米,箭楼连城台通高16.6米,箭楼正面宽13米,辟箭窗二排每排7孔,东、西两侧各深6米,辟箭窗二排每排3孔。全楼箭窗24孔,箭楼背面正中开1过木方门。城、箭楼于20年代已十分破败,30年代将城、箭楼拆除,仅存城、箭楼台基及券门。1953年将瓮城及城、箭楼城台拆除。

右安门(俗称“南西门”)为北京外城南垣西侧门,位于今右安门内大街南口正中,城楼、瓮城、箭楼之形制,修建年代过程均与左安门相同,左安门、右安门系姐妹门。右安门瓮城虽也是圆弧形,但瓮城较左安门略短,东西宽仅23米,南北长29米。

右安门于清末曾经修缮,故城门、瓮城、箭楼至50年代仍较完整,箭楼及瓮城于1956年拆除,城门楼于1958年拆除。

外城东南角楼,位于外城南垣与东垣

交汇处,今左安门内大街南口迤东约150米处。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历明、清各朝均有修葺,角楼为单檐歇山十字形屋脊建筑,顶复灰筒瓦,檐脊皆用灰瓦件,楼顶十字脊正中置圆形灰瓦宝顶。连城台通高15米,面阔、进深均为1间,均为6米,对外两侧辟箭窗两层每层三孔,共12孔。内侧辟一过木窄长方门。东南角箭楼于30年代倾圮仅存城台,城台于1953年拆除。

广渠门(俗称“沙窝门”)为北京外城东墙门,位于今广渠门内大街东口立交桥西,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同年十月竣工,嘉靖四十三年增建瓮城时,对城门曾修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重修。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清)皇太极进攻北京,袁崇焕于广渠门外击退皇太极。城、箭楼明末曾修葺,清沿明旧制,曾有修缮,城台宽约24米,高9米,下辟券门高6.8米,宽5.9米,城台内侧筑马道一对。城楼梁柱为红色,红垩砖墙,四面各开过木方门。城楼面阔三间,连廊通宽19.50米,进深1间,连廊10.30米,城楼通高约15.70米。

瓮城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建为半圆形。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瓮城,瓮城西端接外城东垣,两角为直角,东端为半圆形,南北宽39.5米,东西长24米。

箭楼为乾隆十五年(1550年)后增建,形制与外城各箭楼相同,城楼、箭楼均于30年代拆除,仅存城台、瓮城及箭楼城台。1955年在瓮城以北开豁口连通广渠门内外大街,1964年拆除瓮城及残存台基。

外城东北角箭楼,位于外城东垣与北垣交汇处,今东便门桥东南河之南岸。形制与建造年代同东南角箭楼,1900年八国联军击毁角箭楼,仅存城台,30年代建铁路复线时将城台拆除。

东便门,位于外城北垣东段偏西,今东便门桥北,通惠河之南岸。即在北京平面“凸”字形之左肩部,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同年十月竣工,但只命永定门等五门名,东便门、西便门未见命

名。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给外城七门添建瓮城时,始见东便门、西便门之名称。东便门城楼規制甚低,城门城台底宽12.2米,深13米,高7米,城台开过木方门,门内过道顶部为木板,门高5.5米,宽5米,城楼为歇山小式,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面阔三间,宽11.2米,进深1间5.5米,楼为砖墁红墙,刷青灰下肩,城楼连城台通高12.2米。

瓮城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建,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为扁长方形,南端两角与北垣相接为直角,北端西角抹圆,东西宽27.5米,南北长15.5米。

箭楼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增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修。箭楼台基宽15.5米,顶宽14.5米,深6.6米,台基高8米,箭楼台座辟券门,外侧为拱形,内为方形,券门高5.8米,宽5米,内侧过木方门高4.5米,宽4.5米。箭楼为硬山小式,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面阔三间,宽9米,进深1间,深4.6米,楼高4.7米,连台基通高10.5米,正面辟箭窗两排,每排4孔,侧面各两排2孔,全楼箭窗共16孔。

东便门与西便门为姐妹门,东便门外有大通桥,为通惠河上之重要码头,自明代废城内水运后,粮船的货物均在东便门外转陆运至城内。

东便门瓮城及箭楼于30年代拆除,城楼于1958年建北京站时拆除。

北垣东侧西端之碉楼,位于今内城东南角箭楼正北约100米外。即外城北垣西端与内城东垣南端衔接点,高于内城垣2.5米,高于外城垣约4米,顶为歇山小式,三面辟箭孔,一面6孔,一面为4孔,靠内垣一侧开小门1,有蹬道与内、外城垣相通,门上开2箭孔,共有箭窗12孔。碉楼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之后,或更晚。1920年时已残损无痕迹。

北垣西侧东端之碉楼,位于今复兴门南大街中段。为外城西垣南端与外城北垣两侧东端交汇处,碉楼形制同前。该楼于30年代倾圮,仅存残垣,1959年随地铁环

线工程拆除此段城墙,残存内城夯土芯一段,1987年将土芯外包砌砖石建造一座歇山小式顶的方楼,1988年竣工命名为“西便门”,城墙长195米,高11.6米,顶宽15米,但其地点、名称、形制均与西便门不同,不具有历史内涵。

西便门,位于外城北垣西侧正中,在今西便门内大街北口处。在北京城“凸”字形平面之右肩中部。始建年代与东便门相同,規制基本一致,城门城台基宽12.80米,顶宽12.10米,台顶进身11.1米,台高6米,城台内侧筑马道1条,城台开过木方门,门内过道顶部为木板,门高5.5米,宽5米,城楼面阔3间,宽11.2米,进深1间深5.5米,楼高5.2米,连城台通高11.2米。城楼四隅开过木方门。

瓮城建于嘉靖四十一年(1564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进深很短,南端两角与北垣相接为直角,北端两角抹圆,东西宽30米,南北仅长7.5米。

箭楼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增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重修,台基宽16米,顶宽15米,深6.6米,台基高5.8米,外侧开券门高5.4米,宽5米,内侧开过木方门高4.5米,宽4.5米。箭楼面阔3间宽9米,进深1间深4.6米,楼高4.7米,连城台通高10.5米,箭窗排序与东便门同,共16孔。

西便门城楼、瓮城、箭楼于1952年首批拆除。

外城西北角箭楼,为北京外城北垣西端与外城西垣北端交汇处,今广安门北滨河路北头偏东处。形制及始建年代均同外城东北角楼。于1957年8月拆除。

广安门(广宁门、俗称彰义门),位于外城西垣正中偏北,今广安门北顺城街南口与广安门内大街西口交汇处。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同年十月竣工,命名“广宁门”。初建时为单檐歇山顶与广渠门相同,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始增建圆弧形瓮城,未建箭楼。清沿明旧制,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瓮城增箭楼,箭楼形制与广渠门相同,清乾隆三十

一年(1766年)因广宁门是京城与南方陆路来往的重要门户,故提高城门規制。箭楼则未增大。广宁门城楼台基宽24米,顶宽22.8米,顶深15米,台高8.4米,辟券门,券门外侧高5.4米,宽5米,内侧高6米,宽5米,城台内侧筑登城马道一对。城楼为重檐三滴水,歇山式屋顶之楼阁式建筑,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城楼面阔3间宽13.8米,进深1间深6米,连廊通宽18米,连廊通深10米,广安门城楼楼廊甚宽,近4.2米。楼高17.6米,连城台通高26米。城楼首层为红垩砖墙,四隅辟过木方门,二层有回廊,明间前后均为菱花格扇门6扇,两次间为红垩砖墙,梁、柱、隔扇均为红色,梁、枋绘旋子彩画。

瓮城为明嘉靖四十三年增建,时为半圆形,经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重建及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建成为方形,瓮城东端与外城西垣相接为二直角,西端二角抹圆,南北宽39米,东西长34米。瓮城墙基厚7米。

箭楼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增建,形制与广渠门箭楼同,城台宽20米,深10米,高8.8米,券门高5.5米,宽5米,箭楼宽13米,进深6.6米,高7.8米,连城台通高16.6米,正面辟箭窗两排每排7孔,两侧各两排每排3孔,共26孔,背面辟过木方门。

广宁门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因避清宣宗旻宁之名讳,更名为“广安门”。广安门外经卢沟桥为陆路通往西南之要道,箭楼及瓮城于40年代初拆除,城门城楼于1957年拆除。

外城西南角箭楼,位于外城西垣南端与南垣西端衔接处,今右安门西城根西口与广安门南顺城街南口处。始建年代与结构形制均与外城西北角箭楼相同,1921年已严重损坏,30年代拆除,仅存城台,城台于1953年拆除。

北京城垣布局特点及现存状况

北京城垣及城门的布局,为均衡对称,

内城如东、西城垣之东直门与西直门相对称,朝阳门与阜成门相对称。外城东西垣之广渠门与广安门相对称,南北由一条中轴线相贯串,永定门经天桥(20年代拆除),正阳门城、箭楼、皇城之中华门(1959年拆除)、天安门、紫禁城之端门、午门、太和殿、乾清宫、御花园、钦安殿至神武门、北上门(1956年拆除)、景山门、景山万春亭、皇城地安门(1954年拆除)、地安门桥、鼓楼、钟楼。这条中轴线自元代已形成,至明永乐、嘉靖扩建北京城又向南延伸,至今此“中轴线”仍为北京发展建设规划之特色。

北京城门,现仅存正阳门城、箭楼,德胜门箭楼,内城东南角箭楼、鼓楼、钟楼。

紫禁城保存最完整,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遗产。

皇城正门天安门是全国、全世界所瞩目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1961年3月4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城正阳门城、箭楼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城东南角箭楼于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城德胜门箭楼,于1979年8月21日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书目: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Osvald Siren(喜仁龙)

《明代北京城垣》傅公钺·载《北京文物考古》1983年

《故都变迁纪略》余荣昌

《正阳门》单士元·载《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

《北京城墙辟豁口门洞》孔庆普·载《北京文物报》1997年8月

《北京城门图》1942年1月北京市公署调查

《1949-1978北京市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上)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作者为北京考古学会会员)

1975年发掘的北京昌平白浮墓地是继房山琉璃河遗址之后北京地区西周时期又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由于地处周燕文化北部边陲与戎狄文化交界地域,所以关于该墓地时代和性质尚存异议。笔者在学习发掘报告和相关研究成果时略有心得,撰此小文以求专家评判。

一、年代

白浮墓地存有三座呈倒“品”字形自北向南排列的墓葬,均为近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主头北足南。差异表现在棺椁规模大小、随葬品数量多少等方面。相比之下,位于东北隅的 M1 不仅棺椁规模小,而且随葬品只有一件小玉璧;而位于西北隅的 M2 和南端的 M3 棺椁规模较大且底部置有腰坑,随葬品也较为丰富。关于白浮墓地所居年代,原报告定为西周早期^①,后有学者改断为西周中期^②。

目前可为白浮墓地本身提供年代判断依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由采集木椁标本所提供的 C¹⁴测年数据(1295±155年 BC、1085±135年 BC)将其时代范围划在 1450年 BC~950年 BC 之间,约在商

北 京

昌 平

白 浮

墓 地

分 析

李 维 明

代晚期至西周中期^③;其二是 M2、M3 两座墓葬中可参照中原地区编年序列类比定位的陶鬲和部分青铜器:

1. 陶器

仅见于 M2、M3,数量不多,种类有鬲和鼎。其中鬲造型特征为体高小于体宽,口径约等于腹径;折沿外缘向上起棱,腹饰绳纹较粗。依联裆由微瘪渐平,足渐呈柱状变化区分为两式: I 式如 M2:26, II 式如 M3:10。

据 I 式陶鬲因与泮西客省庄 162:29 相近,判断其时代约在康、昭王之时; II 式陶鬲与长安长凶墓同类陶鬲相近,判断其时代约相当于穆王之时^④。

2. 铜器

仅见于 M2、M3,数量较多。可区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不同种类,其中有些器类演进态势较为明显,可选出排序如下。

簋 依体有无纹饰分两型:

A 型 体饰饕餮纹,如 M3:44。

B 型 素面簋,可分两亚型:

Ba 型 无耳、无盖,如 M3:9;

Bb 型 有双耳、有盖,如 M2:2。

戈 依内不同分两型:

A型 直内戈。依援造型不同分三亚型:

Aa型 长条形援如 M3:9。

Ab型 有胡,依胡渐长变化分三式:Ⅰ式如 M3:23,Ⅱ式如 M2:26,Ⅲ式如 M2:37。

Ac型 刃与胡连通,如 M2:2。

B型 釜内戈,如 M2:20。

戟 依造型不同分两型:

A型 直内,如 M2:35。

B型 曲内,如 M2:33。

短剑 依剑柄首部造型不同分四型:

A型 半球形首,依有无阑分两亚型:

Aa型 无阑,如 M2:7;

Ab型 有阑,如 M3:22。

B型 鸟首,依造型不同分两亚型:

Ba 单上阑,体较长。如 M2:40;

Bb型 双阑,体较短。如 M3:22。

C型 马首,如 M3:22。

D型 铃首,如 M3:16。

矛 依骹不同分两型:

A型 筒形骹,如 M3:6;

B型 菱形骹,如 M2:43。

盔 依顶部饰件造型不同分两型:

A型 网状饰,如 M2:10;

MB型 钮形饰,如 M3:1。

参照有关青铜器编年研究成果^⑤,可将白浮墓地出土部分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的青铜器按其使用年代早晚粗分为两组:

第1组 簠(A),戈(Aa、AbⅠ、AbⅡ、AbⅢ、B),戟(A),矛(A),短剑,弓形器,有銎刀,有銎斧,盔。使用时代范围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第2组 鼎,簠(B),壶,戟(B),戈(Ac)。使用年代范围约在西周中期。

上述分析表明白浮墓地 M2、M3 随葬器物群的使用年代不尽相同,最晚在西周中期,早的可至西周早期甚至进入商代纪年,以其中时代最晚的器物可将其埋葬时代定为西周中期。而 M1 埋葬年代因暂缺断代依据难以断定,其年代存在着或早于西周中

期、或近于西周中期、或晚于西周中期三种可能性,据琉璃河西周墓地Ⅰ区存在依时代早晚由西向东排列的迹象推断 M1 时代可能稍早。

二、文化性质

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处多种文化交汇区域,诸考古学文化兼容多种其他文化因素而主导文化因素却少有传承关系是一个突出的特点^⑥。因此,对白浮墓地文化性质的判断就必须以分析其文化因素构成为基础。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比较,可将白浮墓地文化内涵按渊源不同区分出如下四个系列:

1. 中原地区文化系列

文化因素特征渊于中原地区文化系列,可进一步区分出商周两种不同文化因素。其中如墓葬中设置腰坑并在其中殉狗的葬俗和随葬铜器戈(Aa)、矛(A)、戟(A)、部分工具、马具可归入商文化范畴,而陶鬲、铜器鼎、簠、壶、戈(Ac)、盾饰、部分马具、车具、卜甲可归入西周文化范畴。

2.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系列

文化因素特征渊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系列,可区分为两种文化因素。其中如三銎刀、有銎斧、铃首剑当来自西方的晋陕地区,而短剑、三齿状内钺、有銎戈、戟(B)、腿甲泡则是周邻地区文化因素在本区域兼容后形成的地方性文化特征。

3. 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系列

如以白膏泥封闭墓葬。

在计量分析基础上观察结果显示,白浮墓地文化内涵中以渊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因素或接受其影响的文化因素居于统治地位,其中又以西周文化因素为主导,商文化因素从属之。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因素虽然特征突出,但居陪衬地位。南方地区青铜文化因素更少。据此判断白浮墓地文化性质属于周燕文化范畴。

三、族属讨论

关于白浮基地的族属,学术界曾根据其位于永定河以北张家园上层文化区域和随葬部分青铜短剑而推断其属臣服于燕的异族首领之一^⑦或戎狄豪酋^⑧;或将 M2 中铜器戟(M2:35)、戈(M2:36)上铭文“丌”、“𠄎”释为“其”,并以此为根据推断其可能为商遗“箕”族^⑨;或曰北燕贵族^⑩。

张家园上层类型文化指以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一次发掘 T1^⑪以及该层以下部分遗迹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北端以东的京、津、唐地区,时代上限不早于殷墟文化一期,下限则随周燕文化的扩张结束时间有所不同,目前所见张家园上层类型文化墓葬特征为东西向竖穴土坑,随葬铜器以弓形器、有釜斧(管釜戚)、耳环、臂钏多见,陶鬲以夹砂褐陶,口沿贴泥条堆纹、高颈为特色^⑫。以此看来白浮基地文化内涵难以与张家园上层类型文化相联系,故戎狄之说不能得到考古学证明。

白浮基地为商遗之说是以其文化内涵中的商文化因素和两件铜兵器上的铭文被释为“其”为基础作出的一种判断^⑬,该判断较戎狄之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遗民文化是随着近些年来对于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王朝更替的产物为部分学者所认识并提了出来。如商代夏以后的夏遗民文化,周代商以后的商遗民文化等。一般认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是相联系的,但两者又不能完全视为等同,这是因为存在着在相继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可能为以同一族属为主体所创造和同一考古学文化是以某一族属为主体、由多族属共同创造这样两种情况,夏商周时期多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这一历史时期已经出现了按地域划分子民的国家。所以所谓夏、商、周文化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时期分别以夏、商、周三个不同古族为主体创造的三支考古学文化。而文化的创造者除夏、商、周三个不同古族外还应包括臣属

于三代王朝的其他古族,不过在主体族属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其他古族只能以从属地位文化因素的形式得以表现。因此,当夏、商、周文化一旦成立,在其分布区域内的前朝遗民只能以王朝中部分文化因素的形式体现,而不是与王朝文化并立的另一支不同性质的文化。夏、商文化的更替和商、周文化的替代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前朝遗民迁徙出王朝文化圈之外,也因在迁徙过程中和进入新的文化区域因与其他文化交互影响或互相兼容而难以维持原文化面貌不变,其结果往往是要么融入其他文化中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存在,要么与其他文化结合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所以,遗民文化理论因缺少时空范围而没有立足的根基。

在讨论了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之后再来看位于周燕文化北部边陲的白浮基地,因其文化性质属于周燕文化,故其族属只能在来自中原地区的商周古族中择一,笔者认为选择周族较为有利,根据其长方形竖穴土坑、仰身直肢葬式、头北向、“Ⅱ”形棺椁结构等与已知西周文化特征相符合;随葬礼器组合以 1 鼎配 1 簋和 3 鼎配 2 簋符合周礼对士的等级规定(《仪礼》);随葬的生活用品陶鬲为姬周族典型器物;卜甲刻辞特征亦与周原西周卜辞相同。可见白浮基地主要文化内涵从上层礼制到日常生活用品都表现出纯正的西周文化特征,其为姬周族遗存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他族属。若然,该基地应属于统兵镇守周燕北部边疆的一处贵族家族墓地,其中带“丌”、“𠄎”铭纹的兵器也可解释为该家族与商遗“箕”族发生过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婚姻、馈赠、贡纳、战争等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四、意义

检索北京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分布概况,西周早期周燕文化多集中于永定河东南方向的房山境内,以董家林古城为中心构成不同层次的聚落群。昌平境内白浮基地及临近的小北邵遗址^⑭和西北方向的雪山

遗址^⑭与顺义境内的牛栏山铜器群^⑮联成一线,表明周燕文化势力范围至迟在西周中期已经向北发展并深入到永定河北岸与燕山之间,构成护卫燕都的北部屏障以抵御戎狄南侵。

①北京市文物工作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②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未注明所测标本采集地层单位。

④分别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图版陆柒;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地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⑤参见朱凤翰主编《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李维明《北京地区夏商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浅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

⑦陈光《北京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⑧⑨⑩⑪⑫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⑬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

⑭有关小北邵遗址西周材料未见公布,其时代不明。因与白浮墓地相邻,两者应存在一定的联系,估计两者年代不会相去太远。

⑮有关雪山遗址西周材料未见公布,本文参照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若干问题研究》,《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⑯程长新《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文物》1983年11期。8件铜器已失去共存陶器和地层单位,其中鼎、卣、觚、爵可至成王,尊、觶约在康、昭之时。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说 明

《北京文博》2000年第2期封面所用图片内容,为房山区万佛堂唐代浮雕“万菩萨法会图”中之一部,这块石雕为明代所补,特此说明。并致谢吴梦麟老师。

更 正

《北京文博》2000年第2期张先得:《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一文,第74页右栏第一段中“……瓮城内箭楼下正中建真武庙……,真武庙于1992年复建,辟为钱币博物馆。”其中的“真武庙”应为“关帝庙”,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北京文博》编辑部
2000.8.14

大房山金陵考(续)

杨亦武

八、金陵的祭祀

大房山陵祭祀记有专员负责,并有定制。《金史》卷五·本纪第六·世宗:“大定八年十月乙未,命涿州刺史兼提点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则用素,望则用肉,仍以明年正月为首。”又特设万宁县(不久改为奉先县)专修山陵祭祀。

祭辰、元日、七月十五、冬至、寒食,依例要举行盛大的祭陵活动。祭陵时,皇帝派遣使、副使、礼直官、读祝官以及献官等官员举行祭典。每逢山陵致祭,还要祭大房山神“保陵公”,陵区内有奉祀“保陵公”的山神庙。金海陵王至卫绍王四代帝王都曾亲往大房山谒陵。

陵寝之县奉先县

《金史》卷二十四·志五·地理上:“奉先县:大定二十九年置万宁县以奉山陵,明昌二年更今名。”金代的奉先县在良乡县西,割良乡、范阳、宛平三县地而置,明昌二年(1191)东境拓至今坨里镇一线与良乡县邻,其西境在今霞云岭乡西部与宛平县邻。南北界不详。今房山区的坨里、河北、佛子庄三乡镇在金代统为奉先县神宁乡。

金奉先县城故址在今房山城西西沙河右岸的洪寺村一带,地当陵区东端入陵门户,是一座土城,城周1440步,城门四座:东为朝曦门、西为仰止门、南为迎恩门、北为拱极门。从各门的名称看,南门为帝、后谒陵时入城正门,故名“迎恩”;西门为谒祭山陵时出城入陵之门,故曰“仰止”。^③

西出奉先县城便是陵区行宫磐宁宫,过磐宁宫西北行,过坟山便到九龙山太祖陵区、鹿门峪诸王兆域,而北便是连泉顶东峪

的裕陵与道陵;过磐宁宫径直西行,乃是凤凰山陵区。

金章宗谒陵时,曾于奉先县城驻蹕。《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明昌四年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诸陵。癸酉,如秋山。”

金陵的守护神“保陵公”。

《大金集礼》卷三十七·保陵公:“大定二十年十月三日,敕旨山陵下盖山神庙,今后但节下去后臣交享祭。……大定二十一年敕旨坟山起盖山神堂。”山神庙乃是奉祀大房山神的,大定二十年(1180)在陵区盖山神庙后,二十一年(1181)便在庙内建主殿山神堂以奉大房山神。

起建山神堂的同时,金世宗原拟封大房山神为王,命礼部议定。大金封五岳四渎神为公爵,金人的发祥地长白山神为王爵。故礼部认为大房山神为山陵土地之神,难与和长白山神相提并论,应缘照五岳四渎例,封公爵。因此世宗敕旨封大房山神为崇安公,后来考虑到“崇安”只是高大安宁,无保护山陵之意,又改封为“保陵公”。

山神堂落成以后,世宗遣涿州刺史高季孙充册使、修撰赵撝充副使,前往大房山陵举行敕封大典。^④

《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大房山:“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为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香、币,使副持节行礼,并如册长白山之仪。”

如果与长白山册仪相同,行礼官要散斋两日,至斋一日。执事官员按照册礼礼仪陈

设器物。山神庙门外设玉册、充冕幄次，牙杖旗鼓从物等。

保陵公册文：“维年月日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我国既定鼎于燕，西顾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祖宗陵寝于是焉依。仰惟岳镇古有秩序，皆载祀典，矧兹大房，礼可缺欤？其爵号服章俾列于侯伯之上，庶足以称。今遣某官某，备物册命神为保陵公。申敕有司，岁时奉祀。其封域之内，禁无得樵采弋猎。著为令。使草木禽虫各遂其性，所以广先圣之德泽，而报神之功也。于戏！享之，庙食，赐乃多仪，佑列圣妥安，期亿年而有永，以笃金祐，时惟神休。”^⑤

行过册礼，祭保陵公。祝文：“盖以盘基所巩，陵寝是安。惟尔有神，实受其职。是用昭报，赐以显封。尚鉴予诚，永修灵佑！”

二十一年(1181)四月十七日，礼部检定下项礼数获准，每遇享祭日先次设祭物于山神庙，俟差去官山陵行礼之后，礼直官引提点山陵官公服诣神位前，再拜少进，北向跪奠，讫，免伏，兴，复位立，读祝官读祝，讫，免伏，兴，献官再拜，读祝官奠版于神位前，俟礼毕，诸陵署官取祝版焚之。

山神庙遗址在今坟山上，当地人称此地为“保陵公”。遗址呈正方形，面积大约有60平方米左右。南部还有很长的一段护墙，有古路遗迹，顺山势而下有金代建筑遗存：残砖、绿琉璃瓦、汉白玉残石等。

诸陵祭祀

《大金集礼》卷十二至十七：“世宗、显宗、熙宗，各本陵位祭，带祭后。

太宗、睿宗忌辰，各磐宁宫望祭，带祭后。

太祖忌辰，除不祭世祖外遍祭。

太宗、睿宗、世宗、显宗、熙宗，并带祭诸后。昭德后忌辰，磐宁宫望祭。忌辰本陵(明昌二年礼直官曹遭单子具到)，昭德忌辰磐宁宫，是大定二十九年七月内太常寺定来(部有卷)。

明昌二年九月，点检司申到，前月二十

九日奉圣旨，孝懿皇后陵前享祭，准备茶食四十桌子，宫借监已钦依前去坟山造办。

大安三年七月二日，礼部行下太常寺近奉圣旨，山陵下时新诸陵，下都交有者，省部除另行外来申，世祖位依自来享例，止于磐宁宫荐献。新物到，陵下署官公服再拜，兴，进前荐奠，讫，免伏，兴，退，再拜，讫，礼毕，并勘当到别无荐新。带享保陵公，礼例准行下云云。”

从上述记载来看，大房山诸陵忌辰的祭祀场所是有严格规定的，有的在本陵位祭，有的在磐宁宫祭。

除忌辰外，元日、七月十五、冬至、寒食，诸陵都要祭祀。

山陵祭祀由皇帝派出的专使行祭礼，使、副各一名。祭礼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读祝文，祝文是规定的成文，各陵忌辰祝文的内容不同，元日、七月十五、寒食节诸陵祭文相同。设读祝官一员、捧祝官两员专责读祝。

世祖忌日祭奠山陵祝文：

维年岁次月朔日辰，孝曾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官臣某，敢昭告于世祖(尊谥)皇帝：伏以右我后人，丕为圣绪。永怀遐馭，适及今朝。敬荐哀悰，冀垂昭鉴。尚飨！

太祖忌日祭奠山陵祝文：

维年岁次月朔日辰，孝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官臣某，敢昭告于祖(尊谥)皇帝：伏以烘惟圣绪，眇质获承。邈矣仙游，园陵在望。适及遏音之日，靡胜沾露之思。嘉猷就陈，哀悰可鉴。尚飨！

太宗忌日祭奠山陵祝文：

维年岁次月朔日辰，孝孙嗣皇帝(御名)谨遣某官臣某，敢昭告于太宗(尊谥)皇帝：伏以获承基绪，祇奉陵园。迨兹遏密之宸，深□盭伤之念。就陈嘉荐，庶鉴哀悰。尚飨。

睿宗忌日祭奠山陵祝文：

维年岁次月朔日辰，孝子嗣皇帝某，谨遣某官臣某，敢昭告于睿宗(尊谥)皇帝：伏以仙馭退登，历年滋久。望陵园之馆御，郁霜露之哀悰。庸致燭蒸，式昭永慕。尚飨。

(大定二年十月奉迁景陵自后遣使)

山陵元日遣使副祭奠祝文

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辰,孝子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具官臣姓名,敢名、敢昭告于(谥号)皇帝(谥号)皇后:伏以岁律更新,物毕资始,感兹时序,仰上园陵,庸致吉蠲,冀垂昭鉴。尚飨。

七月十五遣使副祭奠祝文:

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辰,孝子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具官臣姓名,敢名、敢昭告于(谥号)皇帝(谥号)皇后:伏以田甫登场,月当流火,感兹时序,仰上园陵,庸致吉蠲,冀垂昭鉴。尚飨。

大定十九年以祝版文理轻,另行撰定。七月十五祝文:

孟秋暨望,新谷将升。感时序以兴怀,仰园陵而致孝。荐馨香于令节,庶仿佛其平生。庸表精诚,冀垂昭鉴。尚飨。

冬至遣使副祭奠祝文:

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辰,孝子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具官臣姓名,敢名、敢昭告于(谥号)皇帝(谥号)皇后:伏以律候已阴生,日迎长至,感兹时序,仰上园陵,庸致吉蠲,冀垂昭鉴。尚飨。

寒食遣使副祭奠祝文:

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辰,孝子孙嗣皇帝(御名)谨遣具官臣姓名,敢名、敢昭告于(谥号)皇帝(谥号)皇后:伏以和解以灰,燧榆改火,感兹时序,仰上园陵,庸致吉蠲,冀垂昭鉴。尚飨。

自大定二十一年敕封保陵公后,祭陵时还要祭保陵公,祭保陵公也要读祝文,祝文也是规定的成文。

金世祖以下列祖列宗忌辰祭保陵公文:

维年月日岁次月朔日辰,皇帝某,谨遣某官臣某,昭荐于保陵公:祇奉永陵(睿陵、恭陵、思陵、景陵),式临讳日。追伸感慕,往致吉蠲。仍敕使輶,展祀祠宇。聿遵彝典,宜鉴精衷。

明德皇后忌辰祭保陵公文:

西山之原,陵寝斯在。属当讳日,爰举祭仪。惟尔有神,宜从兹荐。

七月十五祭保陵公文:

列圣园陵,神实保佑,比颁显册,封以上公。申敕有司,俾修嗣事。从厥岁序,著为彝仪。

冬至祭保陵公文:

瞻彼西山,园陵斯在。以左以右,维神之功。长至在辰,宜从与享。尚其英爽,歆此酬觞。

元日祭保陵公文:

陵寝孔固,惟神尸之。相与有功,宜在祀典。兹爰改火,礼亦顺时。往致荐羞,是用昭报。^②

祝文写在祝版上,祝版以梓楸木为之,长二尺,广一尺,厚六分。大定十九年(1179)六月二十三日,敕旨山陵祝版用女真字。祭陵后,祝版由提点山陵官监视焚燎。^③

九龙山太祖陵区,曾于50年代出土过祝版,1976年又发掘出两个祭祀坑。

金历代帝王大房山谒陵

金代皇帝谒陵活动自海陵王始,历世宗、章宗、卫绍王四帝,宣宗虽在中都即位后才南迁的但却没有谒祭山陵的记载。其谒陵曰谒、曰奠、曰荐、曰献享、曰致祭。

大房山陵乃海陵王勤营,他在位来大房山七次,五次为营陵而来,只有两次是前往谒陵的:^④

正隆二年(1157)二月庚子,谒山陵。辛丑,还都。

五年(1160)八月辛未,谒山陵,见田间获者,问其丰耗,以衣赐之。九月己卯,还宫。

金世宗在位谒陵七次:^⑤

大定二年(1162)正月乙亥,如大房山。丙子,献享山陵,戊寅,还宫。

十月戊辰,如山陵,谒睿宗皇帝梓宫,哭尽哀。戊子,葬睿宗皇帝于景陵。

大定三年(1163)八月乙酉,如大房山。丁亥,荐享于睿陵。戊子,还宫。

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

大定四年(1164)正月辛亥,获头鹅,遣

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

八月己卯,如大房山。辛巳致祭山陵。九月癸未朔,还都。

大定七年(1167)八月己未,如大房山。壬戌,致祭睿陵。九月乙丑朔,还宫。

金章宗谒陵九次,其中授皇太孙册谒陵一次,在位谒陵八次:^⑩

大定二十七年(1187)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孙册,赦中外。丁巳,谒太庙及山陵。始受百官笺贺。

大定二十九年(1189)八月丁酉,如大房山。戊戌,谒奠诸陵。己亥,还都。

九月乙酉,如大房山。冬十月丁亥朔,谒奠诸陵。己丑,还都。

十二月乙巳,祭奠兴陵。

明昌元年(1190)正月甲子,如大房山。乙丑,奠兴陵、裕陵。丙寅,还都。

二月甲寅,如大房山。三月乙卯朔,谒奠兴陵。丙辰,还都。

九月,甲寅,如大房山。乙卯,谒奠裕陵。丙辰,还都。

明昌四年(1193)九月庚午,如山陵,次奉先县。辛未,拜天于县西。壬申,致奠诸陵。癸酉,如秋山。

泰和三年(1203)十一月丁丑,冬猎,以获兔荐山陵。

卫绍王在位只有一次谒陵有记载:^⑪

大安元年(1209)九月,如大房山,谒奠睿陵、裕陵、道陵。

太子诸王及宗亲谒陵

《金史》中记载太子及诸王、宗亲谒陵的记载很少,但是毫无疑问,这是金陵祭祀的重要内容。

《金史》中有两则海陵太子光英,世宗太子允恭谒祭山陵的记载:

《金史》卷八十二·列传第二十·海陵诸子:“正隆六年,海陵行幸南京,次安肃,光英获二兔,遣使荐山陵。居数日,复获獐兔,从官称贺,赐光英名马弓矢,复遣使荐山陵。”

《金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世纪补:允恭“尝奉诏拜陵,先猎,射一鹿,获之,即命罢

猎,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杀?’”

《金史》中有一则有关诸王宗亲谒陵的诏命:

《金史》卷九·本纪第九·章宗:“泰和三年十二月辛亥,诏诸亲王、公主每岁寒食、十月朔听朝谒兴、裕二陵,忌辰亦如之。”

由《金史》记载考之,太子、诸王及宗亲是不能随意谒陵的,需依诏命而行。

九、金陵的兴衰

古代,由于交通闭塞,房山区西部的大房山区本是一处偏僻荒凉的所在,徒有壮丽的山峰、茂密的山林和潺潺溪水。当东部的良乡更替着一幕幕繁华时,西部的大房山区却一向渺无人迹,偶尔于风景佳处坐落着几处禅宫、道观而已。大房山金陵的出现使古老的大房山顿然生色,临河界谷封堠比立,诸陵箕布兆域百五十六里;涿州刺史提点山陵,率先县雄居陵关。山陵时祭,陵使络绎。天子常谒,輶来辇往。金陵——这座大房山区的帝王陵墓群,不仅点染出大房山的繁华与神圣,也造就了古代房山地区西境的繁荣。

道陵前夕照苍茫

卢沟清绝霜晨住,步落月问倚阑父。

蓟门东直下金台,仰看楼台飞雨。

道陵前夕照苍茫,叠翠望居庸去。

玉泉边一派西山,太液畔秋风紧处。

这是元代散曲家冯子振所作的《鹦鹉曲》,咏叹的乃是《燕南八景》,曲中的“道陵前夕照苍茫”,描绘的便是大房山金陵中的章宗道陵。这阙散曲告诉人们,元代大房山金陵的“道陵苍茫”与“卢沟晓月”、“蓟门烟树”、“金台夕照”、“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同为“燕南八景”之一。这说明金元朝代的更替,并未给大房山陵造成破坏,有元一代,金陵成为燕南的一大景观,尤以道陵为世人爱赏。

天启毁陵

到了明代,金陵虽历经风雨,但是直至

明代中叶,还一直得到明王朝的祭祀。明嘉靖年间,章宗道陵仍是大房山金陵的一处著名景观,还时常有游人前来。

明代晚期,女真人后裔满族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王朝在女真人的发祥地东北崛起,屡次打败明朝军队,萨尔浒之战和锦州之战,明朝军队一败涂地,明统治者惑于形家之说,认为是满人的祖陵大房山王气太盛的缘故,所以,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之祀,二年(1622)拆毁金陵,剷断地脉,大房山金陵遭遇灭顶之灾。当年明王朝派出大批人马,摧毁了区内所有建筑,连大房山顶的崇圣宫、白云亭都被夷为瓦砾。仅有陵区行宫磐宁宫,由于已改为佛寺而幸免。

所谓“剷断地脉”乃是掘损山体以图破坏山陵风水。至今当地还留传着“砍龙头”、“刺龙喉”的说法,并留下明人捣毁山体的遗迹。明人在金太祖睿陵所依九龙山主龙脉的“龙头”部位摧山至损,这就是所谓“砍龙头”。又在“龙喉”部位深凿洞穴,在洞穴内填置鹅卵石,这就是所谓“刺龙喉”。天启三年(1623),明人又在陵区内建关帝庙,以为厌胜之术。^④

明人这些愚蠢的举动并未改变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大房山金陵却被彻底摧毁。

清代山陵的复兴

据清圣祖康熙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⑤记载,清天聪三年也就是明崇祯二年(1629),清太宗帅清兵攻入关内,曾遣王贝勒大臣到大房山的金太祖睿陵和世宗兴陵致祭。

《崇祯长编》卷三十四也有一段清兵进犯房山后祭陵的记载,崇祯三年(1630)五月“初二日,大清千余骑至房山县城外东岳庙,遂遣一骑至城下云:‘房山县是金大定年间建立守陵,县官应开门相迎。’知县杨某不应,骑遂以大斧劈城,城中男女仓皇号泣。生员李元勋、弥愈扬、曹耿因事急,挺身出城,说以‘既系陵邑,不宜加害人民。’辗转陈譬,自午至申始去。

次日,前骑来言:‘主帅已有谕帖,不许

杀人,但十一日祭陵。尔等当前往扫除耳!’至日,果有三千骑过县北,云祭品已备,毫不相犯,止呼生员数人引导,三生遂如约出城。又有本县典史及生员孟宗孔、张养中、张绳武、赵嘉胤、刘光远、马出图、董之渲、陈如吕等八人随往九龙岗。祭章宗陵毕,其日遂回良乡,次日起营而去霸州。”

“东岳庙”在房山城东二里饶乐府村,“知县杨某”考房山县志为杨齐芳。当年,清人所祭乃章宗道陵,祭陵路线从县北出发,太宗所遣王贝勒大臣自备祭品,在十一位县人引导下,帅三千骑浩浩荡荡前往章宗道陵祭祀。

《崇祯长编》中所记清人祭陵事,在天聪四年。

满清定鼎后,大房山金陵受到清统治者的重视。清顺治三年(1646),清世祖派礼部官员视察金太祖睿陵、世宗兴陵,“修其颓者,俾規制如初。”这是清代第一次修复太祖、世宗二陵。又设守陵五十户,除拨置香火地外,每户各给养赡地,责令春秋两季置办祭品,凡礼部差查陵寝一切迎送供给等项均由陵户置办。每岁春秋仲月命礼部择定日期,由房山知县前往九龙山祭祀金太祖、世宗陵,睿、兴二陵在明天启毁陵后的废墟中重现生机。清世祖顺治帝特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记其事。

此后,陵户曾与里民因金陵祭祀供应发生一起公案。陵户冯九仕等借陵事向里民勒索钱财,将供应修缮等项费用转嫁里民,侵欺租钱,托名自备祭品,遂将不堪之物致祭金陵,致使谤议沸腾。于是,金陵地方总甲张令芳等以“侵租藐祭”联名控告冯九仕等人,由生员李于应等具呈知县母配申。冯九仕等人畏罪逃往北京,反到礼部污告张令芳“贿买伙告”。此案终于水落石出,冯九仕等陵户各责十五大板,官方责令冯九仕众陵户,以金陵香火地地租治备祭陵等项费用,保证祭品质量,不得再以陵事派扰里民。又责成房山知县于陵户春秋两季备办祭品祭陵前,先审查祭品。^⑥

圣祖康熙即位之初,“缅溯前徽,特命所

司,虔申堙祀,以昭继述阐扬之意。”康熙二年(1663)九月,康熙帝特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立于九龙山金太祖、世宗陵前。

乾隆十六年(1751),命直隶总督方观承修金太祖、世宗陵。金太祖陵前基较宽,增修享殿一所,建围墙,立正门,原有祭台、甬路、石级一并修治。金世宗陵,增修享殿一所,并祭台、甬路等,陵前地狭窄不能立正门,就碑亭前接连栅栏,立二角门。方观承还奉旨修了自房山城北门至九龙山金太祖、世宗陵的二十里山路。^⑤

乾隆十八年(1753),山陵工程竣工,乾隆帝亲至太祖睿陵展谒,遣大学士阿克敦祭世宗兴陵,命金裔完颜氏子孙陪祀。当年,完颜氏合族八旗五十九支,现任官员九十六员,陪祀于山陵享殿下,祭陵之后,又随乾隆帝前往涿州行宫向乾隆帝谢恩。陪祀人中有金世宗旁支二十一代孙完颜勉斋,此人官任笔帖式,乾隆帝赐其彭缎一端、荷包一对。^⑥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两金川致祭五岳四渎、历代帝王陵寝五十九处,择选通经术、识礼仪的公卿分六路行祀,通议大夫、大理寺卿尹嘉铨致祭金太祖陵、金世宗陵,六月十八日在九龙山下的睿陵与兴陵举行了盛大的祭典。“乃张天子銮,仪卫所颁幢牙茸纛、金节析羽、旌……诸物,咸铺于两陵直三峰山下。礼仪既备,鼓乐并作,公(尹嘉铨)乃率即事文武官属俯听位各执其职。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则秩于几筵,其樽彝边俎豆盞之器则洁于坛堂,其升降俯仰拜跪兴立之节帽中于式度。捧读祝帛之官,赞引之士皆次列于楹西阶上。以待卒事,退而视其燔燎埋终之以敬然后毕。嘻!是亦千古之旷典也。”^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完颜勉斋的曾孙完颜麟庆带领二子在洪恩寺僧人裕全和一位陵户的引导下来到九龙山下,拜谒金太祖、世宗二陵。麟庆把拜陵经过载入他所著的《鸿雪因缘图记》,并绘《房山拜陵图》描绘当年拜陵的情景,这幅珍贵的拜陵图展现了经清代修复后睿陵和兴陵的原貌。从此图看,道光年间清代重修后的睿陵和兴陵完

好如初。陵寝北倚九龙山,东、西、南三面是高大的围墙,墙内有享殿、碑亭,陵寝最上端是高大的石砌祭台,祭台两侧有汉白玉栏杆,中央有石级向下,直通陵寝神道。陵区林木丰茂,二水合流,非常壮观。

金陵的结局

清末民初,由于兵劫和匪祸,金陵仅存的睿陵、兴陵遭到摧残和盗掘严重损坏。

新中国建立后有关专家学者到九龙山陵区考查,睿陵、兴陵地表建筑均已倾圮,仅存封土。睿陵封土较大,高约5米,围30余米,下部为砖砌,上部为三合土夯成。封土南面有享殿台基遗址一处,用光平的平石砌成,殿基宽16米,进深12.20米,高出地面0.50米以上。纵横排列着4行共16个石柱础,柱础直径约0.30米。封土与享殿台基周围有东西约26米、南北约60米的残毁围墙环绕,残墙为砖石砌成。围墙以南有碑亭遗址一座,亭顶已毁,亭内的清世祖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已剥蚀不清。睿陵封土以东三四十米处为世宗兴陵封土,结构与睿陵封土相同,但规模稍小。享殿已无迹可寻,陵前亦为残碑亭一座,亭内清圣祖康熙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尚清晰可读。^⑧这是50年代九龙山太祖睿陵、世宗兴陵的状况,现在陵区的碑亭、清帝御制碑、享殿残基、世宗兴陵封土已经不复存在,太祖睿陵封土也已严重破损,仅残存一部分。

大房山金陵是北京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物,尽管这座规模庞大帝王陵寝已面貌全非,但是其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是不可否认的。九龙山太祖陵区是陵寝特征保留最明显的区域,且有历史文献绘有清代陵区全貌,建议在适当时机加以恢复,展陈金陵文物,介绍金陵,介绍女真文物和金国的历史。以供中外人士观览和研究。大房山金陵旅游,迟早会成为京西南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⑤据清于敏忠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一·京畿·房山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⑭以上均据《大金集礼》卷三十七·保陵公。

⑮《金史》卷三十五·志第十六·礼八·大房山、《大金集礼》卷三十七·保陵公分别载有保陵公册文。册文内容自“著为令。”以前相同。《金史》册文到“著为令。”结束，《大金集礼》册文自“著为令。”以后，多“使草木禽虫各遂其性，……以笃金祐，时惟神休。”部分。且后边还载有祭保陵公祝文。

⑯以上祭祀祝文载于《大金集礼》卷三十八·沿祀杂录。

⑰据《大金集礼》卷三十八·沿祀杂录。

⑱据《金史》卷五·本纪第五·海陵。

⑲据《金史》卷六、七、八·本纪第六、七、八·世宗上、中、下。

⑳据《金史》卷九至十二·本纪第九至第十二章宗一至四。

㉑据《金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卫绍王。

㉒清世祖《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惟金朝房山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师克取辽东，故明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本朝王气相关，遂刚断其地脉。……明复加摧毁，且建立关庙，为厌胜之术。”清圣祖《御制

金太祖世宗陵碑》：“惟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取辽阳，故明惑于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勃海，王气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之祀。二年，拆毁山陵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

㉓清圣祖《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又己巳岁，我太宗文皇帝统师入关，念金朝先德，遣王贝勒大臣致祭。”

㉔据民国十七年(1928)《房山县志》卷七·艺文《母邑侯申革里民值月并厘剔夙弊碑》。

㉕清周家楣、缪荃孙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六·地理志八·冢墓(1987年1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㉖清完颜麟庆《鸿雪因缘图记》《房山拜陵》。

㉗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张世法《房山县志》——《皇上平定两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记》。

㉘据《中国历代帝王陵寝》。见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房山文史》第三辑所载肖志《北京的金陵二》一文引文。

(作者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欢迎订阅 2001 年《丝绸之路》(月刊)

《丝绸之路》系综合性文化刊物。它以弘扬丝绸之路优秀历史文化、展示现代丝绸之路发展风采为主旨，以高起点、高品位、高水平为质量要求，努力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济、中国与外国、专家与群众之间铺路架桥。1994年和1999年连续两次被评为甘肃省一级期刊。

为迎接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文化建设，从2001年元月起，《丝绸之路》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改刊以后，在内容上将加大旅游份量，进一步突出表现西部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强化西部风情和多民族色彩；在表现形式上将向通俗化靠拢，力求高雅清新、生动活泼、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增强可读性，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将成为本刊奋斗的目标。

为适应专家学者需要，荟萃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本刊每年还将不定期编辑出版“学术专辑”。

尊敬的读者，《丝绸之路》——

是你解读古代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钥匙；

是你了解现代丝绸之路绚烂现实的窗口；

是你游览中国西部奇异景观的指南。

《丝绸之路》为国际通行大16开本，64页，四封彩印，配英文目录和重要文章英文提要，每期刊发彩色、黑白图版40~50幅，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为兰州市邮局，全国各地邮局征订，邮发代号54-87；国外总发行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邮发代号M4485；杂志社办理函购业务。社址：兰州市安宁东路805号 邮编：730070 联系人：王挺 电话：(0931)7971567 传真：(0931)7971623 E-mail:SCZL@lz.gs.cninfo.net

简析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 龙霄飞

元代是历史上中国经历长期分裂后又一次出现的大一统王朝,它的繁荣与昌盛为明、清两代封建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承前启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大量器物对全面认识元代瓷器的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标本,尤其是在集中的时段内出土大量的遗物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元大都遗址概况

“元大都遗址”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十分模糊的概念。说它明确是因为元大都的范围是一定的,它有明确的界划;说它模糊是因为具体的遗址有很多,涉及到某件器物仅仅说出土于元大都遗址是很笼统的。因此有必要对“元大都遗址”的具体情况做一说明。

“元大都”这一概念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它是指元大都城,城址轮廓范围明确,北面的城墙东起北土城,西至黄亭子(今学知路口),遗迹犹存,即所谓的“土城”;西面城墙北起黄亭子,南至复兴门;南面城墙西起复兴门,东至建国门;东面城墙南起建国门,北至北土城。全城平面为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共约 28600 米^①,元大都即指在这一长方形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元大都遗址从广义上讲应该与元大都的范围是一致的,元大都内一切的元代建筑遗存均属于元大都遗址;但我们现在所说的元大都遗址是从狭义的角度讲的,它所包括的范围比元大都的范围要小得多,它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指一些特定的元大都建筑遗存,而非泛指。这些具体的遗存是指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勘查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和河湖水系遗迹后,发掘的十几处各种不同

类型的建筑遗址。此外,元大都遗址还应包括在各种基本建设过程中零星出土器物的地点。其中经过勘查发掘的遗址主要有以下几处:学院路与转角楼水涵洞遗址、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桦皮厂居住遗址、旧鼓楼大街豁口西居住遗址(即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居住遗址)、雍和宫后居住遗址、雍和宫豁口东居住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元代器物,瓷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

二、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代瓷器

元代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前承宋、辽、金,后启明、清两代。这一时期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如钧窑、磁州窑、定窑、龙泉窑以及山西地区的黑釉瓷窑和南方的青白瓷窑都在继续生产,特别是在元代后期,景德镇窑逐渐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除青白釉、白釉和黑釉外,又生产了创新品种,如卵白釉(即枢府釉)、釉里红、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等;结合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能够看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1. 青釉瓷

青釉器物多数为龙泉窑或是仿龙泉窑的作品。器型品类较多,器物数量的多少与器型密切相关;数量较多的是盘、碗、罐、碟、高足杯,其它如洗、盏托、瓶、钵、造像的数量较少。盘类器物口径都不甚大,一般在十几厘米左右,器物装饰较少,有做成通体花瓣形的,有的仅在盘内心刻划纹饰图案,装饰手法比较简单。此类器物不以纹饰取胜,而以釉色为其特色,如青釉花瓣形盘(见彩插图一),盘口为花瓣形,盘身也与花口相对应做成瓣棱形,盘心刻划花卉纹,通过施青釉,起棱处釉色浅薄,泛白色。碗的造型有

普通式碗、鸡心式碗与高足碗三种,装饰以釉色为主,兼采用刻、划等手法饰以简单图案。罐有普通无系罐和四系罐两种,造像分为人物与动物两种,人物为娃娃造型,动物为狮子造型;其它器物数量都很少,一般仅为一件。

2. 白釉黑彩瓷

白釉黑彩瓷一般习惯称作白地黑花瓷,这类器物为磁州窑系的作品,是元大都遗址出土较多的瓷器品种之一。

从器物造型来看,主要有罐、瓶、盆、碗、盘、壶等类,种类比较单一,但数量都不少。罐有无系罐与四系罐两种,瓶可分为普通瓶、四系瓶、鸡腿瓶、梅瓶四种,碗、盆、盘、壶的造型则较为单一。磁州窑器物的纹饰较为丰富,有龙、凤、鱼、花草、诗文等,或开光内绘画,或通体描画,或下半部施黑釉,上半部描画,或以弦纹相间分段绘画;纹饰以绘为主,兼以刻、划等手法相辅。通常这些装饰图案用笔奔放、潇洒,不拘小节,大胆涂抹,表达出了放荡不羁的豪爽之气:如龙凤纹四系扁壶(见彩插页图二),一面为龙,一面为凤,器型独特,纹饰粗犷,是一件兼具古拙朴实与遒劲雄浑风格的作品,另外一件诗文大罐(见彩插页图三)高达40厘米,肩部绘弦纹、斜十字条纹与卷草纹,腹部为行草书七言诗一首:“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并有“清净道德”四字题款。此件器物形体硕大,造型线条流畅圆润,作为纹饰的书法气度豪迈,是一件典型的元代器物。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白釉黑彩器物的黑彩发色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发色浓黑光亮的,一类是发色较浅呈褐色或酱色的;这两类情况或单独各自存在于不同器物上,或同时存在于一件器物上,这主要是因为黑彩料中含铁量高低不同以及烧成温度、窑炉气氛不同等因素造成的。

3. 黑釉瓷

黑釉器物有两种情况,一是器物通体施

黑釉,一是大部分施黑釉,一部分为白釉,通常上半部为白釉,下半部为黑釉。从元大都遗址出土器物来看,造型比较简单,有瓶、罐、缸、盘、碗几类。其中瓶的造型最为丰富,包括普通瓶、双系瓶、四系瓶、梅瓶和葫芦瓶。梅瓶是从宋代开始流行的一种器型,到元代更是大受欢迎,流行更广,元大都遗址中所出梅瓶不仅仅限于黑釉一种釉色。黑釉梅瓶有刻字与无字两种,刻字的一种(见彩插页图四)一般在肩部刻“内府”二字,字是施釉完毕后在釉上直接刻划,而不是在胎上刻划,从字口可以看到釉层与胎体,这样“内府”二字就显现出胎体黄中泛白的颜色。

4. 酱釉瓷

酱釉是以铁为着色剂的一种釉色,颜色介于青色与黑色之间,由于含铁量和烧成气氛的不同,呈色有浓淡深浅的变化。黑釉有时烧造不好,也会出现酱色的效果。在元大都遗址所出的器物中,酱釉器物与黑釉器物出土数量都不在少数,但二者有时亦不太好区分,酱釉稍深些接近于黑釉,而黑釉稍浅些又接近于酱釉,对二者的认定有时存在交叉的情况。

酱釉器物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有瓶、缸、罐、盆等四类,其中瓶又分为普通瓶、双系瓶、双系尖底瓶、鸡腿瓶四种,缸、罐、盆相对瓶数量较少。这一类器物制作普遍比较粗糙,胎质较为疏松,胎体厚重,釉色亦不甚均匀,是日常的生活用器。

5. 钧釉瓷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钧釉器物造型主要有盘、碗、洗、水盂、碟、瓶几类,其中以碗、盘的数量最多。从这些出土物来看,大多数是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而烧制的普通器物,釉色大多为月白、天青、天蓝、和带红紫斑的,基本上没有晕散流动的现象,确实没有像宋代那样绚丽的作品;这类器物胎骨厚重,釉薄厚不匀,色泽暗淡重浊,釉表多棕眼,釉汁堆积如蜡泪,底足旋削痕迹明显,与一般文献记载的元钧瓷特点相符。当然,并

不是元代钧釉瓷就没有优秀的作品,在元大都遗址的出土物中就能找到出类拔萃的器物。后桃园居住遗址中出土的双耳连座瓶(见彩插页图五),高63厘米,通体施天蓝釉,颈、肩、座上带有紫、红、蓝、褐色彩斑,瓶口沿下折为五个花瓣,如盛开的牵牛花,颈肩部有对称的两个兽形扁耳,肩部为对称的虎头辅首,虎额头上有黄釉“王”字;瓶座上部为盘状,底座的每面中间有一圭形孔,孔间为扁柱,柱外起扁凸棱,每孔上端有一力士,柱棱上端各有一突出兽头,但因施釉较厚,兽首、力士都已不十分清晰了。这件作品造型别致,形体高大,釉色艳丽,是元钧釉瓷中的佳品。

6. 白釉瓷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白釉器物胎体较为粗松,旋痕明显,釉色白中泛黄,多数器物有缩釉现象或釉中带有杂质。器物造型有盘、罐、坛、碟、碗、瓶、高足杯、钵几种,其中罐又有带四系的一种,瓶又有梅瓶一种,碗中又别有灯碗一种,虽与碗造型相类,但却是做为照明工具使用的。

7. 三彩瓷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三彩器物数量不少,但大部分为陶质建筑构件,瓷器数量较少。即使是称作瓷器的三彩瓷,大多数也是属于半陶半瓷性质的器物:主要有炉、盘、碟、瓶、碗几种,其中以炉的数量最多,这些炉在以三彩为基本装饰之外,又运用镂、雕、塑、刻等多种手段丰富了器物的装饰效果,在元代瓷器中别具风采。如三彩镂空龙凤纹炉(见彩插页图六)上龙盘绕于山间,凤飞翔于云间,以黄、绿、蓝三色相间装饰,色调明快,色彩浓艳,加以镂空手法的刻画使主题更显生动而富趣味。再如一件三彩器座(见彩插页图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镂空花卉一周,下部为圆形鼓凳,花卉雕镂精致细腻,鼓凳造型繁简适度,通体以蓝色为主色调,并以黄、绿二色相间装饰,朴素沉穆而不失灵动,与三彩镂空龙凤纹炉的色彩绚丽恰成鲜

明对比。

8. 卵白釉瓷

卵白釉即枢府釉,是元代景德镇在青白釉的基础上生产出的一个新的釉色品种。它的釉色较青白釉更偏白,近似鹅蛋色。从整个北京地区来看,元代卵白釉器物出土的数量尚算丰富,但仅仅从元大都遗址来说,它的出土数量很少,仅只盘、碟、碗三种造型,数量也不过十多件,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器物同样反映了卵白釉器多小件作品的特点。

9. 青白釉瓷

青白釉是元代瓷器生产中一个重要的品种。从元大都遗址所出器物数量来看,青白釉瓷的数量占到了第三位,仅次于青釉瓷和白釉黑彩瓷的数量。从器物造型上看,也是十分丰富的,其种类远远多于其它釉彩品种,主要有碗、皿、杯、灯、炉、罐、盆、壶、碟、高足杯、高足碗、盘、笔山、造像等,其中又以碗、碟、盘、罐的数量为多。从这些出土器物来看,器型较大的如罐、壶、炉等,一般胎体较厚重,装饰也较丰富、复杂些;器型较小的如碗、盘、碟等,一般胎体较轻薄,装饰相对简单些。

元代青白釉瓷继承了宋代的风范,同时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一些体型较大的器物,装饰手法多样,工艺水平更趋成熟,这从元大都遗址的出土物中就能看出这一点。如自在观音像(见彩插页图八)高达65厘米,神态安详,端庄肃穆,光洁莹润的青白釉色与观音的恬静超然相得益彰;再如刻花双耳扁壶(见彩插页图九),口部为椭圆形盘式口,颈两侧贴塑龙形双耳,足部较高,全器以雕、刻、划、塑等技法装饰有云雷纹、龙纹、牡丹纹、蕉叶纹等各式纹样,通体施青白釉,纹饰清晰,造型庄重典雅,线条流畅圆润,虽为拼合之器,仍不失其精美。当然,形体小的器物同样有精品,如镂空五峰笔山(见彩插页图十)以五座镂空的山峰做成笔架,峰顶有浮云环绕,主峰为彩云托月,山崖一侧有藤蔓与青竹,山脚下为浪花飞溅的海水,水

中游龙嬉戏,器物造型别致,想象丰富,极富装饰性,青白釉色莹润雅洁,令人爱不释手。

10. 青花瓷

元代青花瓷器一向受人瞩目,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大多数为正式考古发掘品,年代确切,因而从它们一出土便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关注。

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瓷器共计16件^②及部分瓷片,仅旧鼓楼大街豁口窖藏一次就出土了10件^③,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凤首扁壶,其它器物则发现于西缘胡同居住遗址、后英房居住遗址等处。这些青花器物可以明显地分为精、粗两类,精致的一类器型相对规整,釉色滋润光亮,青花发色鲜艳,胎质相对较细腻;而粗陋的一类器型不太规整,釉色失亮,青花发色浅而暗淡,胎质较粗。

在这批青花瓷中,仅有一块瓷片可以看出是一件大罐的残片,其余器物型体都不大。器物造型有觚、碗、盘、壶、盏托几种。从这些器物青花的色泽上来看,明显地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青色浓艳,通体出现深色结晶斑块的,如菊花纹盏托(见彩插页图十一)全器构图严谨,层次多而不乱,纹饰用笔粗放,线条爽利劲健,青花色深而艳,黑色斑点明显。第二种是青色淡雅,色调明快,青色中很少或不见结晶斑块的,如岁寒三友图花口盘(见彩插页图十二)中心用青料绘松、竹、梅岁寒三友,笔触劲健有力,构图疏而不空,借松、竹、梅凌寒傲立的姿态以写实的手法表达出一种高洁坚贞的人文精神,此件器物如不是出土于元大都遗址中,会误认为是明代中期的器物,可见,它对于全面认识元代青花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种是青色深浅相间,色深处出现结晶斑块,色浅处则不见,如花卉纹出戟觚(见彩插页图十三)就是如此。

除以上所述品种外,元大都遗址还出土有哥釉、黄釉、蓝釉等器物,但数量极少。

从以上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主要瓷器釉彩品种可以看出: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釉彩品种共有13种,即青釉、钧釉、白釉、白釉

黑彩、青白釉、青花、酱釉、黑釉、蓝釉、哥釉、卵白釉、黄釉和三彩;这些釉彩品种出土的数量是有明显差异的,从中可以看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13种釉彩品种中,以青釉、白釉黑彩、青白釉器物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白釉、钧釉、黑釉、酱釉,然后是青花、卵白釉、三彩、哥釉、蓝釉和黄釉。

在对元大都器物的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元代瓷器总体情况的了解,特别是对青花器物有了更新的认识。以前一提元青花就是蓝色浓艳、多结晶斑块,纹饰繁密,但从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我们知道了元青花还有清新淡雅的一类,蓝色浅淡,也没有或很少有结晶斑,纹饰疏朗。在器物的体量上,以前一提元代瓷器都是胎体厚重,器型硕大,但从元大都遗址出土器物来看,大型器物确实不少,但同样有胎薄体轻的小型器物,如青白釉水盂(见彩插页图十四)、青花岁寒三友图花口盘等。器物造型也更加丰富,出现了一些独具时代风格的作品。碗、盘、罐、碟、瓶等仍然是大量流行的器物,但是在同一种器物中又变化出不同的类型,如瓶就有双系瓶,四系瓶、梅瓶、鸡腿瓶等不同类型,大大丰富了器物的造型。高足杯是元代较为兴盛的一种器型,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釉、白釉、青白釉、青花器物中都有高足杯的存在。小口四系扁壶也是元代一种特殊的器型,小口,圆唇,圆肩,扁长方腹,平底,肩部两侧有两对对称的弧形系,腹部的纹饰以龙、凤、麒麟、孔雀等为常见,上文提到的白釉黑彩龙凤纹四系扁壶就是一例。此外如梨形壶、出戟觚也是元代较为典型的器物造型,这些在元大都遗址中都有出土。

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器物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元代瓷器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这些瓷器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工艺史、美术史、文化史的珍贵资料。

①《考古》1972年第1期第20页。

②《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第224页。

③《考古》1972年第1期第24页。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馆员)

明十三陵

神功圣德碑亭遗址调查

宋 磊

明十三陵,原制各有神功圣德碑亭。亭内树碑,用以彰显皇帝的功德。其中,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建于长陵总神道上,其余各陵神功圣德碑亭均建在近陵处。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及人为所致,现各陵碑亭完残状况不一。为此笔者对各陵碑亭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其进行初步分析。

一、现状

1. 长陵神功圣德碑亭,现保存较好,其形制为重檐歇山顶。亭身平面作正方形(图一),四面各辟券门。亭壁下部有石雕须弥座,再下承以陡板式台基,台基边长各为26.51米,四面各设礅礅台阶。亭内石条券

顶。亭顶外部形制每面各显三间,其中明间的上下两檐各施以单翘重昂平身科斗拱八攒;次间上檐各施三攒,下檐各施五攒。亭内树一石碑,螭首(六螭下垂式)龟趺,土衬石的上部浮雕海浪漩流。碑顶至亭内地面高8.1米。碑首正面刻有篆额“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身正面刻有明仁宗朱高炽撰文,翰林学士程南云书丹的神功圣德碑文;碑背刻有清高宗乾隆五十年御制诗“哀明陵三十韵”;碑的左侧刻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御制诗;碑的右侧刻清仁宗嘉庆九年御



长陵神功圣德碑亭



长陵神功圣德碑

制文。碑石完好,字口清晰无大损,只是碑身旧时所油朱漆已经脱落殆尽。

2. 献陵神功圣德碑亭,亭已不存,仅有台基、无字石碑及残坏的宇墙保存。其台基平面作正方形,每面边长为 10.1 米,高 0.6 米。台基之上,四面宇墙残高 1.7 米,厚 0.46 米,顶部盖石刻墙帽。宇墙之下及宇墙的内侧留有明朝碑亭四壁的角柱石,露出地面部分被凿平。台基四面各有垂带、踏跺式台阶,已倾斜残坏。台基上中部的石碑保存基本完好,其制螭首龟趺,高 5.2 米。碑上无字。土衬石上部雕漩涡水流,亦无大损。

3. 景陵神功圣德碑亭,现状略同献陵,但台上宇墙已不存。台基面宽、进深各为 10.03 米,陡板式。台基中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08 米,碑上无字,基本完好。

4. 裕陵神功圣德碑亭,状况同景陵。台基面宽、进深各 10.09 米,台基中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05 米,碑上无字。

5. 茂陵神功圣德碑亭,状况略同献陵。台基四面宽各为 10.07 米,台基四面有垂带,踏跺式台阶已残坏。在台基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2 米,碑上无字。

6. 泰陵神功圣德碑亭,状况同裕陵。台基四面边宽各为 10.13 米,台基上中部

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07 米,碑上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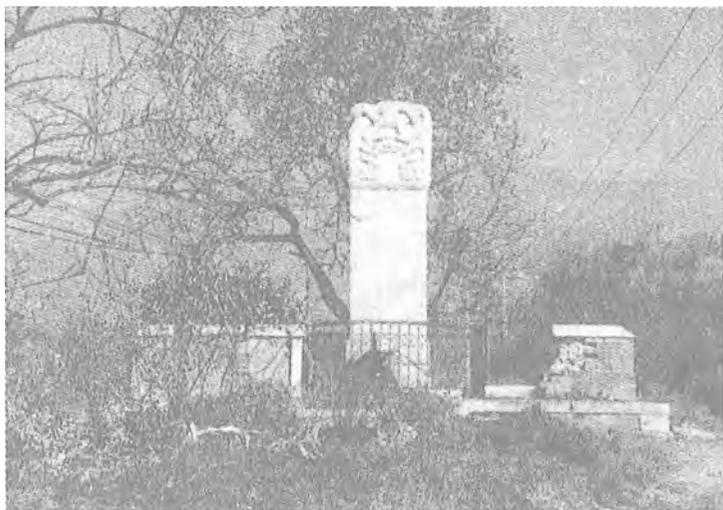
7. 康陵神功圣德碑亭,状况同泰陵。台基四面边宽各 10.72 米。台基上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5.95 米,碑上无字。

8. 永陵神功圣德碑亭,状况同康陵。但遗物所显原亭用料颇为讲究。陡板式的台基四框系石结构,四面边宽各 10.85 米,高 0.65 米,四面各有垂带、踏跺式台阶。台基上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53 米,碑上无字。碑趺下土衬石的上部除雕海水漩流外,4 角还分雕鱼、鳖、虾、蟹 4 种水生动物。

9. 昭陵神功圣德碑亭,原状同献陵。其中,台基高 0.78 米,四面边宽各 11.5 米。1987 年修缮昭陵时把台基四面踏跺式台阶归安修补齐整,乾隆五十年(1785 年)垒砌的宇墙全部被拆除,恢复为碑亭建制。其制重檐歇山式,四面各辟券门。上檐四面各显一间,施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四面各显三间,施单翘单昂五踩斗拱。亭内施井口天花。亭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39 米,碑上无字。

10. 定陵神功圣德碑亭,原状略同献陵,但因系博物馆及旅游景点,故自 1958 年后,其台基屡经缮治。现台基归安齐整,其高 0.72 米,面宽、进深各 11.35 米,四面各设垂带踏跺式台阶,四周宇墙砖砌,石顶,总高 1.32 米。台基上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5.86 米,石碑完好,无字。碑趺下土衬石的上部除雕海水漩流外,四角分雕鱼、鳖、虾、蟹四种水生动物。

11. 庆陵神功圣德碑亭,原状同献陵。其宇墙于近年修补整齐。其台基(图二)边宽 11.7 米,高 0.5 米,陡板部分用砖。四面各



献陵神功圣德碑

设垂带、踏跺式台阶。宇墙高 1.15 米,台基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6.055 米,无字。碑趺下土衬石的上部除雕海水漩流外,四角还分雕鱼、鳖、虾、蟹四种水生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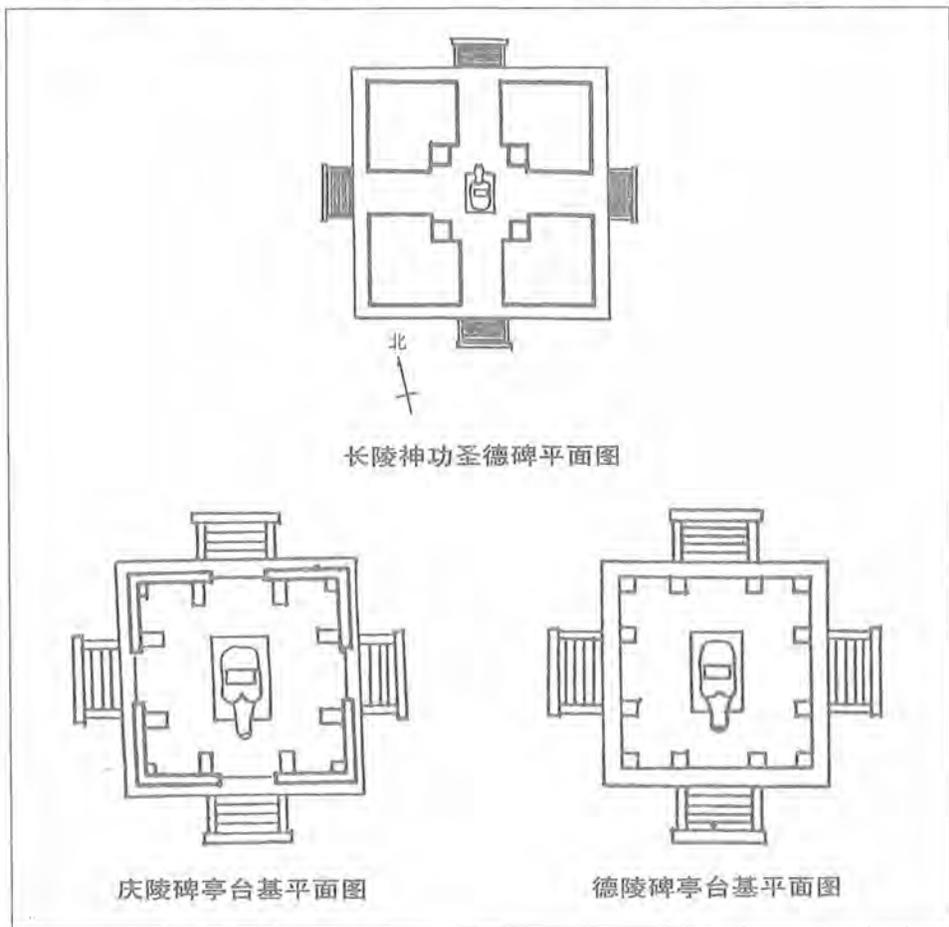
12. 德陵神功圣德碑亭,现状同献陵。其台基(图三)四面边宽各 11.72 米,陡板部分用石,高 0.95 米。四面的垂带、踏跺多已走闪。台基上中部树石碑一通,螭首龟趺,碑高 5.35 米,无字。碑趺下土衬石的上部除雕海水漩流外,四角还分雕鱼、鳖、虾、蟹四种水生动物。

13. 思陵碑亭,虽无神功圣德碑亭之名,但考其作用与各陵神功圣德碑亭无异,故本文仍将其列入神功圣德碑亭之内。现碑亭已不存。其台基上四面残存墙基,中树石碑一通。碑亭台基为陡板式,高 1.15

米,四面边宽各 9.95 米,台上残存碑亭墙基,残高 0.35 米,残墙所显,该亭仅前后有门。每面墙内均有柱窝 4 个,显三间。台基上中部石碑形制为螭首(四螭下垂式)方趺,碑高 4.99 米,碑首篆额“敕建”,碑阳刻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清光禄大夫、太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和殿大学士金之俊撰定的“皇清敕建明崇祯帝碑记”。碑趺前雕五龙,后雕五麒麟,左雕大狮负小狮及小狮滚绣球,右雕大狮负小狮及小狮哺乳图案。碑身左右及前后两面周边均雕云龙及宝珠纹饰。此碑除碑首稍残外,其余部分均保存较好。

二、几点分析

1. 各陵神功圣德碑亭原制推测



通过对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亭的遗址调查,我们发现除长陵碑亭外,其余各陵碑亭都已损毁,不复存在,现只留有台基和石碑。而长陵碑亭经过几次修缮与原制也有出入,所以对于神功圣德碑亭的原制我们只有借助文献资料和与之有关联的现存实物进行推论。

从文献上看,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和清人梁份的《帝陵图说》中都提到过神功圣德碑亭的形制,两书记载如下:

《昌平山水记》载:长陵神功圣德碑“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余,龙头龟趺,题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仁宗皇帝御制文也”^①。献陵“有碑亭一座,重檐四出陛,内有碑,龙头龟趺,无字”^②。景陵“碑亭门庑如献陵”^③。又,《帝陵图说》记载:长陵碑亭“黄瓦兽吻,重檐四出,门四辟,周栏槛刻花卉、禽虫,缺其南通出入,中树穹碑一,龙首龟趺,南面向午,大书九字,曰: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阳文仁宗御制者,宣德十年始建立。天寿十二陵,唯长陵碑亭有文字,诸陵则无之”^④。献陵碑亭“石柱琉璃黄铜瓦,兽吻飞甍,重檐四出,门四辟,周栏槛坐癸向丁,中树穹碑,龙首龟趺,制皆如长陵,惟碑无文字”^⑤。景陵碑亭“规制皆如献陵”^⑥。裕陵碑亭“制皆如景陵”^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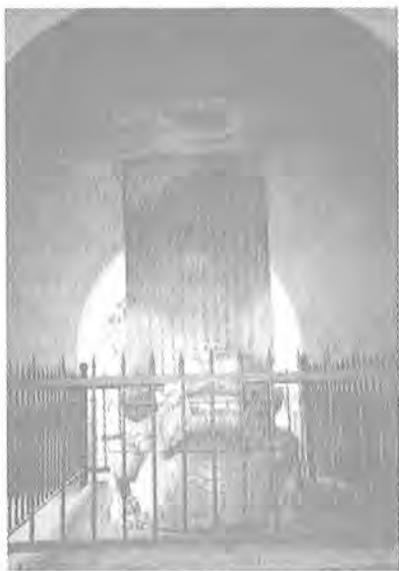
另外,从乾隆年间的奏折中也反映出原十三陵神功圣德碑亭的变化情况。乾隆五十年三月工部尚书金简、户部侍郎曹文埴、

礼部尚书德保先后赶赴昌平,率同户、工二部暨内务府司员逐一详加查勘后提出,长陵神功圣德碑亭“俱已坍塌不堪,仅有墙基,大木业已糟烂,难以修整,拟将所存墙框拆去,周围安砌石栏”^⑧。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十一陵“宫门前俱设有碑亭,而石碑俱未镌字,且头亭(停)、墙基俱已坍塌,似可毋庸再为修理,竟将墙垣拆去,扫除洁净,仅留石碑于观瞻亦觉合式”^⑨。其后,钦派督办修理明陵工程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及工部尚书金简、户部尚书曹文埴、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左侍郎德成再经勘查,于同年七月又上奏提出具体意见,“大碑楼一座,头停大木俱已糟烂坍塌落地,亦拟改发石券成造”^⑩。

经实地调查,当时的修缮大多是按计划进行的,不过也有在修葺过程中改变计划的。如长陵神功圣德碑亭,第一次提出的修缮计划是“拟将所存墙框拆去,周围砌石栏”。而第二次却提出“亦拟改发石券成造”。修缮结果是按第二次的意见进行的,碑亭改成了内发石条券顶的结构。它采用了在亭壁内侧另构券壁起券的方式。碑亭的石券顶之上,分别以砖垒成实心的亭顶,周围嵌以木构的斗拱,上覆以琉璃瓦件,外



长陵陵内龙趺碑亭



长陵陵内龙趺碑

观与原碑亭相似。现碑亭的状况基本反映了乾隆修缮后的面貌。

又,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十一陵的碑亭,第一次查勘提出“竟将墙垣拆去,扫除洁净,仅留石碑”,而实际修缮时不仅拆去了墙垣,保留了石碑,而且还于碑外四隅补修了齐胸高的宇墙,现在献、茂、庆等陵处看到残坏的宇墙即应是乾隆修葺后的遗物。

另外,从现存实物看,在长陵被恩门的左前方有一龙趺碑亭。其制,重檐歇山顶,正脊顶部距地面高 14.42 米,亭身、台基平面均作正方形。台基四面边宽各为 10.48 米,四面各设垂带式踏跺。亭壁四面各辟券门,涂红。亭顶,上檐四面各显一间,施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四面各显三间(明间面阔同上檐),施重昂五踩斗拱;内为木构架结构,井口天花。亭内树碑,碑趺为龙形。此碑亭建于嘉靖年间,根据《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公元 1536 年),世宗皇帝曾下令修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并建此龙趺碑亭及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神功圣德碑亭及碑。依建造时间判断,六陵神功圣德碑亭当与此碑亭形制相同。清乾隆五十年间修葺十三陵时,对此碑亭也进行了修缮,并在碑的正面,以满汉两种文字镌刻了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保护明陵的谕旨。背面新刻了乾隆五十年高宗御制诗《谒明陵八韵》。此后,在碑的左侧又添刻了嘉庆九年(公元 1804 年)仁宗的御制诗《谒明陵八韵》。但从形制看,其修缮时并未改变碑亭原制。

据此我们可以推定,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十一陵的神功圣德碑亭其原制,当与长陵龙趺碑亭应相一致。形制为重檐歇山顶,亭身、台基平面均作正方形,四面各设垂带式踏跺,亭壁四面各辟券门,涂红。亭顶上檐四面各显一间,施单翘重昂七踩斗拱;下檐四面各显三间(明间面阔同上檐),施重昂五踩斗拱;内为木构架结构,井口天花。亭内树碑,螭首龟趺,

无字。1987 年修复昭陵神功圣德碑亭时即基本符合此制(唯下檐斗拱作单翘单昂式,略有不同)。

长陵神功圣德碑亭原制则外观当如现状,但其内侧应为木构架结构,井口天花。

思陵陵前的碑亭,据文献所记,原制亦应为重檐式建筑,且乾隆修葺时基本保持了原制。这从遗址所存碑亭墙壁内的柱窝可以得到证实。

2. 无字神功圣德碑形成原因探析

明朝的帝王陵墓制度,陵宫之前的神道上均建有神功圣德碑亭,亭内树碑,用以颂扬墓主的丰功伟绩。但实际上,明朝时为皇帝们所树的神功圣德碑,只有南京的孝陵和十三陵的首陵——长陵的碑上刻有文字,其余的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十一陵均有碑无字。这是什么原因呢?

关于这个问题,明清时即有人提出过,明范景文著《范文忠公文集》中有诗云:“片石峰头古并垂,无端玉简使人疑。何书不被山陵怒,深宦谁知无字碑。”清乾隆皇帝在《哀明陵三十韵》中写道:“长陵一碑功德记,余皆有碑而无字。泰山以后唐乾陵,此典何出竟为例?”注又云:明诸陵,惟长陵有圣德神功碑文,余俱有碑无字,检查诸书,惟徐乾学《读礼通考》载,唐乾陵有大碑,无一字,不知何谓?而明诸陵效之,竟以为例,实不可解也。^①清康熙年间梁份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他在对十三陵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了《帝陵图说》一书,该书在叙述献陵陵寝制度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献陵碑亭……中树穹碑龙首龟趺,制皆如长陵,惟碑无文字,盖有待于嗣皇帝之为之也。先是太祖高皇帝曰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于是孝陵之碑文出于成祖,长陵之碑文出于仁宗,碑亭文字必继体之圣藻,非儒臣所敢摘文也,自是而后十陵碑亭,但树空碑职是故也。”梁份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惜的是他把前提弄错了。他误以为各陵的神功圣德碑都是建造陵园

时一体构筑的,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明实录》记载,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神功圣德碑均建成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与这一工程同时完工的还有长陵陵宫内的龙趺碑亭及碑和天寿山东西二井、万贵妃坟的石碣。^⑫而永陵的神功圣德碑亭及碑则创建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距永陵建成也有二十年之久。定陵的神功圣德碑亭及碑,以理度之,亦应在神宗去世之后。因为,定陵系神宗生前所建“寿宫”,早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89年)即已建成。但皇帝对子孙后世也要表现出谦逊的态度,是不可能活着时就为自己立功德碑的。神功圣德碑与陵宫建筑一并营建的只有昭、庆、德三陵。因为这三陵营建时,明代陵制已确定每陵均有神功圣德碑的制度,且三陵又均是墓主去世后,由嗣帝组织建造的。梁份的分析既然是前提不准确,自然有难圆其说之处,所以,碑石无字的原因他并没有做出清楚透彻的解释。

近年,一些研究者对此问题曾进行过探讨,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不同认识:

(1)认为皇帝功德太大了,无法用文字来描述,故立无字之碑。

(2)皇帝的功过由后人评说,故碑石不镌文字。

(3)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神功圣德碑系嘉靖皇帝时所建,因嘉靖皇帝信奉道教,道教推崇“无为”,以“无”为本,故立无字之碑。

以上之说,第一说系取自民间传说,并无史料依据。第二说,是根据唐乾陵武则天无字碑的说法推演而来的。专家们对乾陵武则天无字碑有这样的推测: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作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意在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但这亦不是据。第三说亦难成立,因为嘉靖皇帝的父陵——湖北显陵的陵前有“睿功圣德碑”,其作用相当于其他各陵的神功圣德碑,碑上刻有文字,且为嘉靖皇帝的御制文。这说明嘉靖皇帝并非认为碑石无字比有字好。

那么,各陵神功圣德碑不刻文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各陵创建神功圣德碑原本是为刻文字的,否则“彰显功德”的目的就难以实现。所以,孝陵的神功圣德碑刻有成祖的御制文;长陵神功圣德碑刻有仁宗皇帝的御制文;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神功圣德碑建好后,大学士严嵩特上奏,伏请世宗皇帝“亲御宸翰”^⑬撰文,又提出妃子坟石碣由翰林院撰文。显然,严嵩这样做是符合当时礼制的。因为,在朱元璋亲撰的《皇陵碑》上就有“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子孙后世戒”的警句。这样,已故皇帝的碑文依礼只能由嗣皇帝撰写,翰林院官虽多文士,亦不能代笔。如此,则六陵碑文非嘉靖皇帝撰写不可。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嘉靖皇帝要写出六篇像样的碑文是有困难的。这倒不是因为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懒于动笔,也不是他贪图玩乐没有时间,更不是他文彩不及无力撰写,而是由于下述原因使他欲写不能,最后只得搁笔不写,使神功圣德碑成为了无字碑。

原因之一,嘉靖皇帝生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准确地说,他只对武宗朱厚照的情况了解较详细,对其前五帝的情况只有一般的了解;这一情况对他撰文是很不利的。因为时隔太远,第一手资料和真实感触的缺乏,使他纵使勉强写出,六陵碑文也易成雷同和过于形式化之作。嘉靖皇帝生性高傲,岂愿留下俗笔为后世所讥?

原因之二,前述的六陵墓主,除仁、宣二宗可称守成令主,孝宗朝事亦略有振作外,其余之帝的所作所为和政绩均不甚佳。故实在让人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丰功伟绩”。以英宗为例,他九岁登极作皇帝,由于无知无能,司礼监太监王振倚仗皇帝的宠信,横行霸道,肆无忌惮。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蒙古的瓦剌部大举南犯,英宗皇帝在王振的怂恿下,率京营五十余万人御驾亲征。由于明军缺乏周密的计划,迂回奔走,徒劳往返,结果在距怀来城20里的土木堡,被瓦剌军包围,最后明军全

部被歼,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极不光彩的“土木之变”。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经“夺门之变”后朱祁镇又重登皇帝宝座,改元天顺。统治期间,政治腐败,废景泰帝为郕王,迁居西内;杀害抗击瓦剌有功的大臣于谦;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先后爆发叶宗留、邓茂七等农民起义;宠信宦官,前用王振,后用曹吉祥。由此可知,英宗是一个昏庸十足的皇帝。

再如,宪宗朱见深即位时,国势日衰,内外交困。政治上日趋混乱和黑暗,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农民的反抗斗争屡屡发生。同时,边防也被削弱,北方的强敌蒙古贵族不断进袭明朝北疆,加剧了明朝的危机。宪宗虽然做了一些顺应民意的事,如恢复景泰帝帝号,为于谦等景泰旧臣平反昭雪,但后来他失政之处颇多,有损于明朝的长治久安。比如,“传俸官”的出现助长了官场上营私舞弊和卖官鬻爵现象的蔓延。各地官吏贪贿成风,横征暴敛,大量民田被侵占,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由于宪宗厌倦政事,宦官汪直乘虚而入,大搞特务政治,创办的“西厂”与东厂、锦衣卫交互为恶,监视百官,肆虐百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而宪宗则专事享乐,与方伎、僧道厮混在一起,不惜抛赠大量金钱,颁赏并修建寺庙。由此可见,宪宗亦是一个庸劣之君。

又如,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皇帝位,从小养成贪图玩乐的坏习惯。孝宗临终曾叫顾命大臣“教之读书,辅导成德”,但武宗却荒淫不理朝政。大臣谏劝,他不采纳;宠信佞倖,专事游乐;大肆建立皇庄,收罗库藏;滥用民力、财富在西华门外太液池附近别构院落,建起豹房、宫室、寺观,整日花天酒地,与美女歌舞淫乐。并召教坊司乐工入室唱戏,后因乐工承应不及,又到河间诸府挑选精于技艺的乐户,于是优伶进京日以百计,而群小趋前求幸者更不可胜数。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十一岁的武

宗皇帝崩于豹房,他是明代最昏庸荒淫的皇帝之一。其朝政腐败,宦官擅权,厂卫横行,生民涂炭为历史所罕见。

纵观以上皇帝的政绩,嘉靖皇帝要为他们写出像样的碑文,并非容易之事!特别是英宗皇帝被俘,是为帝者一大耻辱,纵以赞美之辞加以掩盖,其效果肯定不如人意。所以,六陵碑虽已立好却不刻文字,从而形成了无字碑。不过它也增加了陵园的壮观气势,且更突出了孝、长二陵的“祖陵”地位。由于嘉靖时帝陵出现了无字碑,致使后来的永、昭、定、庆、德五陵之碑,嗣帝们虽有撰文的条件,可为父皇彰显“功德”,但鉴于前因,也只好立碑而不撰文了。

①(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第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第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第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④(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之二,第15页,十三陵特区藏。

⑤(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之二,第23页,十三陵特区藏。

⑥(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之二,第27页,十三陵特区藏。

⑦(清)梁份《帝陵图说》卷之二,第32页,十三陵特区藏。

⑧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臣金、臣曹、臣德,谨奏为敬陈查勘诸明陵情形仰祈圣鉴事》。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谨奏为估修诸明陵殿座工程请领银两事》。

⑪根据十三陵特区藏“长陵神功圣德碑”碑文拓片。

⑫⑬(明)徐阶等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61,第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作者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文物科助理馆员 摄影:于长宝)

永定地区的

古塔

齐鸿浩

永定地区在古代是一个佛教文化盛行的地区,寺庙众多,但因历史及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现存寺庙寥若晨星,塔作为寺庙建筑中的一部分,也仅存数座,现分列如下:

(一)

法均塔

位于戒台寺戒坛院的山门外,为一座八角七级密檐式实心塔(图一),须弥座上饰有



图一

三层仰莲瓣。上承塔身,第一层塔身四个正面为砖雕格子门,其余四面为砖雕琐文窗,塔檐为叠涩结构出檐,下为砖雕斗拱、飞椽,从第二层往上逐渐收缩,塔刹为仰莲瓣托宝珠。为辽戒台寺僧人法均墓塔。该塔曾经于明正统年间进行维修。另一座为法均衣钵塔(图二),也称松抱塔。其结构也为八角



图二

五级密檐砖塔,八角须弥座上饰有三层仰莲瓣,上承塔身。第一层塔身上饰砖雕门窗,转角处各饰一砖雕八角五级塔,塔檐为叠涩砖结构出檐,下为砖雕斗拱,飞檐,从第二层往上逐渐收缩,塔刹也为仰莲瓣托宝珠。法均,辽南京玉河县人,16岁在紫荆寺出家,依非辱律师受戒,后到戒台寺,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在戒台寺肇建戒坛。辽大康元年(1075年)三月四日示寂。建塔葬其骨灰。



图三

知幻塔

位于戒台寺南塔院,为密檐式八角九级砖结构实心塔(图三),塔为须弥座基,塔基上施三层莲瓣,下为砖雕斗拱及花卉图案。第一层塔身四个正面用砖雕砌成格子门,四个侧面为琐文窗。塔檐为叠涩砖出檐,转角处有砖角柱,以上各层逐渐收缩,各层均用砖仿木结构建造,砌出柱、额、斗拱。塔刹为莲花盘托宝珠。此塔是为埋葬知幻和尚于明景泰年间建的墓塔。据《新续高僧传》记述:知幻和尚俗姓刘,名道孚,又称鹅头禅师,是一位在佛教徒中颇有威望的僧人。他主持了明代从宣德到正统年间戒台寺重建工程,由于成绩卓著,正统初年被明英宗召进宫廷,授予“僧录司左讲经”的官职。戒台寺工程完成后,知幻和尚被推为明代戒台寺第一代传戒坛主,主持了许多年的寺院宗教活动,圆寂于明景泰七年。

马鞍山护国宝塔

位于戒台寺西极乐峰下的太古化阳洞洞口处,为八角十一级仿木结构实心密檐石塔(图四),通高6米。塔基为仰莲须弥座式,下枋莲瓣上雕刻花卉,束腰上刻动物图案,有狮、龙、飞羊、象等,上枋莲瓣上雕刻有弥勒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菩萨等造像28尊。基座上为两层仰莲瓣承托塔身,第一层莲瓣上刻2尊供养人像,第二层莲瓣



图四

上,每瓣上各刻一尊造像,共计24尊。第一层塔身交错雕刻四门、四窗,门五抹,窗四抹,塔身下部雕刻造像24尊,有如来、药师佛、大肚弥勒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正南面为三世佛及阿难、迦叶二弟子。四个棂窗上下各刻一尊佛像,共计8尊,窗上为如来佛、药师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窗下为如来佛及药师佛。四个正面门上各刻一尊佛像,共计4尊,为如来、药师、文殊、普贤。塔身转角侧柱上自上而下刻双手合十小千佛8尊,8根侧柱共计64尊,塔身最上层雕刻8条云龙。全塔总计雕刻佛像152尊,供养人像2尊。檐下雕斗拱,檐部刻勾头滴水、角瓦等,完全与木构建筑相同。从第二层起,逐渐收缩,塔刹已残失。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极乐峰在马鞍山之西,太古洞即化阳洞,亦名庞涓洞,洞门刻太古化阳洞五守,洞左石塔十一层,塔碑略云‘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东直门外牛房主禅明辉。徒普照,信官郝春建马鞍山护国宝塔’”。该塔整体造型优美,比例谐调,雕刻精良,是北京地区明代同类石塔中的杰出作品。

万佛堂村密檐塔

位于永定镇万佛堂新村北山坡上,原为五级六角形仿木结构密檐砖塔(图五),现仅存四层,高约9米。塔基为青石雕凿垒砌而



图五

成,上为砖雕垒砌须弥座,座上为砖雕仰莲瓣三层,上承塔身,第一层塔身正面有壶门,其余五面为棂窗,转角处砌圆形立柱,檐下施五踩斗拱,斗拱为两跳。从第二层起逐渐收分,斗拱变为一跳,塔檐皆内弧,斗拱下均饰云纹,整个塔形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为明代创建。

桃花庵开山祖塔

位于永定镇黑港村西北,为五级六角形仿木结构实心密檐砖塔(图六),高约10米。塔基为双层须弥座,上枋嵌砖雕花卉图案,有菊花、百合等,下枋嵌砖雕动物图案,有六



图六

牙白象、羊、牛、虎等,上为斗拱承托的平台,四周雕刻“卍”字花纹,再上为三层仰莲瓣承托塔身,一层塔身正面开龛门,上嵌“开山祖塔”四字楷书石匾额,其余五面皆为砖雕菱花斜方格隔扇窗纹饰多样,富于变化。塔身上部饰云纹。从第二层起逐渐收分,五层叠檐均以斗拱承托。密檐下部为四层叠涩,檐头的瓦垄勾头滴水灵活精巧。塔刹为莲花瓣承托宝珠,整座塔造型简洁明快,秀丽挺拔,明代建造。

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

南塔院共有12座喇嘛式塔(图七),其中一座保存较好,其余残损严重。保存较好的这座喇嘛塔高约8米,方形塔基,塔基外包砖已剥脱,塔基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脖为

十字形,塔刹为十三天相轮上托莲瓣式圆盘承托宝珠。其余喇嘛塔刹均已残。



图七

官山喇嘛塔

位于永定镇石厂村北,砖石结构,方形塔基上为莲花瓣承托,三层圆盘式须弥座,须弥座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脖粗短,相轮也粗短,塔刹已佚。该塔高约5米(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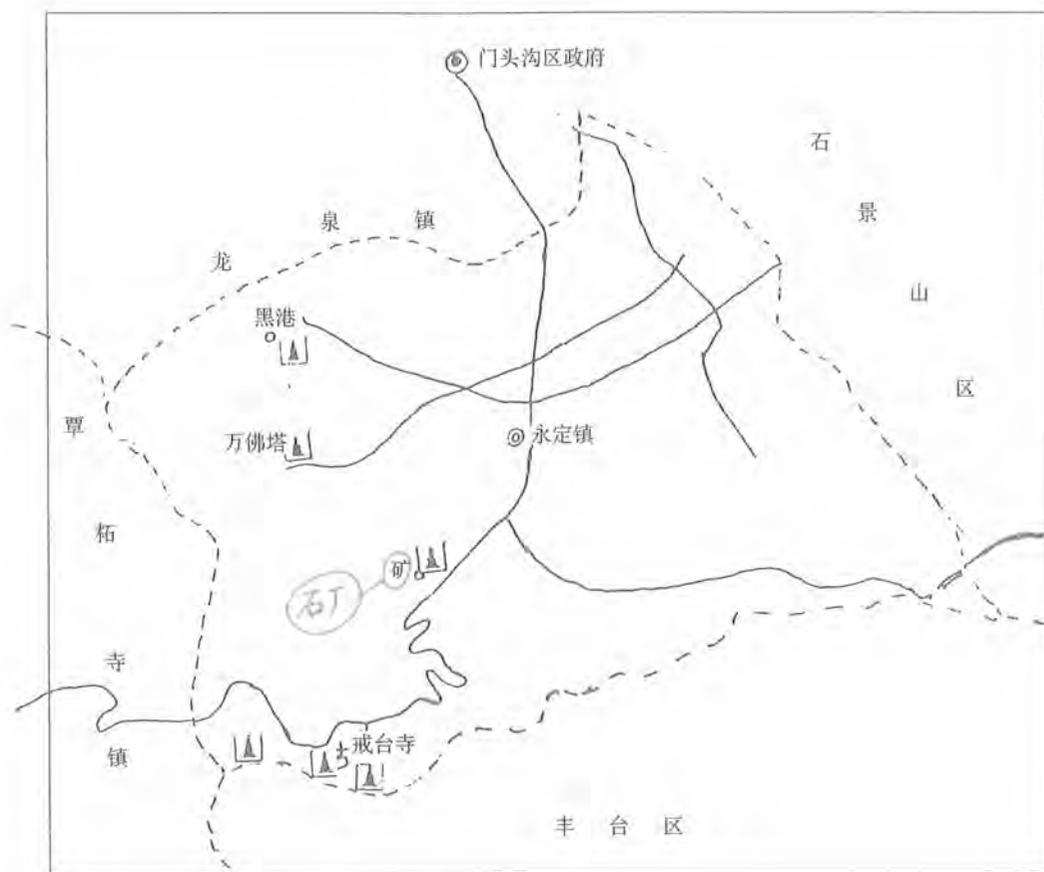
(二)

塔的分类与分期

塔是一种高耸型的点式建筑,原为佛教的主要建筑之一,用来供奉或收藏僧人遗骨



图八



永定地区古塔分布示意图

等。佛塔起源于印度,古印度文称做“窣堵婆”,又称“浮屠”、“佛图”,约于公元1世纪传入我国。塔的平面形状有圆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层数为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不等,多为奇数。按建筑材料可分为木塔、砖塔、石塔、铁塔、铜塔、琉璃塔、陶塔等。类型有楼阁式、密檐式、花式、亭阁式、金刚宝座式、过街式等。中国古塔除作为佛教建筑埋葬佛舍利、藏经、供奉佛像之外,还可以供人登临眺览、导航引渡、装点江山、美化风景等功能。因此,中国古塔可称作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块瑰宝。

永定地区的古塔从类型上可分为密檐式塔和喇嘛塔两种。密檐式塔,因其第一层特高,以上各层骤然变低矮,高度和面阔均逐渐缩小,愈往上收缩愈急,各层檐紧密相连,故称密檐塔。初期的密檐塔比较简单,用叠涩砖结构出檐,均为短檐,外部造型为一炮弹形的十二角尖锥体,这是受到从天竺传来的那种圆形尖锥体精舍、塔龕等形式的影响。唐代现存的实物都是方形塔,这是受到与此同时并行的方形楼阁式塔的影响。从辽代开始密檐塔有四个大的变化:其一是成为实心塔;其二是塔的下部普遍增加了高大而又雕饰丰富的须弥座,第一层塔身增加了佛龕、佛像、飞天、菩萨及承托塔身的仰莲等装饰;其三塔平面也变化为六角形、八角形等;其四是第一层塔身以上的塔檐增加了斗拱、飞椽、瓦垄等仿木构建筑部分。一直到元、明时期,北方地区还在建筑这种仿木构建筑的密檐塔,属于这种塔的有法均塔、法均衣钵塔、知幻塔、护国宝塔、开山祖塔、万佛堂塔。喇嘛式塔,又称覆钵式塔,藏式塔,这种塔的造型特点是:在高大的基座上,建覆钵形的塔身,其上安装塔刹。自元代以后,喇嘛教建塔常采用这种形式,所以称为喇嘛塔。这种塔型接近印度窣堵波造型。喇嘛式塔最早的实例为元代建造的北京妙应寺舍利

塔,永定地区最高大的喇嘛塔是王村月岩寺南的皇姑塔,二十几米高,1958年被拆毁,塔中拆出成千上万香泥小塔。喇嘛塔明清逐渐增多,大多数都是墓塔。元代都是两层须弥座,明代仍为两层,但比例增高,清代多数仅用一层须弥座。元、明比例肥短,清代则较瘦高。塔身与基座之间元代多施莲瓣一层,其上为小线道数层,线道内或夹以莲珠,明代仍沿此制,清初则改为金刚圈三层,不用莲瓣。塔脖元、明较粗壮,清代则细。十三天是相轮的变体,一般为十三层,元、明比例肥短,清代则细若铎柄。其上为圆盘,元、明铜盘垂流苏,清代更为两层天地盘。最上为宝珠或小铜塔。清代多用日、月、火焰。属于这种塔的有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官山喇嘛塔。

永定地区现存古塔的用途大致可分为三种:墓塔、衣钵塔、镇塔。墓塔是埋葬僧人的塔,有法均塔、知幻塔、开山祖塔、万佛堂塔、官山塔、戒台寺南塔院喇嘛塔林、衣钵塔是用来埋葬僧人衣钵的塔,有法均衣钵塔;镇塔又可称为万佛塔,因其建造位置一般在较为险要之地,塔身雕刻佛像,用以镇邪,保佑一方平安,极乐峰护国宝塔就属于这类。

①六牙白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大自然中并未有什么六牙白象,佛教中的六牙白象原为菩萨所化,以表威灵。《普曜经》说:“菩萨便从兜率天上垂降威灵,化作白象,口有六牙。”普贤所乘六牙白象,是表其大慈力也。《普贤观经》曰:“六牙表六度(六种到彼岸方法,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智慧,四足表四如意(四种禅定)。”《此观》卷二:“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萨无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负;无漏无染,称之为白。”

②永定地区:指永定镇辖区,东与石景山区接壤,南与丰台区交界,西与门头沟区潭柘寺镇为邻,北与门头沟区龙泉镇相连,北距区政府驻地4.2公里。

(作者为门头沟博物馆馆长)

战 国 燕 币 综 述

冯胜君

战国时期,燕国货币的品类包括刀币、布币以及圆钱三种,其中以刀币最为常见,数量也最多,圆钱次之,布币的数量最少。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三种不同品类的燕币作一概括性说明。

一、刀币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燕刀币应包括尖首刀与明刀两种。尖首刀是燕国的早期铸币,明刀是由尖首刀发展演变而成的。但由于尖首刀的年代多定为春秋时期,已溢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且在尖首刀的国别问题上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故本文将不讨论尖首刀的问题。

燕明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主要的货币品类。它流通使用的时间最长,从春秋战国之际一直到秦统一;发行量最大,单从出土来看,据不完全统计,有重量、数量可察者,已达 3800 余市斤零 58000 余枚,^①其数量之巨,居列国货币之冠;流通的地域最广,从出土地来看,以燕下都为中心,南到河北、河南,北和东北到内蒙、吉林、辽宁,东到天津、西到山西、陕西,都有燕明刀出土,甚至在朝鲜、日本等国的一些地区也曾发现过燕明刀。下面,我们将讨论有关燕明刀的几个问题。

(一)燕明刀的分式研究

燕明刀可根据其形制及面文的写法大致分为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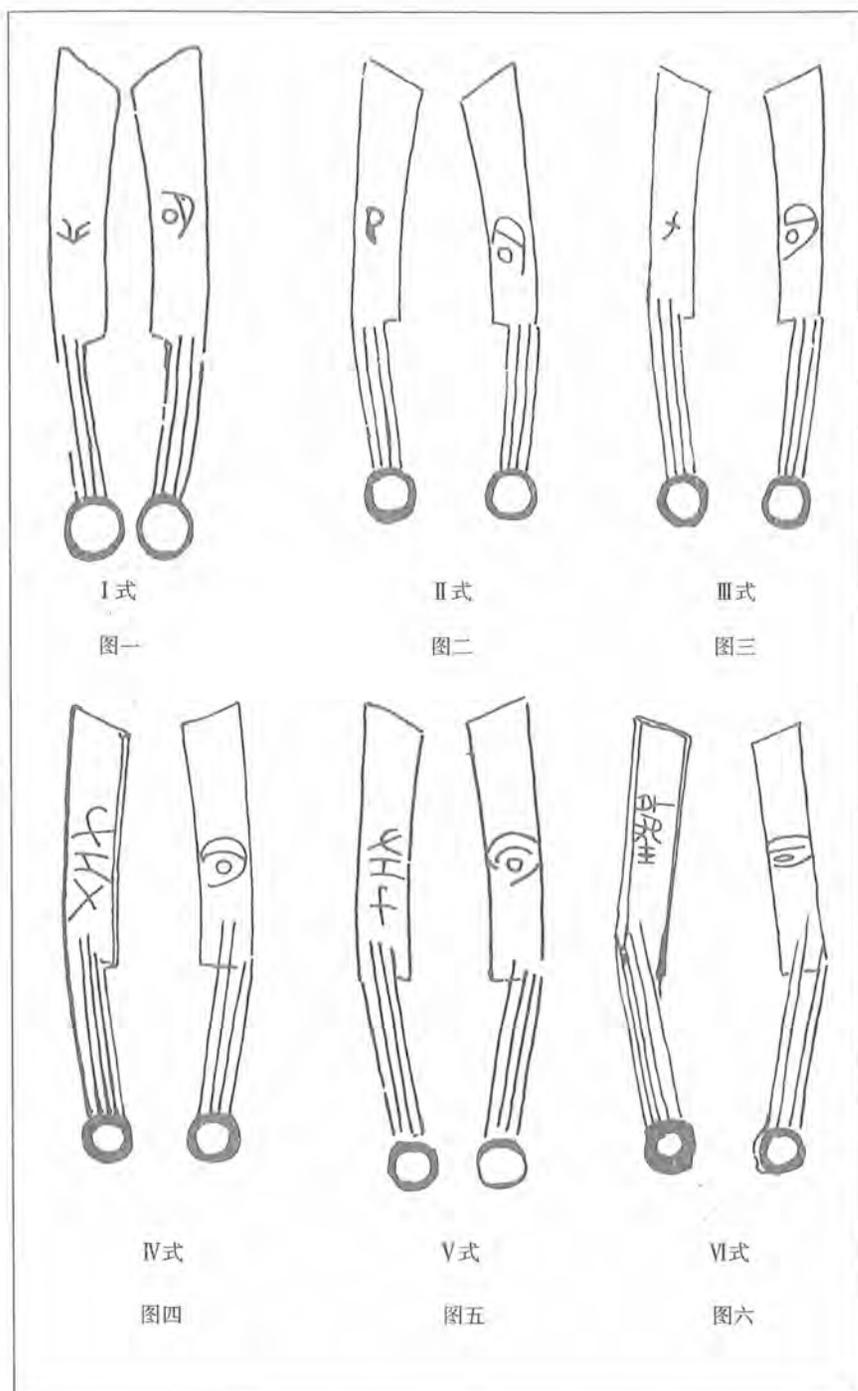
I 式:弧背较直,刃部弧度较小,刀首略短,多呈斜坡状,刀尖较钝,刀首郭线交角呈圆角状,刀柄较宽,刀柄上的两条凸纹极个别的延伸到刀身的极少一部分,面文“明”字多写作形。(图一)

II 式:形制同 I 式大体相同,唯刀首郭线与刀刃郭线交角呈钝角三角形,面文“明”字多写作形。(图二)

III 式:形制与 II 式相近,唯刀柄两面的两条凸纹及刀柄的内郭线大都延伸至刀面的一部分,面文“明”字多写作形。(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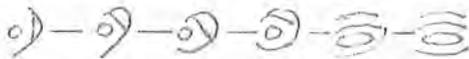
IV 式:刀柄正面的内郭线和刀柄面上的左凸线伸入刀身较多,刀柄面上的右凸线纹断在刀身外郭线与刀柄外郭线相交处。面交“明”字多写作形。(图四)

V 式:刀身较直,刀身与刀柄相交处略呈磐折,刀首坡度较小或近于平首,刃部略有弧度或变成直刃状。刀柄正面的右凸线纹断在刀身外郭线与刀柄外郭线相交处,亦有伸入刀身者;左凸线纹与刀柄内郭线则都伸入刀身,有的伸至刀身近三分之一处,刀柄背面的两条凸线纹与刀柄内郭线则都伸入刀身。面文“明”字写法较草率,作形。(图五)



Ⅵ式:刀身与刀柄相交呈磬折形,刀首坡度较Ⅴ式更小,多数刀呈平首状,刀身刃、背两面均甚平直,刀身宽窄相同,刀柄两面凸纹及刀柄内郭线伸入刀身较多,面文“明”字甚草率,多写作形。(图六)

通过以上我们对燕明刀的分式研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燕明刀的形制由圆折逐渐发展到磬折的演变轨迹,相应地,其面文“明”字则经历了如下所示的演变过程:



Ⅰ式燕明刀的时代最早,约在春秋末年或春秋之际,Ⅱ、Ⅲ式燕明刀的时代约在战国早期,Ⅳ、Ⅴ式燕明刀的时代约为战国中期,Ⅵ式燕明刀的时代最晚,约为战国晚期。

(二)关于燕刀币面文“明”字的讨论

燕刀币面文“明”字早期较标准的形体多写作形,关于此字的释读,自有清以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1. 释明。清人初尚龄在所著《吉金所见录》中说:“今此刀明明籀文‘明’字。”历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均遵从此说。

2. 释莒。清人朱枫首倡此说,其所著《古金待问续录》云:“太公铸九府钱法,其小者为莒刀。此钱面文一字,疑即‘莒’字。”毕沅、阮元等人赞同此说。

3. 释泉。清人冯启榛主此说,谓“莒刀面文,刀‘泉’字,像水之汇也。”其说见清李佐贤《续泉说》。

4. 释同。清人戴熙《古泉丛话》三卷末云:“余颇疑面文是‘同’字,或曰‘刀字一规’,又曰‘易’字,皆未可定。”

5. 释召。近人丁福保《古钱学纲要》云:“惟近人以刀面之或读作‘明’字,此乃大谬不然。因非月字,乃刀字;○非日字,乃口字也。刀口二字,合之则为召。”

6. 释易。罗伯昭、郑家相等人主此说。罗伯昭谓“《说文》易下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此字当为易字,易是易州地名,这种刀多从那里出土。”后郑家相著文支持

罗说。^②

7. 释匿。此说由陈梦家首先提出,他在《西周铜器断代(二)》的《战国燕刀货》一节中说:“我们可以肯定所谓‘明刀’实即燕国的刀货;而所谓‘明’字可能是‘匿’字的简写。”^③后杨宽、^④朱活、^⑤石永土、王素芳^⑥等人均赞同此说。

8. 释邑。郭若愚主此说。^⑦

9. 释库。郑刚主此说,谓“著名的燕币(刀)正面有单字作、、而以为主,也就是标明货币性质的库字,以句为声,以圈象所藏之物。”^⑧

上列诸说,以释“明”说影响最大,然刀币面文“明”字究为何意,诸多学者又是争论不休:

清人初尚龄认为“明”是指燕国“平明邑”;

马昂在《货币文字考》中认为“明”即赵之“明邑”;

关百益在《〈义州盟刀谱〉序》中说:“审其面文,均为‘明’字。案,明古盟字也。……古文简略,省器存义,故单书明字以作盟。”并谓“此物为古代盟会之用”。

夏涿、杨逢彬则认为与并非一字,前者为光明的“明”,后者为“冥、瞑”的表意字,云气障日或障目表意,并谓“一明一暗出现在币文上说明它并非用本义,而为鑄(串钱)的通假字。”^⑨

黄锡全则另辟蹊径,认为“‘明’也存在两种读音。一是会意字,表示日月之光明。二是形声字,从 (眼)月声(声中可能有意,代表偃月眉),读为‘眼。’并由月、眼、匿读音相近,得出了“(眼)可读如燕国之匿(燕)”的结论。^⑩

其实,刀币面文即明字,本是一个无须置辩的问题,虽然我们迄今仍未弄清“明”字在用作币文时的具体含义,但这并不是影响我们释读的正确性。本文之所以不惜笔墨,罗列众说,一方面是因为本文的体例就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份较为完备的燕文字资料,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例子促使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

个一看即识的古文字的释读会在学术界引起这么大的争论？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唐石父、高桂云在《燕国明刀面文释“明”之新证》^①一文中，有四字评语：“强作解人”，我们认为用这四个字来评价一些学者的治学态度是恰如其份的。古人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 齐明刀的国别问题

齐明刀，旧多称之为博山刀，因其在清嘉庆年间最早发现于山东博山香峪村而得名。

关于齐明刀的国别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王献唐等人主张的燕币说，认为“至博山刀……必齐地所铸。疑燕破齐数年所为，燕人铸币于齐，仍用本国明刀旧制，刀署明字，皆为方折。”^②朱活、^③郑家相、^④周卫荣^⑤等人支持此说。另一种意见认为齐明刀是齐国货币，石永士、王素芳等人主此说，并指出“根据乙型ㄅ字刀化（按即齐明刀）的形制及出土地点来看，它应是齐国仿甲型ㄅ字刀化而铸行的齐国货币。”^⑥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即齐明刀是齐币而非燕币，原因如下：

首先，齐明刀面文绝大多数写作ㄅ，只有一例写作ㄅ（《货系》3788号），与燕明刀面文“明”字写法不类，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齐明刀背文内容多为“莒冶口”“莒冶齐刀”“齐刀”，只有一例背文作“平阳冶宋”^⑦（《货系》3797号）。而据史书所载，燕将乐毅率兵攻齐，“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莒、即墨未服。”（《史记·乐毅列传》），则莒始终未曾落入燕军手中，那么莒地所铸之币又怎么会是燕币呢？至于上引背文作“平阳冶宋”的齐明刀，我们且不论燕人是否占领过平阳，单从币文“平”字写作ㄅ而与燕系文字“平”作𠄎形迥异这一点来看，也不能将其目为燕币。

其次，建国以来，曾在山东省境内发现过两次齐明刀的币范。一次发现于即墨故城内，^⑧一次发现于莒县。^⑨结合齐明刀的

背文，我们推测齐明刀很可能主要由莒和即墨两地铸造。而据上引《史记》文这恰恰是燕军久攻未下的两座城池，这恐怕不能视为巧合吧。

附带谈一下齐明刀的铸行年代问题。在上引石永士、王素芳文中，将齐明刀的铸行年代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我们认为失之过早。从目前发现的齐明刀实物来看，其制作大多很粗糙，表面经常凹凸不平，币文亦很不清晰。根据金相分析，齐明刀的铜质较劣，含铅量高，甚至在山东淄博还发现有铅质的齐明刀。^⑩这种迹象表明，齐明刀很可能是齐国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仿照燕明刀而铸行的货币。结合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齐明刀很可能主要由莒和即墨两地铸造，而这两地在燕伐齐战役中又一直未被燕军占领，那么这种很特殊的情况出现在燕军几乎占领齐国全境期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以想象，正是由于燕军的入侵，齐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很大打击，从而引发了币制的紊乱。在长达五年的占领期内，齐国为了同燕军开展贸易，不得不仿照燕币铸造了一批临时货币——齐明刀。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铸造的货币，其质量如何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齐明刀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二、布 币

战国时期，燕国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刀币，其发展演变的序列也十分完整，因此，可以把刀币看作是燕国的主币。布币和圆钱不仅数量少，流通时间短，而且是受他国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属于仿铸货币。因此，这两种货币可以看作是燕国的辅币。

(一) 燕国布币的形制

燕国布币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尖足布，一种是方足布，其铸行时间一般认为均在战国晚期。

1. 尖足布。燕尖足布只有平首耸肩尖足布一种，且目前只发现有此种布币的陶

范,而未见有实物。此种陶范出土于燕下都郎井村 13 号作坊遗址,共四件,均残。^②尖足布一般认为是赵币,^③因此,燕国的这种平首耸肩尖足布可以看作是仿照赵尖足布而铸行的货币。

2. 方足布。燕方足布可分为平首平肩方足布和平首耸肩方足布两种。这两种方足布虽有耸肩与平肩之分,但二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很含混,区别并不严格。例如,面文同为“安阳”的方足布,既可以铸成耸肩的(如《货系》2306 号),也可以铸成平肩的(如《货系》2307 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把燕方足布区分为平肩与耸肩两种,可能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二) 燕国布币的面文

燕国布币按其面文不同,可分为八种,除一种外,其余七种布币面文均为地名。何琳仪师曾撰《燕国布币考》^④一文专门探讨燕国布币的面文,为节省篇幅,本文拟将何琳仪师的研究成果列为一表,以便观览。欲闻其详,请参看何师原文。

燕方足布中面文为“右明牟𠄎”的一种,因其内容独特,无法列入上表,在此略作说明。此种布币《历代货币大系》著录三枚(2342-2344),对于其面文的隶定和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何琳仪师在前引文中将面文四字隶作“右明牟𠄎”,读为“右明

隶定 释文	安易 安阳	纁坪 襄平	坪险 平阴	祝昌 广昌	旒刀 韩号	宜平 安平	眚坪 重平
著 录	货系二二九〇 —— 二二三一六	货系二二二一七 —— 二二三二六	货系二二二二七 —— 二二三三三	货系二二三三四 —— 二二三三九	货系二二三四〇 —— 二三四一	北京市钱币 学会简况	中国钱币 一九九二·四
文 献	{汉书·地理志代郡「东安阳」}	{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 {汉书·地理志「辽东郡「襄平」}	{史记·赵世家「幽缪王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	{汉书·地理志「代郡「广昌」}	{水经·圣水注「引王肃曰「今涿县方城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	{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新安平」}	{汉书·地理志「勃海郡「重平」}
地 望	河北阳原东南	辽宁辽西	山西阳高	河北涿源	河北固安	河北棗县西	河北吴桥

司鏹”，并谓“‘司鏹’可能是燕国管理货币的职官，相当周官‘司货’（《礼记·曲礼》）下，‘右明’则可能是管理货币的机构。”

三、圆钱

燕国圆钱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河北北部、内蒙、辽宁、吉林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部。除了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收集到一枚“明刀”圆钱外，河北中部一带迄今无一发现，有的学者据此推测燕国圆钱的铸行时间“约在燕王喜徙居辽东以后，直至燕国灭亡。”^②这应该是可信的。燕国圆钱就是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仿照秦国圆钱而铸行的。

(一) 燕国圆钱的形制

燕国圆钱的主要特征为圆形、方孔，按照其面文及大小可分为三种。

1. 一刀圆钱。此种圆钱面文为“一刀”，形制为圆形，方孔，有郭，背平素，直径一般为1.8—2cm，重1.5克左右。亦有铅质者（《货系》4120号），背文为一“吉”字。

2. 明刀圆钱。此种圆钱面文为“明刀”，形制为圆形，方孔，无郭，背平素，直径一般为2.5cm，重2.5—5克。

3. 明彡圆钱。此种圆钱面文为“明彡”，形制同于明刀圆钱，直径一般在2.8cm左右，因此种圆钱只见于著录，未见实物，其重量不详。

(二) 燕国圆钱的面文

燕国圆钱的面文有三种，即“一刀”“明刀”“明彡”。在一刀圆钱中，“刀”字一般写作形，而在明刀圆钱中，“刀”字一般写作形，写得很像“月”字，当是受“明”字“月”旁写法影响的结果，是一种类化现象。明彡圆钱的面文“彡”字不识，当不排除是一种符号的可能。

上述燕国圆钱三种面文的含义我们还不很清楚，这一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①⑥⑬⑲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的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②郑家相《燕刀面文“明”字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期。前引罗说亦见该文。

③《考古学报》1955年第十册。

④杨宽《战国史》1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朱活《古钱新探》142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⑦郭若愚《春秋战国时期货币的演变和发展》，《中州钱币》第1辑。

⑧郑刚《战国文字中的同源词与同源字》，油印本。

⑨夏淦、杨逢彬《学习战国文字偶记》，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第九次年会论文。

⑩黄锡全《燕刀“彡”字新解》，油印本。

⑪《首都博物馆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⑫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上册，188页，齐鲁书社1979年版。

⑬朱活《古钱新探》146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⑭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146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⑮周卫荣《再论“齐”明刀》，《中国钱币》1996年2期。

⑯裘锡圭、李家浩《战国平阳刀币考》，《中国钱币》1988年2期。

⑰杨树民《山东平度市发现齐“彡”刀钱范》，《中国钱币》1991年3期。

⑱《山东莒县出土刀币陶范》，《考古》1994年5期。

⑳陈旭《淄博发现铅“彡”字刀币》，《中国钱币》1996年2期。

㉑拓片见《燕下都》128页图七七·1-4，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图1、3又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2492号。

㉒何琳仪《尖足布币考》，《陕西金融·钱币专刊》（十六），1991年。

㉓《中国钱币》1992年2期，后又收入《古币丛考》，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版，内容有所增补。

（作者为吉林大学古籍所研究员）



图一



图二



图三 漱礪題

对《五十年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文字石刻》

一文的勘误

齐鸿浩

《北京文博》2000年第一期刊登的吴文、傅幸二位先生所撰《五十年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文字石刻》一文(简称吴文),其中介绍了门头沟区的石刻文字7条,可惜美中不足的是错了三条。现介绍如下:

①武定三年刻石:吴文中是“大魏武定三年(545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而原文应为“大魏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游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五人,夫十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①(图一)

②紫石塘界刻石:吴文中是“潭柘紫石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工程太监何□□立。”而原文应为“内官监紫石官塘界 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理工程太监何立。”(图二)

③南官园摩崖刻字:吴文中“撒手崖”篆书。而“撒手崖”应为楷书。^②(图三)

吴文所出差错可能是未能到现场考察,致生差错,特予更正。

①齐鸿浩《永定河畔东魏刻石》北京文物 1999年12期。

②齐鸿浩、韩济民《南官园刻字》《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年7月出版。

房山石经山雷音洞的保护和修缮

·
胡一红

一、雷音洞概况

雷音洞为房山石经山藏经洞之一,它与山上其余八洞一同被称为北京小敦煌。九洞内均珍藏着石刻佛经版,据 50 年代佛教协会整理统计,共藏石 4559 方。其中雷音洞珍藏有 146 方。

石经镌刻始于隋大业。《帝京景物略》载:“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半麓,日白带山……藏石经者,千年矣,始

曰石经山……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闾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傅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静琬圆寂后,刻经事业由其弟子玄导、僧仪、慧暹、玄法等人继续主持进行,历经唐、辽、金、元、明,一千余年间共镌刻石经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分藏于石经山九个藏经洞及云居寺南塔旁的藏经穴内,堪称国之重宝。

山上藏经洞分上下两层,除雷音洞外,其余均属封闭式洞窟。洞内塞满刻字石经版,洞口由辟有矮窗的石门封固。位于上层的雷音洞是唯一的开放式洞窟,因四壁镌刻石经,故又称石经堂、华严堂。《双崖集》中曰:“折而南有石堂东向,方广五丈,曰石经堂。堂有几案垆瓶之属,皆以石为之,下以石斲地使平。壁皆嵌以石刻佛经,字类赵松雪。中四石柱,柱上各雕佛像数百,饰以金碧。堂之前石扉八,可以启闭。外有露台,三面以石为阑,设石几石床,以为游人憩息。”以上记载告知了后人当时洞内外的大致景向。雷音洞除辟有门窗外,洞中四壁嵌满刻有佛经的石版,且洞中立有四根石柱。壁上经版多为静琬在隋大业至唐贞观一段时间内主持所刻,“……雷音殿,四壁镌梵语,悉隋唐人所书^①。”其中有《华严经》、《胜鬘经》、《法华经》、《弥勒上生经》、《维摩经》等,字迹工整、笔法苍劲、镌刻精细,为佛经中之精品。四根石柱雕成八棱状,每面刻有各种法号的带龕佛像,共计 1056 尊,俗称千佛柱。石柱不仅雕刻精致,且构思巧妙,在洞中具有支撑洞顶作用。整个洞窟被开凿者营建成一座小型佛堂,即可供僧人在内朝拜、举行佛事活动,又可供游人参观游览。

二、修葺概述

始建于隋代的雷音洞,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后人也对其进行过多次修葺。

据元人贾志道撰《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载:“至正改元夏四月,有高丽国僧名慧月者,因礼文殊大士于五台……经房山县西乡

里东峰古刹,名曰小西天华严堂,其堂并华严经本等十二部皆石为之,盖有年矣。岁月绵延,住僧云至,堂摧经剥者有之,存基址焉。慧月留止于此,悯其石石摧圮,经本残缺,幸遇资政院使资德大夫龙卜高公、匠作院史大夫觉珠申公,慧月拜礼,详陈其事,公等允其言,布施净财千余缗,命慧月施劳董公,修石户经本,不月余而俱修。”此段记载详述了高丽僧慧月修葺华严堂(雷音洞)的经过。慧月除用布施所得钱财整修洞窟外,还补刻了洞内已残损的五块经版,并留下“高丽国比丘等达牧书字,慧月修补经石五介”的题记^②。

明万历二十年(1592),“达观可禅师自五台来,送龙子归潭柘……五月十二日辛未,携侍者道开、法厉、如奇、如印等至石经山雷音窟……师见窟中像设摊敞,石经薄蚀,因命东云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③。在达观可禅师的主持下,雷音洞及洞内石经再次得到清理和整修。

康熙十一年(1672),云居寺住持溟波大师开始对云居寺进行全面修复建设,西域寺、东城寺、梦堂庵、云居寺双塔、戒坛,以及石经山藏经洞、曝经台一应建筑,或翻新、或修补、或重建^④。

解放后,党和政府委托佛教部门对石经山雷音洞进行了全面修葺。对散落于洞中地面的石经版进行了统一整理,并按文字走向将残破经版拼接成形后重新嵌于洞内壁。千佛柱柱顶周边及洞内最上层经版与洞顶部的衔接处均匀抹灰膏进行了加固保护。

80年代中期(1985年),云居寺文管所负责整修了石经山雷音洞外的石栏版,补配了雷音洞洞门二侧窗户的七根石窗棂,并为雷音洞加设铁门二扇。

90年代中,因雷音洞内石经版风化严重,且洞窟有雨水渗漏问题,将其列入文物抢险保护行列。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对雷音洞的现状进行了勘测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方案。雷音洞于1996年得到了较全面的整修保护。

三、90年代雷音洞现状调查及病害分析

雷音洞位于石经山山腰处,坐西朝东,依自然山势开凿而成。洞的东面有一门二窗,80年代曾补修过,故较规整。门、窗上方的墙面,尤其是顶部与山体衔接处损毁严重。该处砌筑用料不规则,既有粗料石,也有砖及碎小石块,显得十分杂乱。估计是山顶雨水常年冲刷,导致粗料石丢失,故采用砖及碎石填补砌筑而成。由于用料不规整,且砌筑方法不当,大多数地方已经松动,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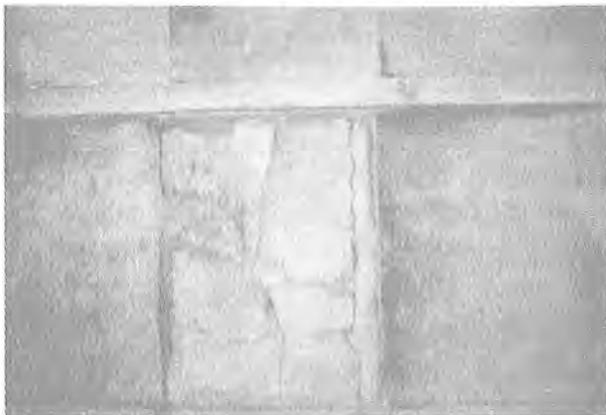


图一 已能看到经版背面的毛石墙
雷音洞内经版破损状况,经版间缝隙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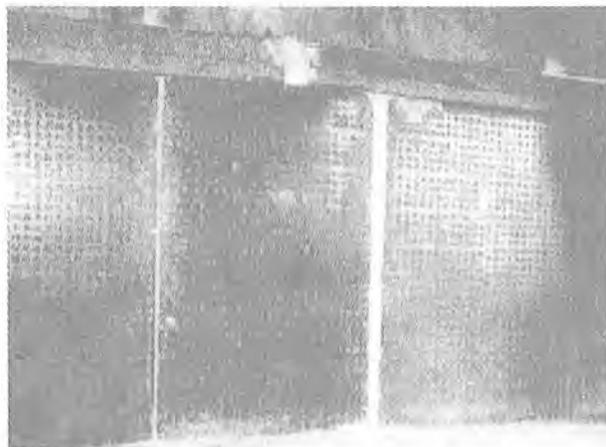


图二 雷音洞内经版破裂成多块

部出现坍塌现象,其中以东墙北部最为严重。进入洞内,发现由大小不等的石板及砖铺砌的地面已是高低不平,呈残破状。洞内镶嵌于四壁的146方经版按上、中、下三层或上、下二层排列,层与层之间用条石隔开。最上层经版与洞顶间用条石镶嵌加固,其中西壁最上层条石雕成屋檐状向外伸出。由于年久失修,一些经版已走闪、错位。经版间出现宽窄不等的缝隙,其中南、北两壁已各有一处裂缝宽达8cm左右,从缝中可清晰地看到经版后面的毛石砌体(图一)。从北壁经版的缝隙中,还能看到相邻藏经洞内的情景。少数经版有断裂、缺损现象。碎裂成多块的石经版(图二)虽仍镶嵌在墙上,但有些地方已松动,极易出现脱落问题。大部分经版有程度不同的风化现象,较为严重的有北壁下层2块、南壁下层3块、西壁下层



图三 经版的残缺部分采用同类石料进行了补配



图四 经版内条石缝隙用同类石料补配

10块,总计15块,约占洞内石经版的十分之一多。西壁下层的10块经版风化最甚,文字脱落严重,有些地方已被风化剥蚀成无字的版面。四壁镶嵌的条石存在着松动、裂缝加宽、缺损等问题。洞中的四根石柱有风化现象,但程度较经版要轻。石柱顶部50年代勾抹的灰膏已全部脱落,仅剩下一些不规则且已松动的块石浮搁在柱顶,周围残存有茅草等小鸟做巢的痕迹。此外,据雷音洞管理者赵师傅介绍:在风化严重的石经版前面的地面上,经常可看到白色石粉末,用手触摸经版时,可明显感到手中沾有脱落的石粉。当雨季来临或下雨前,石经版表面常有细小水珠出现。大雨过后,洞顶山岩的裂隙周围、洞门偏北处、洞内西壁、南壁和北壁的西侧等处均有水涸痕迹,有时从西壁起向东、南、北三个方

向延伸后的涸湿面积可达全洞的五分之三左右。经对洞顶处进行勘察,发现洞顶与山坡连为一体,上面长满荆棘、小树。虽看上去较为平坦,但整体是随山体呈斜坡状向下倾斜。因洞顶处有土覆盖,且长满灌木,具体情况无法查明。但根据洞内雨后涸湿痕迹,可以推断出洞顶岩石的裂隙与洞顶山体的裂隙是相互连通的,尤其是西壁处,裂隙可能更大更宽,因此每次雨后才会出现大面积的水痕涸湿状况。洞内门窗附近的水流遗迹,则是因门楣上方墙体坍塌,雨水、雪水顺坡而下流入洞内的结果。

经过对雷音洞现状的全面调查及勘测,我们认为除洞窟长期失修外,水是造成洞内文物损坏的主要因素。虽然经版镶嵌于洞内,但是下雨时顺山势而下的水流会沿着洞门顶部已坍塌并出现裂口的地方流

入或渗入洞内。雨季来临后,山体内将积存较多雨水。由于洞窟与山体相连,所以雨水顺洞顶山岩的裂隙处渗漏到洞中,对经版造成危害。西壁因坐落在山体中,故每次受害最为严重。存积水从经版背面渗浸,并由西壁向南、北两壁扩展,且延续时间较长,使经版长期处于潮湿状态。此外,因雨前空气中湿度较大,当较温暖的潮湿空气遇到洞内冰凉的石壁时,空气中的水分即凝结形成水珠聚集在石经版表面,形成凝结水。无论是凝结水还是渗漏的雨水都将空气中的有害成分溶解于其中,流经山体土壤后渗入洞中的雨、雪水则带入了土壤中的盐碱等有害物质。这些带着有害成分的水渗入到石质文物内部的孔隙中后,其酸性物质直接对石质文物产生侵蚀作用。盐类的结晶水合物则在外界干、温度变化的影响下出现结晶、溶解、再结晶、再溶解等反复变化过程,盐类的迁移和结晶水合物的体积变化对石质文物破坏极大。寒冷的冬季水分冻融导致的水分子体积的变化以及对石质文物产生的压力大小的变化也对经版造成了危害。由此可见,雷音洞内的石质文物正在渗漏水与凝结水的共同作用下加快着破坏速度。因此,做好雷音洞内经版、千佛柱等珍贵文物的抢救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四、保护方案的制定及 修缮工程的实施

如前所述,雷音洞内文物的损毁与水有较大关联。因此,整修洞窟、治理水害、并对石质文物进行防水、防风化保护是工作的关键。在调查、勘测基础上,我所制定



图五
雷音洞内经版与洞顶衔接处的
破损处已用灰泥修补



图六
修缮后的雷音洞外貌

了抢救保护方案,现归纳如下:

1. 对洞内四壁镶嵌的经版拍照、测绘、记录,保留下现状资料后按顺序依次编号取下。
2. 将已断裂成多块的经版及条石用环氧树脂等材料按原状粘接加固。
3. 对已残破、缺损的经版及条石,用同类石料进行补配。经版补配处不予刻字,以示区别。
4. 经版揭下后露出的四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处理。或拆除原有毛石砌体,将粗料石按原毛石砌体样式恢复砌筑后用防水水泥砂浆勾缝,做聚氨酯防水层;或于岩石表面做混凝土保护层外施聚氨酯防水。
5. 将所有经版及条石用防水、防风化材料做保护处理,并按原样复位归安。
6. 千佛柱柱顶处的缺损处用相同材质的石料补配镶嵌,四周用青泥灰膏勾抹,通



图七 雷音洞顶新挖排水沟,以排除山上雨水

体喷涂防水、防风化材料。

7. 揭下地面高低不平的碎石、砖块,用水泥沙浆找平后,做聚氨酯防水层,再将石板复归原位,缺损处用同类石料补配齐整。

8. 洞顶山岩裂隙用防水材料勾抹堵严,再对洞顶整体喷涂高分子材料防水。

9. 拆除洞门上方出现裂缝及局部坍塌的外墙,用规整的粗料石补砌,缝隙处用防水水泥浆勾抹严实。

10. 清理洞顶山体的土层,封堵山顶裂隙。在山岩表面做聚氨酯防水层后,将表土覆盖于原处。

保护方案上报后,鉴于经费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未能全部批准实施。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此次雷音洞的修缮保护工作依据不做大动、原地保护的原则。为此,古建筑处、八分站、古研所与施工方一起重新研制了方案,并就保护修缮的具体问题与施工部门进行了技术交底。

此次雷音洞的修缮保护工程由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承担,所做工作如下:

1. 对洞内经版的残缺部分进行修补。修补时采用同类型石料严格按尺寸进行取料。补配处一律不刻字,以示区别。镶嵌

时,需事先清除掉粘接面表面的尘土和污垢,而后涂抹上按 1:1 比例组合成的环氧树脂与低分子量聚酰胺树脂的粘接剂,使后补部分与原经版及洞壁牢牢粘接在一起。(图三)

2. 补齐经版间及条石间的缝隙。补配时一律按尺寸并采用同类石料严格操作。采料后将互相粘接的部分清理干净,并在粘接面上涂抹环氧树脂与聚酰胺树脂的混合物,将补配的石料嵌于缝隙中相互粘牢。(图四)

3. 固定经版残片。先将已断裂成数块,且即将脱落的残破经版轻轻从壁上取下,打扫干净断裂面的尘土污物。而后在断裂面上抹匀上述粘接剂,重新复原固定于壁面上。

4. 整修千佛柱柱顶。首先清除掉石柱与洞顶衔接处的杂物及已松动的碎石,然后择用同类石料镶砌。石料外部用青灰膏等材料随形勾抹成圆柱状,使外观与石柱风格接近。

5. 修补洞顶与经版衔接部位。首先对该处已松动的灰膏、碎条石等进行清理,去除隐患。然后固定新嵌条石,并勾抹灰泥修补已残损的部位。(图五)

6. 修理地面。将洞内地面已碎裂的石板及砖块揭除,改用稍规整的石板重新铺砌。

7. 对洞中石质文物进行防水、防风化保护。用软毛刷清理经版、千佛柱等石质之物,除去表面的尘土及污垢。待干透后,将实验室和现场小面积试验中筛选出的有机硅材料均匀地涂刷到石质文物表面,约 2-3 遍。风化严重处增加涂刷次数。以起到防水、防风化作用。

8. 洞门外墙面的补砌。先拆除门、窗上方残破、坍塌的墙面,清理掉松散的碎石和砖块。然后采用较规整的粗料石对残缺部分进行补砌,块石之间的缝隙用防水水泥砂浆勾抹。(图六)

9. 洞顶上方挖排水沟。为保证雷音洞内文物安全,防止山上雨水泻入洞内,特在

洞顶上方山体处挖排水沟一道(图七),将山上积水引入沟内排走,避免雨水顺山势下流冲击洞门的现象发生。

该项工程于1996年9月完工。1996年10月由北京市文物局古建修缮处、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文物工程监督站、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等单位的同志对雷音洞修缮保护工程质量进行验收。总体来看,此次雷音洞的修缮保护是成功的。洞门外门窗上方补砌的外墙面,外观整齐风格朴实。洞内残缺经版以及经版之间、条石之间的裂缝经用同类石料严格按尺寸补配,不仅使残缺处得到修整,又使其与原貌有所区分。所有补配石料及碎裂经版粘接处均未发生粘接剂流坠现象,达到了较理想的效果。石经版、千佛柱等石质文物在涂刷防水、防风化材料后,未出现堆积、流挂、弦光等问题。千佛柱柱顶、地面以及洞顶与经版衔接处经修缮后,改变了洞内原本残破、凌乱的状况。当然验收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少数风化严重的经版防风化试剂涂刷未到位,洞顶上方山坡处的防水沟出口处略嫌窄些等。为严格保证质量,请施工部门对风化严重的经版补涂防风化材料,并将洞顶上方排水沟的出口凿大,以避免雨后水流不畅现象发生。

这次雷音洞的修缮进行了较系统的调研工作,找出了洞内石质文物损毁的主要原因,并在修缮保护中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与以前诸次修葺不同之处在于,除对洞内经版等石质文物进行补配、补砌、修整等常用修缮手段外,还采用高分子化学材料对文物进行粘接加固,并应用改性有机硅材料对经版等石质文物做防水、防风化保护,增强了它们抵御水浸、风蚀的能力。当然有机硅材料会和其他材料一样随

着时间的流逝,性能和作用有所减弱,但在有效期内,保护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若干年后由于表层的风化试剂最先接触外界环境,所以该处的防水、防风化作用会首先减弱,但里层的防风化材料仍能继续起到作用。十余年后,材料会逐渐老化,但由于有机硅材料中含有硅,其结构与石质文物中二氧化碳性质极相近,因此即使老化失效也不会对石质文物造成危害。当认为喷涂的材料已不起作用时,可重新进行喷涂处理。届时,相信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提高,将有更新更好的石质文物保护涂料出现。

今年年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教授、博士、硕士一行人参观雷音洞时,委托他们对雷音洞这几年的情况进行回访。管理雷音洞的老赵师傅向他们介绍了雷音洞修缮后这几年的情况,经由防水、防风化材料处理后的石经版及其它文物,未再出现风化剥蚀、石粉脱落的现象,这说明处理后的效果是不错的,它达到了抑制文物风化剥蚀的作用。可见雷音洞的修缮保护工程在经历了四年的考验后,仍很理想。因此我们认为此次修缮保护工程是成功的,它对延长洞内文物的寿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①(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2109页。

②杨亦武《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北京文博》1999年3期第59页。

③(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第2117页。

④杨亦武《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北京文博》1999年3期第64页。

(作者为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文物建筑化学保护研究室主任)

居庸关长城平面图



居庸关长城的特点及其修复

李德仲

居庸关城位置环境十分优越

居庸关位于关沟南段。关沟从南口至八达岭长约 17 公里。居庸关南券城距关沟南口 6.5 公里,距八达岭 10.5 公里。

关沟南口,东西两山相距不足 200 米。从南口向北,东西山距离逐渐变大。在距居庸关南券城 1 公里处,东西两山距离变短,不足百米。再向北,两山距离又变宽,便能看清居庸关关城全貌。环顾关城四周,只见山堂宽阔。西有金柜山,东有翠屏山。翠屏山东是罗汉山,北侧是大北梁山。河道在关城内呈弧形,弧顶朝东。关城内南券城至北券城的古道呈弧形。南券城至翠屏山南端约 140 米。北券城至翠屏山北端约 60 米。

从北券城外回头看关城,只能看见关城楼和东山北段长城,自然封闭效果极佳。从北券城往北,关沟两侧山峰陡峭,山间窄小。过弹琴峡后,山势变缓,山脉纵横。再往北山势又变陡峭,南北高低差变化大。

纵观关沟全部地形状况,居庸关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首先,居庸关控扼南北。古人通过关沟,特别是车马、军队必须走居庸关。其次,关内设施隐蔽性极好。居庸关四面环山,进攻者从远处很难看清关内建筑。第三,关城周围环境为修筑防御设施提供了条件。关城东西两山建有长城敌楼,铺房。西山南侧、北侧山上建有烽燧。东山北侧,东侧建有烽燧。它们对关城起巩固作用。金柜山山顶敌楼是整个关城的制高点。站在上面向北可见上关、水关长城。向南可



居庸关西山长城遗址

见关沟南口和昌平城。信息联系十分方便。第四,关城内地域宽阔,有利于各种建筑的修建。关内从南水门至1号敌楼下是长630米,宽120米的弧形河道。河道东是翠屏山,西侧是土坎。土坎高22米。关内建筑多数建在土坎上西侧。关沟内如遇大水,水冲向东山后向南流去,危害不了其它建筑。从土坎至西山脚下,最窄处50米,最宽处达300米。从南券城至北券城古道两侧有上万平米的地域较为平坦。西山脚下及南关外道路东、西南侧都有较平坦的地域。这样的地形在关沟内独一无二。第五,居庸关周围建筑材料丰富,有利于关城建设。明代曾在关城西北八里建有砖瓦窑。在关城北一里处建有灰窑。关沟内还盛产花岗石。这些为关城的修复提供了材料保证。

居庸关长城的特点

居庸关长城全长4167.5米。围绕关城呈圆周形建设。西侧建于金柜山上,长2097.8米(以下称西山长城),东侧建于翠屏山上,长1505米(以下称东山长城),南券城外缘和南关跨河道长城合计长324.1米,北券城外缘及北关长城合计长240.6米。其特点有五:

1. 围绕关城呈圆周封闭型建筑形式。

居庸关关城建在40里关沟中部,扼守南北交通要道。其关城建设巧妙利用了

“两山夹一水”的地理环境。关城主要建筑,建在“云台”北、西、南侧。长城作为军事攻防屏障,沿西侧金柜山、东侧翠屏山建设。南、北跨河道段用长城连接并修有水门。西山相对高度351米。东山相对高度150米。长城围绕关城呈圆周封闭型建筑形式。

2. 长城防御范围广。

居庸关南券城至北券城相距650米。东山山顶至西山山顶直线距离1150米。长城向内周圈面积50公顷左右。北券城建有千斤闸,南关水门设有水闸。在关城以外,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方向建有烽燧。翠屏山长城北端凿有“劈山墙”。居庸关长城对东侧“九仙庙”沟,西侧“羊台子”沟,西北侧“小西沟”,东北侧“劈山沟”,西南侧“马神庙”沟连同南北城和南北水门共防御8条沟路。

3. 两山长城墙体内侧低,外侧高。

东山长城外侧墙体(垛口不计在内)最高6.5米,最低4米。西山长城外侧墙体最高13.2米,最低4米。外侧墙体平均约5米。内侧墙体高度0.2—1.8米不等。大部分地段长城内侧只砌女墙,女墙下即为山坡。东山两处和西山山顶,内外均砌有垛口的长城墙体内外通高一致,皆为4米左右。两山长城采用内侧低形式修筑,一是有效地抗击外侧来犯之敌,二是合理利用地势,节省劳力,节省建筑材料。

4. 长城建筑结构形式多样,堪为中国

长城建筑的精华。

西山北侧 900 余米长城外侧墙体为花岗岩条石砌筑。条石长 1 米,宽 0.35 米。东山长城部分地段墙体外侧也为花岗岩条石砌筑。经考证,这些长城是明代所建。西山南侧和西侧,东山部分长城外侧墙体用碎块石,碎山石砌筑。西山北侧与北券城连接的“人”形分叉长城外侧墙体则用小城砖砌筑。经考证,这些地段的长城为明以前所建。垛口墙、女墙,绝大多数用城砖砌筑,西山南侧有近 84 米垛口墙用碎石砌筑。

居庸关长城高低落差变化大。西山顶长城比河道长城高近 170 米。东山南侧、北侧,西山南侧、北侧均有坡度在 30—40 度左右陡峭的长城。

长城曲直宽窄变化大。东山长城最宽处达 16.4 米,最窄处仅 1.2 米,多数地段宽 4—5 米,西山长城最宽处 7.4 米,最窄处 1.2 米。全部长城只有关城南侧河道 57 米长城平直。东山长城从北至南坡度平缓,曲直变化小,北高南低,站在北端向南望去,长城宛如巨龙盘卧于山巅。垛口和女墙的建筑有三种形式,绝大多数地段长城垛口面向关城外侧。女墙朝向内侧。西山顶有 40 米,东山北端 198.3 米,向东伸出 32.3 米长城为双向垛口。西山南侧有近 20 米长城无垛口,外侧是山崖,内侧建有女墙,长城坡度陡处垛口砌成锯齿型,坡度较缓处砌成长方形。

适应地形变化,居庸关有三处进行分叉修建。一处是西山顶,一处是西山北侧与北券城连接处,一处是东山北。

5. 居庸关长城两侧植被覆盖率高,被誉为“花木长城”。

居庸关地处关沟腹地,为三北防护林北京段绿化重点地区。近些年来,由于大量植树和封山育林,居庸关两山松柏、红枫树郁郁葱葱,沟内柳树、杨树枝繁叶茂,鲜花和绿树与古老的长城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居庸关长城修复前的状况

1992 年对修复前的长城进行现状勘

察,大致情况如下:

1. 长城被近代战争破坏严重。

东山长城最南端存在大型水泥碉堡一座。西山有军事掩体三座,碉堡一座。东山长城马道挖成战壕长 679 米,西山长城马道被挖战壕长 719.3 米。敌楼全部毁坏无存。

2. 东山长城外侧墙体毁坏约 505 米,西山长城外侧墙体毁坏约 110 米,两山 3600 米长城马道全部被毁。内侧女墙,绝大多数被毁坏,两山整体重修长城达 2150 余米。

3. 1937 年西山修筑公路将北券城与西侧山体长城连接处拆除,公路又从南券城穿过,将南券城南侧中部破坏。北关券城东侧墙坍塌近 80%。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及 80 年代初修关沟河道公路,北关河道长城和水门,南关河道长城和水门全部毁坏无存。

4. 遗址存留情况。

东山长城外侧旧墙保存约 1000 米,旧垛口有 56 个,旧箭孔 115 个。西山长城外侧旧墙体保存约 2200 米,旧垛口 404 个,旧箭孔 388 个,旧女墙 38 米。

长城修复中解决的一些问题

居庸关长城由中国长城学会设计,于 1993 年 5 月着手修复,1994 年 10 月竣工。

1. 恢复居庸关长城周围形制,对毁掉部分进行重修。

南关河道重修长城 59 米,长城马道宽 4.4 米。距地面高 6 米,墙体用规整花岗岩块石砌筑,石砌基础深 4 米。河道长城东端修水门两孔与东山长城相连。

北关建桥一座,向东跨越河道同长城连接,北券城西侧修跨公路门洞两座,与长城相连。门洞宽 7 米,高 5.2 米。南券城西侧修跨公路门洞 1 座,宽 7 米,高 6.5 米。与西山长城连接,原穿行南券城公路从“云台”西侧向西改线,南券城经修复恢复原状。

2. 修复两山长城,清除荆棘、军事掩体、碉堡,重新确定全部毁坏无遗址长城轴位,对处于危险山体的长城进行变位处理,无法变位处理山体进行加固。

东山北侧有 203.2 米长城修复前全部毁坏,长城北侧建有铁路隧道。为保证铁路和长城二者安全,将长城向北伸出部分向南移 20 公分左右。东山南端两侧因山体遭破坏,长城向东移近 1.5 米。

两山长城清除荆棘近 4000 平米,拆除掩体 3 座,碉堡 1 座。

3. 修复长城,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基础和原墙体。

东山长城南段外侧石墙为花岗岩条石砌筑,北段内外侧均为花岗岩条石砌筑,中段和西北段用不规则山石砌筑,修复时,毁掉部分全照原样石块补砌。

北关西侧“人”形叉长城外侧砖墙体,西山西南侧和南侧长城外侧碎石墙,修复时全部采用原样材料。

长城旧垛口墙和旧女墙,没有毁坏的尽量保护原位原样,残缺的墙体和封顶用原形制材料补齐。西山南侧 80 多米用碎石和白灰泥修砌的垛口墙,为避免雨淋塌坏,在外面用水泥和清灰涂抹一层,既保持了原状,又起到了加固作用。

4. 考虑建筑的安全稳定性,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个别地段长城和南北券城城台进行了处置,收到良好效果。

北券城西侧山上的“人”字长城,因日伪时期修筑公路将山体和长城切断。断崖风化严重,影响长城安全。1994 年,由总参工程兵设计四所设计,广西柳州东方预应力有限公司施工,对该地段长城山体进行了喷锚加固。向山体内打入 34 根 16 米长,直径 22 厘米的大型锚索和若干小锚索。同时,将山体表面用水泥喷浆加固。

南北券城城台是砖石结构建筑。城台内部填渣土。南券城城台在 80 年代初曾修过,后因质量不过关,城门洞拱券顶南北向出现裂缝。修筑三滴水城楼之前,在城台上浇筑水泥桩。桩基深到台子地底部同

岩石相接。桩深最浅 14 米,最深 17 米。桩顶与台面相连处用水泥浇筑 1 米厚,水泥内为矩形钢梁。三滴水城楼金柱安放在水泥桩上,楼基非常坚固。

5. 长城马道、女墙、石墙修砌质量技术标准和施工量。

西山 2100 米长城砖砌体,砌城砖 4449 立方米,方砖 902 立方米,西山南侧砌毛石石墙 5204 立方米,东山 1500 米长城,砌城砖 3022 立方米,方砖 896.09 立方米,城墙外侧砌垛口墙高 1.6 米,毛石砌筑高 1.7 米,砖垛口每隔 2.3 米做一箭孔,垛口间距约为 2.4 米,毛石垛口间距为 3 米,马道地坪每 10 米设拦水砖道,内宇墙设吐水嘴。

砖墙砌筑体用 75 号混合砂浆,砖缝 1-1.5cm,墙体表面用白灰膏勾缝,里直外收,上宽 0.4cm,下宽 0.45cm,3.5% 收分。南关西段原状为毛石垛口墙,用水泥砂浆砌筑,白灰勾缝,水泥砂浆配比为水泥 311kg,砂子 1660kg。

马道铺两层砖,上层为方砖铺面,下层为条砖铺底,其下为二步三合土,厚 20cm。配合比为白灰、砂、粘土,比例为 3:3:4。夯实防雨水渗漏,马道上踏步尺寸按原状确定,原状没有,按图施工,砖砌踏步用 75 号混合砂浆,表面用清灰勾缝。

修复长城所用条砖,方砖,封顶砖,燕尾砖,射孔砖均按原尺寸烧制,所砌墙体高低随山就势,墙面平整,灰缝直顺严实,深浅均匀,灌浆饱满,接茬自然。

长城石墙修复,块石质量坚实,抗压强度不低于 250kg 平方厘米。砌筑砂浆采用 1:4 水泥砂浆,每立方米石砌体用 0.41 立方米水泥砂浆,砌筑石块上下错缝,左右内外搭接,砂浆饱满,避免出现重缝和空缝,不能出现垂直通缝。

6. 居庸关长城修复自 1993 年 5 月 15 日正式开工。1994 年 10 月 30 日竣工。用工 8 万余个,人工挖、运、填各种建筑材料 75000 余吨。工程合格率 100%,优良率 93%。

(作者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文物科科长)

天安门城楼修建始末

· 孙永林

我家几代人都是从事古代建筑修建工程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仍从事古建修缮，成为古建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60年代初，组织上派我参加对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检查和加固维修工作，从那时起我的政治生命就与国家的重大节庆活动紧密相关。为保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重大活动的安全，每年逢4月初和9月初，北京市都要组织我们对天安门城楼进行技术安全检查。当时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四室的刘振宗、关慧英，市房管房修二公司的尤贵友和我，我们共同对天安门城楼的大木结构、墙体和瓦面详细检测，如大木榫卯处、瓦件结合部等均要用手亲自去触摸，测检结果向市长及张镈、朱兆雪、钟深等同志汇报，再报周总理及有关中央领导同志。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此柱直径1米、高12米）10米处柱髓心糟朽，直径已达80厘米，对于安全使用天安门城楼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及时向市里和中央汇报这一情况后，为保证1965年10月1日安全使用天安门城楼，市建委组织力量，从519工地调450号槽钢（长10米）四根，将该圆柱四面加固支顶起来，确保了10月1日国庆节的安全使用。

天安门是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建，当时叫承天门，清初顺治朝对该建筑进行修缮后改称天安门，整个建筑面阔为九开间，进深为五开间，重檐六排柱子，前后带廊，歇山屋顶。到了清末，国家穷，无钱大修，所以在修缮进程中，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拆下的劣质木材用在了天安门上。在检查天安门城楼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旧天安门使用的木材材质非常差，连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使用的杨木，而在天安门城楼的明间上，中脊檩多处使用的是旧杨木材。在检查过程中

经常发现枪弹和炮弹残迹，有的炮弹上还能看见英文字母。天安门城楼经历多年战乱，年久失修，再加上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残旧木材，整个建筑多处发现斗拱变形、大斗压偏、两山顺梁下弯（挠）度达28厘米，明间檩木下弯达30厘米，多处梁、檩下弯达28—30厘米，屋顶内原很宽阔，由于加固用了许多支顶材料，挤占空间，给检查加固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根据多年对天安门城楼的检查情况，当时曾向中央打过关于修建天安门城楼的报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一直未见上级批复。

1968年8月27日早，我接到市房管局保卫处电话，通知我于8月23日早8点到天安门报到。28日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总理关于修建天安门的指示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当时组建了修建天安门城楼的领导小组，由市建筑设计院、市测量队、房修二公司古建处组成普查实测小组专门负责天安门翻修工程的技术，我出任该组组长。按上级的要求，我们很快便对旧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实地测量并绘制出现状图。

根据我们的报告，由于旧天安门城楼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隐患，中央把翻修工程确定为重建工程。

中国式的建筑有它的尺度，一般按模数^①而建。模数为“制”，如材份制、口份制和柱径制^②。当初我以为旧天安门用的是材份制。这次拆建过程中，才发现用的是“口份制”，该口份制为3寸，（合9.6厘米）。旧天安门城楼使用的模数为3寸斗口（口份），下檐五踩斗拱，上檐用的是七踩斗拱。小檐、老檐、围金柱共计六排、60根柱子、小檐柱高60口份，最高柱为12米（在整个建筑上没有一根10米长的柱子）。天安门的每一件大木均按实际测量的尺寸进行复制。

这次重建天安门城楼所用的木材由房

二古建处张松年在上海一站购进的从非洲加纳进口的大直径的色皮等材(并不是从印尼进口的)。另有几根柚木是从故宫调进的(据说是从柬埔寨进口的)。还有一部分楠木是从故宫和东直门拆下来的,楠木调过来做斗拱用的。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因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全部大木及装修是在古建工程处和青年路木材厂进行加工的。由于此次重建工程时间紧,所进的新木料含水率基本饱和均达到80%,在大木加工过程中,曾采用多种办法想降低含水率,但均未解决。遂请林研所的同志来共同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 含水率如何解决?

2. 多种树种,哪种木材做横纹受压?哪种木材立纹受压?

林研所提出要想在短时间让12米长,1米直径的大圆木降低含水率很难,遂有人提出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立纹钻一个直径12厘米的通眼,以期达到通风降低含水率的作用。于是从飞机场调来一根直径5厘米的钢轴,由加工厂的机修工李师傅协助,加工出一个“三黄钻头”,用半个厘米的孔喷水打眼,结果打了一根半就停止了。因为打一根柱子就需要4至5天,60根柱子所需的时间是工期所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就停止使用此办法。最后是采用了在柱子表层钉上木条,外包装一层皮,涂上大漆,使柱子与漆中间留出空间,达到逐渐自然降低含水率的目的。

今年9月份,我在广播里、电视上听到和看到有关介绍天安门城楼重建后的许多报道,其中有的媒体说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比旧天安门城楼高80公分。天安门城楼重建后比旧天安门城楼高了没有呢?高了!但是并没有高出原天安门城楼的设计高度。由于天安门城楼多年失修,大部分木结构均是横纹木受压变形较大,又因跨度大出现弯(挠)度,俗话说木材变形下沉变弯,而立木纹受压的柱高没有变化,采用按原尺寸实物复制,再加上换上新的上等好木料,就消除

了弯(挠)度,所以可以说重建天安门城楼比旧天安门城楼“高”了。这里所讲的“高”了,是指恢复了原天安门城楼的设计高度。再有,这次重建天安门时,为了国徽角度抬高(即让国徽抬起头),我们采用了不改变天安门城楼总体高度的前提下,适当把檐子抬高的办法。我们把上层檐子的斗拱由原3寸斗口改变3.5寸斗口,所有檐头以上的大木尺寸都按原模数尺寸制作,这样檐头抬高了,国徽也就立起来了(可通过图片对新旧天安门国徽的变化进行对比)。

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在祖国的份量越来越重,是世界瞩目的地方,我虽然退休多年了,为了祖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永葆青春,重放光彩,我愿继续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①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模数):宋式建筑权衡尺度为“材”,“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之说。

清式建筑权衡尺度为“斗口”,大式建筑均用斗口。

②中国古建筑的比例尺寸均称为“模数”,模数的尺寸制定是根据建筑主、次、大小而定。模数有宋式为“材”即“材分制”,清式为“口份制”和小式为“柱径制”。

在宋代时材“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之说。材有八等,第一等广九寸,厚六寸,用于殿身九间至十间;二等厚五寸五分,广八寸二分五厘,殿身五间至七间;三等,广七寸五分,厚五寸,殿身三至五间或堂七间用之;四等,广七寸二分,厚四寸八分,殿小三间,厅堂大三间;六等,广六寸,厚四寸,亭榭或小厅堂;七等,广五寸二分五厘,厚三寸五分,用于小殿或亭榭;第八等,广四寸五分,厚三寸,藻井、小亭榭。

在清代时用“口份”即“斗口”。斗口为十一等份,由一寸至六寸。每增加半寸为一份。如一寸;一寸五分;二寸;二寸五分;三寸;三寸五分……等共分为十一等份。

关于“柱径制”是于小式制作或小式大作。所有大木件,均用柱径的尺寸为模数来制作。

凡用斗口的为“大式”作法。凡用柱径尺寸的为“小式”作法。

(作者为北京市房修二公司工程师)

北京市文物局
2000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大事记

3月18日至4月2日 市文物局组织局属首都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及定陵博物馆的百件(套)珍贵文物赴美国纽约洛克菲勒艺术中心举办了《北京古代艺术珍宝展》，此次展览荟萃了历代稀世珍品文物，包括陶瓷、金器、玉器、铜器、漆器、竹木牙角、文房四宝、书画、织绣、钱币、佛像、建筑构件等，展览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

3月至6月 为配合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工作，市文物局组织中央及北京市新闻媒体30余家，包括国外驻京新闻媒体等多次赴老山考古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对老山考古发掘做了全面的宣传，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文物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的极大关注，提高了对文物保护的意识。

4月1日 市文物局完成市政协情况通报会汇报材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专题报告。

4月2日 天坛公园长廊维修工程开工交底。

4月3日 在北京城市轻轨铁路工程上地车站施工现场内发现4座东汉时期的砖室墓。经协商，市文物研究所与工程部门签定考古工作协议，并于8日开始考古勘探、发掘。

4月5日 市文物局与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就拓宽广安大街涉及文物保护问题召开会议。随后研究制定了“两广路”文物保护规划方案。

4月6日 召开了郊区(县)文物执法人员的文物执法工作座谈会。

4月8日 在西南四环工程京丰宾馆西

侧清理辽代砖室墓一座，出土“大契丹故陇西李公故扶凤县太君马氏墓志铭”一盒，及执壶、唾盂、盏托、酱釉葵口钵等多件瓷器。

4月10日 在西北四环工程白颐路口工地施工中出土10件石刻，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清理。

4月12日 召开全市文物系统安全工作会，部署消防工作。

4月13日 市社科规划办组织文物部门、出版部门及文物、出版界专家共同研究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科研立项工作及出版计划。

4月中旬 市文物局组织主要新闻媒体对中央在京单位占用文保单位、保护不力的情况进行报道。

4月17日 市文物局派人参加故宫筒子河及周边危房研讨会。

4月20日 香山公园玉华山庄开工交底。

4月21日 大觉寺大雄宝殿开工交底。

4月29日 市文物局梅宁华局长就南新仓、广安大街等文物保护工作向刘敬民副市长作汇报。

由正阳门管理处、北京市文研所共同承办的《耶律铸墓出土文物展》在正阳门开幕，展览展出了从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铜器、金银器及钱币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元初的礼仪制度、生活习俗及服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月至6月 完成科研课题电子版制作《乾隆十七排》的验收。

22家局属处级单位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开展“三讲”教育工作。

配合市防雷装置安全检测中心，对全市部分文博单位的防雷装置进行了检测。

会同公安消防机关对正阳门管理处、艺术博物馆、法海寺文管所、民俗博物馆等单位的安全设施方案进行了审定，对实施过程进行了监督。

查处了海淀区财政局、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的违章建筑。

5月5日 白云观文物建筑修缮开工

交底。

5月11日 法学研究所灰二楼加固工程开工交底。

5月18日 白云观东西马号及建筑下架油饰开工交底。

5月18日至21日 为纪念第二十四届国际博物馆日,市文物局组织全市百余座博物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大型纪念宣传活动。此次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市旅游局、市教委、中国博物馆学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单位联合主办。4天中到文化宫主会场的观众约11万人,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5月20日 花旗银行内部装修开工交底。

5月22日至26日 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中国全国委员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

5月29日至6月30日 市文物局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工作。

6月1日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局属各博物馆于6月1日当天对全市儿童实行免费参观。

协和医院台面防水工程开工交底。

6月7日 组织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对翰海、盘龙两龙公2000年春拍文物标的进行了实物鉴定,并提出鉴定、许可意见。

6月8日 法源寺大殿修缮工程开工交底。

6月9日 居庸关二期工程开工交底。

6月11日 府学胡同36号院修缮及河北泊头建筑维修开工交底。

6月15日 市文物局完成八达岭瓮城整治规划。

6月16日 市人大文卫体委员会第四十一次扩大会讨论《北京市博物馆管理条例》。

6月17日 位于海淀区的七王坟阴宅及阳宅碑亭开工交底。

6月18日至7月10日 由市文物局主办、首都博物馆和古钱币公司协办,在燕

莎商城举办了“家的回忆——清代北京民居家具展”。

6月20日 白云观工程验收。

6月22日 颐和园、天坛、武夷山、大足石刻世界遗产颁牌仪式。

6月24日 由北京市文物公司在香港征购的“乾隆粉彩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即日携运回京,并由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及部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了鉴定。专家一致予以高度评价,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同时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情系国宝”——北京市文物公司历年征集文物展。

6月26日 市人大机关办公会讨论《北京市博物馆管理条例》,原则同意,决定按计划7月份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6月30日 广化寺工程开工交底。

同日 雍和宫工程开工交底。

上半年 审批和监督影视拍摄38项,大型活动7项。

局属博物馆 2000 年二季度

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 位	成 人 (含外宾)	学 生	总 数	其 中 外 宾 约	购 票 入 馆 者 (含 通 票)
徐 馆	11000	600	11600	1200	1300
首 博	49741	5941	55682	22748	44546
大觉寺	24075	3686	27761	105	21487
正阳门	30540	6018	36558	1002	33674
智化寺	2534	119	2653	110	1090
辽金馆	456	285	741	4	408
西周馆	369	7	376	18	376
艺 博	25290	370	25660	23819	1841
团 城	3180	673	3853	82	2350
大葆台	4226	2368	6594	60	3510
大钟寺	14862	3450	18312	4194	10481
古建馆	1815	382	2197	206	
白塔寺	19560	1124	20684	1438	16110
老 舍	150	250	400	30	400
德胜门	13519	2178	15697	100	4100
石刻馆	509	289	789	95	800
总 计	201826	27740	229566	55211	142473

补 2000 年一季度古建馆参观人数
(单位:人次):

成人(含外宾):919,学生:70,总数
989,其中购票入馆者(含通票):570。

(本表由博物馆处提供)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2000 年.第 3 期/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3

ISBN 7-5402-1257-8

I.北… II.张… III.历史文物-北京-丛刊 IV.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760 号

北京文博(2000 * 3)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定价:10.00 元

抗日战争胜利 55 周年

200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入侵100周年。今年8月15日，由中央投资建设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正式落成。位于园中心广场的、由江泽民总书记亲题碑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也同期竣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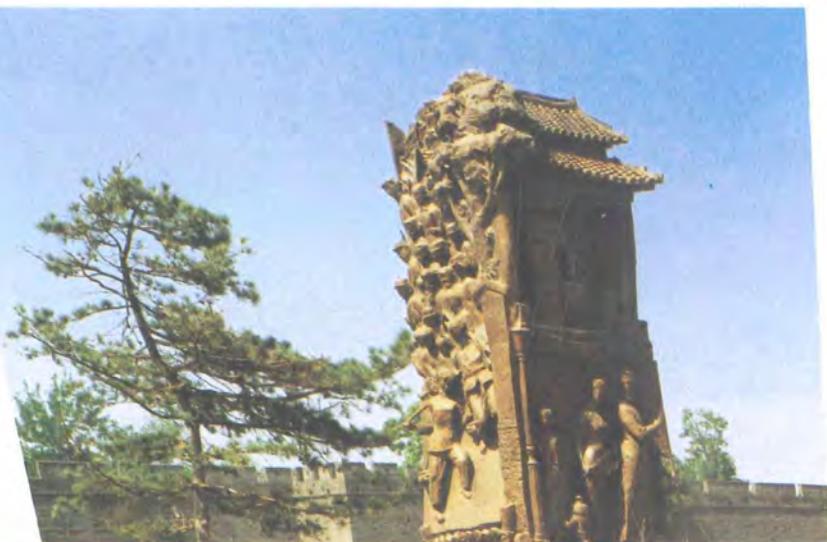
雕塑园建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地——宛平城南，占地约14公顷。园内设有150米见方的纪念性群雕广场，广场正中50米见方的区域内下沉1.26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及其碑座位于下沉式广场的北侧。纪念碑高15米，长8米，宽6.6米。围绕纪念碑和下沉广场设



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碑名的、题为“**粉碎战争机器**”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碑高15m，长8m，宽6.6m）



“抗战烽火”之《大刀雄风》铜雕



与雕塑园毗邻的宛平古城墙

有38尊青铜雕像，分为“日寇侵凌”、“奋起救亡”、“抗战烽火”、“正义必胜”四个部分，反映了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主题。

雕塑园北侧紧临宛平古城墙；城内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西北方向就是举世闻名的卢沟桥。雕塑园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宛平古城在同一轴线上。新老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共同架构出新世纪又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图文及封面、封底：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吴军）



ISBN 7-5402-1257-8



9 787540 212575 > 定价：10.00 元